

历史不能忘记丛书

平型关战役风云

历史不能忘记丛书编委会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型关战役风云/朱卫著. —2 版.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 7

(历史不能忘记系列/张量主编)

ISBN 978-7-5162-0947-9

I. ①平… II. ①朱… III. ①平型关战斗 (1937)
—青少年读物 IV. ①K265.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0521 号

历史不能忘记系列

张量 主编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吕发成 陈棣芳 胡百涛

书名/平型关战役风云

作者/朱卫 著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真/63056975 63056983

http://www.npcpub.com

E-mail:mzfz@npcpub.com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32 开 880 毫米×1230 毫米

印张/5.75 字数/116 千字

版本/2015 年 7 月第 2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5162-0947-9-01

定价/20.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编委会名单

顾 问：柳 斌 王明哲

主 编：杨逢春

副主编：艾其来 张海鹏 张承钧 周忠信 陈明显
张 量

编 委：崔艳明 夏叶青 要秋霞 唐晓晖
任贵祥 邓红洲 王 峻 安 忻

策 划：王凯弘 赵卜慧

本书撰稿人：朱 卫

► 修订版序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修订再版“历史不能忘记”系列丛书，我感到非常高兴。当年我参加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杨成武同志为第一版作序后，由我为再版作序。虽然水平有限，然出版社坚持，也只好尽力而为了。

1993年以后，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开始猖獗，日本政局也开始出现右倾化的动向，不时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为日本侵华战争涂脂抹粉，企图推卸战争责任的闹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牢记这段历史，尤其要让青少年从小就了解、记住这段历史。在我国国内，虽然抗日战争方面的图书资料很多，却难见一套比较系统地对青少年进行抗日战争方面的爱国主义教育丛书。1998年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编辑赵卜慧等同志策划了“历史不能忘记”系列丛书。受出版社邀请，我组织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研

究》杂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张海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周忠信，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明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主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研究员张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细菌学专家郭成周以及对抗战史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精心编写了这套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了大量的史料和图片，有些是首次公之于众的，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南京大屠杀、日军细菌部队罪行等；讴歌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如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该丛书第一版推出12本，于1999年9月出版。丛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当年就名列共青团中央“中国新世纪读书计划第7期新书推荐榜”，并被列为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习图书馆必备书目，荣获第9届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习优秀课外读物三等奖。

近几年，日本政府在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尤其是安倍上台以后，不但矢口否认历史，而且否认对侵略历史表示歉意的“村山谈话”，挑起诸多事端，解禁集体自卫权，对外出售武器，动摇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根基，加快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的亚洲邻国的高度警惕。

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的形式，将每年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4年4月10日，又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国将在纪念日举行空前盛大的阅兵活动，向世界宣示中国维持战后世界秩序的坚定决心。

在此之际，修订再版“历史不能忘记”系列丛书，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担当意识和责任精神。丛书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挖掘和整理最新史学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由初版12册增加到22册，内容更加丰富，事实更加清晰，范围更加广阔，尤其是把儿童抗战、文化抗战、台湾抗战、空军抗战、海军抗战等鲜为人知的抗战史料呈现在读者面前。不难看出策划者把这套丛书作为精品工程精心来打造的良苦用心。

2014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

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的反对外来侵略的彻底胜利，一雪百年屈辱历史，它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

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每一位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丽中国梦的实现，许多道理需要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人民会铭记这段历史，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人欺负”的教训，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和工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日益繁荣富强，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央档案馆原馆长

中国档案学会原理事长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原副秘书长



2015年5月

► 第一版序



抗日战争，这是个历史性和现实性都很强的话题。

说它具有很强的历史性，那是因为，这场战争的爆发距今毕竟已有62年。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日两国正面向未来，致力于建设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至于有关反映抗日战争的文章和书籍，60多年来则更是难计其数。

说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则是由于：其一，抗日战争毕竟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最坚决并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场战争。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造成了3500万中国人的伤亡，造成了1000亿美元的直接财产损失，使千百万中国人流离失所。这么一场空前的民族大灾难，无论如何不应该也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其二，抗日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它给我们留下许多血的教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尽管有一时的强弱之别，然而玩火者必自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贫穷、落后就要挨打，就会受人欺辱，只有

国家富足强盛，才能人民安居乐业……所有这些，都将犹如警钟长鸣，时时警示着世人。其三，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华儿女在这场民族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抗战精神，作为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时间再久远，都将永久地熠熠生辉、光芒四射。在和平的年代里，在社会经济建设中，我们仍然需要弘扬这种宝贵的民族精神。其四，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日战争渐渐成为历史，年青的一代只能从历史书籍、从教科书中去了解这场战争的真相了。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时地挑起事端，他们或在教科书问题上大做文章，或在日军侵华事实上黑白颠倒，企图篡改历史，误导后人。历史霎时间似乎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为此，要不要把这场战争的本来面貌告诉世人特别是年青的一代，显然成了摆在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有鉴于此，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约请了长期从事抗日战争问题研究、占有大量客观资料的专家学者，历时数载，撰写了这套“历史不能忘记”丛书。丛书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严格尊重史实，凭借事实说话，分《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百团大战》《日军细菌战》《中国空军抗战》《中国海军抗战》《中国抗日远征军》

《抗日英烈民族魂》《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纪实》《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华北抗日》《华东抗日》《华南抗日》《抗战中的延安》共 19 个分册，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客观地披露和介绍了抗日战争的爆发背景以及发动经过、侵华日军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军民抗击侵略者的著名战役、献身于抗战的民族英烈等。其中，一些材料和观点尚属首次公开发表。

日本的一位首相曾经说过：“我们无论怎样健忘，也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可以学习历史，但不能改变历史。”作为一种民族灾难，抗日战争过后的今天，无论是挑起这场战争的加害国还是遭受侵略的被害国，惟有正视史实，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防止悲剧再度发生。而再现历史真相又是问题的逻辑前提。我想，这恐怕正是撰写和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所在吧。

作为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者，我愿意把这套丛书推荐给需要了解和应当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

杨威就

1999 年 4 月 4 日



修订版序 / 001

第一版序 / 001

引 言 / 001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 003

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的转变 / 007

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 007

国民党对内政策的转变 / 010

蒋介石从对日妥协到对抗 / 015

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 / 020

唇枪舌剑 互探底细 / 020

风云突变改方针 谈判搁浅危机生 / 024

蒋介石逼张、杨“剿共” / 029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 / 034

国共两党恢复谈判 / 043

相遇西子湖畔与庐山谈判 / 048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054

卢沟桥的枪炮声 / 054

中华民族的呼声 / 058

妄想强盗发善心 / 062

- 和平美梦的破灭 / 068
- 国共第二次庐山会谈 / 073
- 国民党的战略部署 / 080
 - 国民政府的战区划分及防御部署 / 081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王阎锡山 / 087
- 改编出征迎顽敌 / 093
 - 洛川会议 / 093
 - 以茶代酒送将士 饯行“美酒”壮行色 / 102
 - 战略部署的更改 / 110
- 十里埋伏迎日寇 / 120
 - 阎锡山的平型关策划 / 122
 - 林彪部署“十里埋伏” / 126
- 平型关下伏击战 / 139
 - 骄横日军钻“口袋” / 142
 - 掐头断尾 分割中间 / 147
 - 老爷庙高地争夺战 / 153
 - 腰站阻击战 / 159
 - 军长蒙头睡懒觉 贻误战机放敌寇 / 165
- 结束语 / 170

引 言

初秋的黄土高原已是寒气袭人，阵阵山风呼呼刮来，扬起漫天黄土。在从黄土高原到华北平原的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一辆破旧吉普车在缓慢地行驶着。车内坐着一位脸色白皙而消瘦的年轻军官，胸前挂着一架望远镜，靠在座背上一言不发，闭目沉思，身子随着车子的颠簸而左右晃动。吉普车来到中国名山之一的北岳恒山和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接壤处，即海拔 1800 米的一个隘口——一座镶有“平型关”三个字的残颓拱门前。

年轻军官睁开眼，向司机作了停车的手势，吉普车在隘口前停了下来。年轻军官下车后面对“平型关”三个字审视了半天，举起望远镜向四周环视……

恒山横贯山西东北部，与五台山遥遥相对，山峰直刺云天，山谷深不可测，处处悬崖绝壁，从上面扔下一块石头，半天听不到声响，如果有人不慎跌下深谷即粉身碎骨。战国时期赵国的赵肃侯依着恒山这种险峻的山势修建了长城。每当山洪暴发时，滹沱河和拒马河奔腾的河水在恒山瓶形岭下相汇，然后呼啸着奔向远方。岭下关沟，如一个腹大口小的瓶子，瓶口为内长城的一个隘口，得名瓶形岭，隘口叫瓶形关，后人叫它平型关。一块刻有“平型关”三字的匾石镶在拱门上方，至今清晰可见。平型关在隋朝开皇七年（587）进行复修，为晋

东北三大名关之一。

平型关地处山西省东北部繁峙县东部，与灵丘县交界，山高谷深，地势险峻，故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宋、明、清各封建朝廷均在此陈兵设防。相传北宋名将杨继业为抗辽兵入侵，率领杨家将在内长城设防，六郎杨延昭在平型关东南一华里处驻扎兵马，帐下勇将孟良在此守关，以保北宋江山和当地百姓安危。当地百姓将杨延昭驻兵设防处称作六郎城。

平型关往西南5华里半的地方有个村子叫平型关村，历史上叫平型关城，有近500年历史。该城始建于明正德六年（1511），明万历九年（1581）进行扩建，明天启七年（1627）重修。城郭呈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城围墙达3华里，中间建有过街楼，东、南、北三面有城门，南北端各有瓮城一座，北门上建有箭楼。整个城池至今保存完好。

再说那位年轻军官将目光透过望远镜镜头越过平型关之巅，望见了关前的一条峡谷甬道，由西南向东北，曲曲弯弯，穿山而过，一直通向遥远的地方。深谷两侧是险峻的山壁，一条公路蜿蜒其间。沿这条公路就能到达灵丘，通过灵丘而进入河北境内。

谁也没有想到，大概包括年轻军官自己也不曾想到，由他自己率领的劲旅在这里，创造了自全面抗战以来的举世震惊的一个奇迹——平型关大捷……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就为实行全国团结抗战而呼吁奔走。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气焰日益嚣张。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露骨地表明了日本要独霸中国的野心。中国人民怒火填膺，神州大地酝酿着更大的全民族团结御侮的风暴。

4月的上海，春风和煦。一天，宋庆龄收到中共地下组织送来的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共的这个纲领同过去统战文件有所不同，它不提推翻国民党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也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号召工农兵学商大联合，全体武装大联合，还提出要建立全国抗战的总领导机关——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几年来，宋庆龄一直在盼望着全民族的大团结，她兴奋地看完全文，欣然命笔，毫不犹豫地要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4月20日，上海繁华的十里洋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响起报童那亢奋的叫卖声：“看报！看报！看孙夫人等1779人签署的抗日纲领！……”与宋庆龄一起在纲领上签名的还有何香凝、李达、胡汉民、马相伯、章乃器、李杜、杨靖宇、翁照垣等人，他们都是著名的抗日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其中也不乏

国民党的元老和要员。纲领引起了很大的社会震动，在短短的时间里便有 10 万多人签名响应。

6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告白军官兵书》，号召国民党官兵“不要打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希望“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7 月，又由毛泽东等署名，向全国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再次重申红军愿在三个条件下，“同全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1935 年 6 月，为了迎接新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吴玉章等人急电在南俄休养的王明回莫斯科，共商对策。代表团经过多次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了新的救亡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即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学者名流、政治家与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中国共产党表示愿作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工农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代表团在参加 7 月 25 日至 8 月 20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将《八一宣言》的俄文本送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核，得到了他们的赞同。王明、吴玉章、张浩、赵毅敏、饶漱石、滕代远等人，在大会作了重要发言，介绍了苏维埃和红军斗争的伟大业绩，也分析了国内的抗日救亡爱国斗争形势。他们的报告和发言受到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代表们多次高呼“向英勇的中国共产党致敬！”“光荣属于中国

共产党!”《八一宣言》愤怒揭露了蒋介石妥协投降的行径,指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八一宣言》号召各族同胞“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

由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爱国浪潮。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制定完整的统一战线政策,迎接革命新高潮。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李维汉、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否定了博古等人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加入统一战线的单纯下层统战路线。会议最后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



▲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宁等地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三天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向参加党的会议的代表们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形势及党的方针、政策。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一个起点，历史从此进入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的转变

◎ 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合作抗战之前，一直把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当作头号敌人，视为眼中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对全中国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仍对工农红军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曾亲任所谓“剿匪总司令”，决心对红军赶尽杀绝。即使日本帝国主义已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时，仍不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的逻辑是革命（无论什么革命）比帝国主义坏，所以他把共产党作为第一号敌人，日本人才是第二号敌人。他认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然肯作奴隶也不可。他说：只有攘外必先安内，去掉腐烂的地方才能防止虫蛀；不先消灭共产党，恢复民族元气，就不能抵抗外国侵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宣誓仪式上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蒋介石的“安内”，有两项内容，其一是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其二是消灭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及其他政敌。

反动的内外政策决定了蒋介石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残暴地镇压人民群众和革命力量，致使特务横行，监狱遍地，妄图把共产党的革命力量斩尽杀绝，对日本的侵略实行妥协退让。九一八事变以来，许多爱国志士命丧国民党军警特务的屠刀下。邓演达、杨杏佛被害，吉鸿昌的英勇就义，到后来国民党著名将领续范亭哭陵自戕事件的发生，均是对国民党反动的内外政策的血泪控诉。

蒋介石以为屠杀政策可以封住人民的口，可以阻挡抗日救亡的怒潮，然而他的倒行逆施激起的是更加强烈的反抗。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汹涌澎湃。上海、北平、天津、南京、西安、太原、开封、济南、广州、苏州、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学生接连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青年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支持和响应。上海、北平、天津、南京、汉口、南昌、青岛、太原、长沙、重庆、桂林等城市的数十万工人、各界知名人士纷纷集会，示威游行，发表谈话、文章要求国民党“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实行民主政治。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华北五省为目标，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增调日军入关，扬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在日军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军得到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

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行动，使中国广大人民强烈地感到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改变对日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

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导人跟蒋介石展开斗争。宋庆龄公开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其罪恶目的不过是实行个人独裁。“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不过说明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杨铨（即杨杏佛）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何香凝在斗争中别出心裁，向蒋介石“赠送”裙子一条，并附诗一首：“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失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为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这是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无情的鞭挞、憎恨和鄙视。甚至国民党右派将领中也有个别人卷入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洪流之中。



▲ 杨杏佛遗体在万国殡仪馆成殓

◎ 国民党对内政策的转变

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的意志不可违，将检验着中国的一切政治力量；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蒋介石面对全国上下发动起来的抗日爱国运动，犹如四面楚歌，究竟何去何从，不得不三思而行了。

蒋介石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认为到达陕北的红军不过 5000 余人，已是“山穷水尽”“日暮途穷”，对他已构不成什么威胁了；认为《八一宣言》只不过是共产党向他“认输”“乞降”。因此，他决定在不放弃军事围剿的同时，不妨试试用某种方法加以政治解决，也可以平息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蒋介石还认为，要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就必须同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中苏关系改善了，一方面可以对日形成强大压力，来牵制日本对华政策；一方面让苏联影响共产党的政策。于是，蒋介石以大力发展中苏友好关系为契机，开始了内外政策的改弦更张。他首先施放出三只试探性气球，以观苏联的态度。

其一，早在 1934 年夏，蒋介石派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蒋廷黻带一个非正式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蒋廷黻在莫斯科呆了近半年，访问了有关人士，举行座谈会，代表蒋介石对过去中东路事件表示遗憾，希望改善中苏友好关系，并希望缔结条约来巩固两国关系。苏方对此表示理解。

其二，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颜惠庆回国述职后返苏时，蒋介石派梅兰芳率艺术团同往苏联访问演出。艺术团在驻苏使馆为苏联高级官员演出，以后每晚在莫斯科大剧院演出。中国的古典艺术轰动了莫斯科。国民党政府向莫斯科列宁图书馆赠送

了2000多册中国古典文献；在南京成立了中苏文化友好协会，由国民党要员担任主席、名誉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向苏提出，希望在新疆开辟中苏交通，苏联对此作出积极响应。不久，中方修建了从西安经兰州、乌鲁木齐、伊宁到达苏联边境的公路。

其三，1935年秋，蒋介石在南京会见苏联驻华使馆人员，表示希望签订中苏秘密军事协定，并暗示他将和中国共产党和解，共同抗日。苏联为自己的利益计，不愿刺激日本，只同意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欢迎国民党同共产党和解。

这三个试探气球放出后，均收到满意效果。为了急于发展中苏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磋商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及进一步沟通与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国民党采取了更加重要的步骤。这就是陈立夫、张冲的秘密访苏。

陈立夫、张冲都是蒋介石的老乡，在国民党中央任要职。张冲精明能干，足智多谋，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蒋介石一直靠他来斡旋国共两党关系，解决一些棘手、机密事务。陈立夫、张冲于1935年12月启程。临行前，蒋介石特意召见他们，面授机宜，并要求他们行动机密，保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张冲化名江某，乘一条德国邮船从上海起程。同行的还有驻德大使程天放一行，除程天放外，无人知晓他们的使命。邮船航行十余日后到达马赛。陈、张改乘火车到柏林隐居，待命赴苏。由于德国法西斯狂热甚嚣尘上，各国特务云集，蒋介石认为他们久居柏林会走漏风声，指示他们先到欧洲几国走走。于是，陈、张先后游历了法国、瑞士、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意大利等国。

陈立夫是国民党“四大家族”的成员之一，怕多时不在党、政重要场合露面，会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和猜测，他为了掩

人耳目，事先写了十几封家信，让其儿子每隔几天从杭州寄一封信回家，告诉有关亲友，说他正在杭州养病。

如此绞尽脑汁的保密措施未能奏效，日本报纸首先披露说陈立夫负有特殊使命访苏，造成苏联大为不安。蒋介石知道消息后，立即召回陈立夫、张冲，谈判在国内与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之间进行。虽然陈、张此行失败，但足以证明蒋介石“改弦更张”的方向已经确定无疑。

蒋介石当时对沟通并改善国共关系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曾派他的亲信邓文仪为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苏十分活跃，频繁拜访苏联高级将领，分别探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邓文仪更重要的任务是接触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他通过陈秋梅介绍，约见了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邓文仪对王明说：“蒋介石过去对日本侵略方针的估计完全错了，日本首先要进攻的不是西方，而是中国。中国应该坚决抗击日本侵略。”又说：“蒋介石已经获悉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贵党的《八一宣言》，十分赞赏，因而愿意与中共谈判联合抗日事宜。”

王明主动约见邓文仪，对他积极改善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的工作表示赞赏。王明说，国共谈判应在国内进行，因为两党的中央都在国内，国民党应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谈判。王明表示将派潘汉年回国，向中共中央通报信息，促成两党谈判。

蒋介石在南京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也提出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鲍格莫洛夫表示将向中共方面转达。蒋介石同时很快在国内找到三条渠道，向共产党传递国民党愿意和谈、团结抗日的信息。

第一条渠道是通过谌小岑打通的。谌小岑是湖南安化人，五四时期在天津参加过觉悟社，和周恩来、邓颖超有所交往，

脱离革命后，同左派人士仍有联系。翦伯赞、吕振羽也是湖南人，谌小岑称他们为“老乡”。谌小岑接受“打通共产党关系”的重要任务时就想到了“老乡”。他找到翦伯赞商量后，给时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外围组织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的吕振羽写信：“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唯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南来。”吕振羽接到信后，立即向中共北平市委的周小舟汇报。周小舟又同北平市委和北方局的领导人认真研究，认为国民党愿意同共产党谈判，是受《八一宣言》影响的结果，机会难得，不应拒绝，决定让吕振羽辞去教授职务，前往南京探明情况。



▲觉悟社部分成员，后排右一为周恩来，左一为谌小岑，前排右三为邓颖超。

第二条渠道还是通过翦伯赞和左恭打通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左恭是左宗棠的后代，共产党员，认识中共上海临时

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张子华以中共联络员身份在左恭介绍下与谌小岑建立了联系。张子华通过谌小岑又见了国民党曾养甫，了解到南京国民党政府愿意谈判的信息后，亲自赴陕北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于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

第三条渠道更为机密和重要，它渊源于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最核心人物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这条渠道的开拓者是孙夫人宋庆龄。秘密使者是“红色牧师”董健吾。宋庆龄为捍卫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一直坚持同蒋介石的背叛行为作无情斗争，反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月的一天，宋子文来到宋庆龄住处，把蒋介石愿意同共产党谈判共同抗日的消息告诉她，希望宋庆龄设法同陕北联系上。宋庆龄邀请董健吾到家，将一封密件交给他，请他把密件送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保证他一路通行无阻，宋庆龄为董健吾办了一张有孔祥熙签名盖章的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证书，并再三叮嘱他这是一件有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一定要办好。董健吾于1936年1月中旬，到达西安，由于连日雨雪天气，交通断绝，一等就是40天，只好求助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将军得知董健吾的重要使命后，用飞机把他送到延安。

第三条渠道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中共中央对董健吾带来的消息非常重视，认真对待。当董健吾被护送到瓦窑堡时，毛泽东、张闻天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红军东征，林伯渠、博古、张云逸等迎接董健吾。林、博把南京信息向毛泽东发出急电。毛泽东回电要博古陪同董健吾到石楼面谈。董健吾急于要回上海，不想前往山西石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同时见到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听了关于北方局同南京曾养甫谈判情况的汇报后，判断蒋介石果真在大幅度地修改其内外政策

了。1936年3月4日，由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署名，给董健吾发出如下电报：“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之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的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电报最后说，“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3月5日，董健吾离开瓦窑堡。临行时，林伯渠、博古拿出江西中央苏区铸造的三枚银币和大小一套布币，请董健吾送给宋庆龄作纪念。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将中共中央的信件、礼物送给宋庆龄。宋庆龄连连赞赏，极为高兴。不料这条极为重要渠道由于阎锡山的作梗而废弃。

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的强大压力，主动畅通上述三条渠道，结束了近十年来两党以刀枪对话的局面。从此，政治斗争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 蒋介石从对日妥协到对抗

蒋介石从九一八事变起一直推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导致中国军队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不战而退，以致东北全境和热、察两省陷落。为了替自己的倒行逆施辩解、找根据，他一再宣扬民族失败主义，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操纵在日本人手里，他要我们哪一天死，我们就不得不哪一天死。”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更是系统地宣扬了亡国论。他说日本“一切军事准备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充足”，

“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他只要一声号令，真是只需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操纵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办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

当然，蒋介石并不甘心情愿地让日本人肆无忌惮地占领中国，把希望寄托于国联，让世界列强来干预，借外力阻止日本的侵略，于是就有了李顿调查团来华。但李顿调查团在中国待了几个月，对日本的侵略和中国被侵略的事实似乎永远也调查不清楚，最后留下一张一文不值、犹如废纸的“报告书”，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蒋介石想用最客观的说理、最虔诚的劝告，对侵略者痛陈利弊，晓以大义，劝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发表一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



▲ 李顿调查团在调查九一八事变现场

检讨》一文。文章的基调是求和，哀求日本侵略者权衡得失，不要侵略。这是天大的笑话，等于和强盗讲道理，如果强盗讲道理的话就不成其强盗了。日本侵略者不仅不为蒋介石的乞求所动，反而变本加厉，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侵略事端，把蒋介石的求和文告撕得粉碎。

蒋介石终于明白了世界列强靠不住，和强盗没有道理可讲，只有决心“死里求生”，一改过去的失败主义和单纯妥协退让的态度，一方面急剧改变对苏、对共产党的态度，一方面在外交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抗争，在行动上积极准备抗战。

1935年秋，蒋介石视察了大西南的四川、云南、西康、贵州以及西北的陕西等省，准备把这些地区建设成为对日作战的后方根据地。与此同时，他制定了三年备战计划：在外交方面，积极争取国际支援；在财政经济方面，实行币制改革；在国防方面，加强战略要地及海防江防建设，扩建新建兵工厂，实行兵役法，整编全国军队；在交通方面，迅速修通粤汉铁路、浙赣铁路，延伸陇海铁路，着手新建和筹建苏嘉铁路、成渝铁路、湘黔铁路、湘桂铁路、滇越铁路、黔桂铁路，新建滇缅、桂越、川康、甘新等战略公路；在文化教育方面，振兴民族精神，实行“新生活运动”，保护和转移北平等地的文化古物，并准备撤退沿海地区的高等学府。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就外交问题作报告。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同时表示和平是有限度的，苟国际演变“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同月，亲日派头子、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受伤，蒋介石亲任行政院长，并改组军事委员

会，把著名抗战领袖冯玉祥从泰山请到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月底，汉奸殷汝耕在日本扶持下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蒋介石在南京立即召开行政院紧急会议作出反应，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改任响应“自治”的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将殷汝耕免职拿办。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针对日本胁迫南京承认伪满洲国和华北自治问题，对什么是由争取和平转变为最后牺牲的限度作了明确解释。他说：最低限度“就是保持主权领土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从1936年初到1936年冬，中日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外交谈判。南京谈判代表张群在谈判中未屈服于日方的压力，对日方的无理要求和挑衅行为，据理进行坚决斗争。如日方企图胁迫国民党承认“满洲国”，搞日、满、华“经济合作”，取缔一切反日活动，中日“共同防共”等，张群采取故意拖延不答，并提出反要求，代表国民党要求日本废除“淞沪协定”和“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政府，解散察蒙政务委员会，日本飞机不得在中国领空任意飞行，停止走私并不得干涉中方缉私等。针对日方一再要求中日“共同防共”，张群说：“防共纯系内政问题，无需与任何第三者协商。”

1936年底，日军及内蒙伪军进攻绥远，蒋介石积极赞助傅作义抗战，取得了红格而图和百灵庙等战役的胜利，重创了日伪军。蒋介石公开声称绥远抗战“实为吾民族复兴之起点”，“华北问题决不迁就”。



▲ 中国军队开抵绥远抗战前线

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虽然这个过程长达四年之久，但是这个转变极为重要。这是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如没有蒋介石的这个转变，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不可能走到谈判桌上来，共商共同抗日救国大事。虽然谈判也经过了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总归是开了一个好头，是中国人民之福也。

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

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的转变和具体行动，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日所作的种种努力，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提供了机会，创造了条件，先从较低层次互相接触，了解对方的条件和态度，然后逐渐提高层次，使谈判不断深入。但是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斗争有时相当激烈，可以说经过了儿起儿落。

◎ 唇枪舌剑 互探底细

第一次谈判是在较低层次进行，国民党派出谌小岑、曾养甫，共产党由中共北方局派出吕振羽、周小舟。1935年的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内外政策有所改变，通过种种途径寻找改善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的办法，对日态度变得强硬起来。1935年11月底，吕振羽应谌小岑之邀赴南京，探明国民党当局确有谈判意愿，即向中共北方局汇报。北方局决定吕振羽、周小舟同南京方面谈判。

1936年1月，周小舟到达南京，在新街口闹市找了一家旅馆住下。周小舟年方24岁，但已有很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未露声色，不忙着找国民党方面谈判，只是向谌小岑反复询问曾养甫的情况。周小舟留给谌小岑的印象是身着长衫，很年轻，说话坦率严肃，但又温文尔雅，很有风度。周

小舟未和曾养甫直接见面谈判，向吕振羽传达了中共北方局两点指示：一、我们的谈判要求，是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并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二、北方局决定由你常驻南京，负责联络和谈判事宜。为此，周小舟建议吕振羽辞去中国大学教授的职务。



▲周小舟

周小舟北返后，吕振羽根据北方局指示的谈判条件，同曾养甫谈判。曾养甫说，还要建立什么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现在的国民政府就是国防政府，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就是抗日联军。吕振羽说，不对，你们常称国家是“党国”，军队是“党军”，可见国民政府只是一党的政府，国民革命军是一党的军队。曾养甫无言以答，向吕振羽提出四点反要求：一、共产党

停止土地革命；二、停止阶级斗争；三、停止苏维埃运动；四、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力活动。吕振羽把曾养甫的意见记下来，立即向北方局作了汇报。

由于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地方党组织，经费都极为困难，吕振羽向谌小岑提出解决生活费的要求。曾养甫给吕振羽一个南京铁道部专员的空头官衔，每月车马费 200 元，基本解决了吕振羽生活费和周小舟来往路费。

1936 年 3 月，经中央同意，正式任命周小舟为谈判代表，并指示他第二次赴南京。周小舟事先将此行通知了谌小岑。谌小岑用汽车在下关接到了周小舟。周小舟这次带来了中共领导人写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南京要人的信件，每封信都附上一份《八一宣言》。这些信件分别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签名盖章，内容都是重申《八一宣言》的主张和精神。为了表示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和重视，有的信是写在白绸之上。

周小舟告知吕振羽，北方局已批准他为中共党员，今后的工作归王世英领导，同时任命他为正式和谈代表，并详细交代了北方局关于谈判的六条意见和针对曾养甫四点反要求的意见。

第一轮谈判由吕振羽出面进行。由于双方利益根本对立，谈判不免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曾养甫特别不满意的是《八一宣言》中仍骂蒋介石为卖国贼头子。他说：“委员长看了《八一宣言》很生气，共产党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不过四五万条破枪！一面和我们谈判，一面又骂委员长。历史上实力就是是非，说我卖国，我就卖国，共产党其奈我何？”吕振羽回答说：“贵党的报刊，天天都骂朱、毛为‘共匪’，我们在《八一宣言》回敬一下有何不可！至于说历史上实力就是是非，这是不

正确的，倒是任何是非都必须由历史来作结论。” 谌小岑见气氛紧张，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算了，算了，相打无好手，相骂无好口。彼此都是老朋友了，千万不要生气。”

曾养甫对同吕振羽发生的争论怒气满腹，要求中共派正式代表来。1936年6、7月间，周小舟以正式代表身份第三次去南京。曾养甫和周小舟在曾养甫办公室进行了正式谈判。谈判内容有：成立国防政府问题，红军和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和承认三民主义问题。双方就上述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和要求，争论仍相当激烈。如红军改编问题，曾养甫不仅要求红军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还要求红军移驻察绥边境，妄图借刀杀人；又如在释放政治犯问题上，曾养甫竟要求周小舟先开出政治犯名单，他“按名单释放”，以便进一步掌握政治犯的命运。曾养甫还要求共产党放弃马列主义，与国民党“一起搞三民主义”。初露锋芒的周小舟对此一一据理驳斥。曾养甫在谈判桌上没有讨到便宜，会后对吕振羽说：“共产党没有诚意，派这么一个小孩子来谈判！”吕振羽说：“有没有诚意不能看代表的年龄，要看他提的方案是不是合理，表达意见是不是有道理。我们共产党干部后生可畏，周小舟先生的能力，想必先生已经领教过了。”但曾养甫仍坚持说：“这样的谈判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周恩来来南京，要不由我或张冲去延安。”

两广事变平息后，曾养甫被蒋介石调任广州市市长，并即刻赴任。一天，谌小岑交给吕振羽一份密电码，并说：“南京谈判到此终止，以后有什么事情，由武汉电台和陕北电台直接联系。”吕振羽向王世英、周小舟汇报了和曾养甫多次谈判的情况，并将有关文件和密电码交给了周小舟。周小舟去陕北向

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毛泽东对周小舟工作很满意，并将他留下作自己的秘书。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通知北方局，以后同南京方面的谈判统一于中央，以免步调参差不齐。同国民党第一轮谈判暂告一个段落。通过双方初步接触、谈判，各自表明了态度和意见，并各持己见，有时激烈争论，但气氛还是好的，各自了解了对方的底牌，为今后继续谈判打下了良好基础。

◎ 风云突变改方针 谈判搁浅危机生

中国共产党为了促进国共团结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决定由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正式谈判代表，与国民党高层人士进行谈判。

潘汉年1924年参加了郭沫若、成仿吾领导的创造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负责过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领导工作，和鲁迅一起进行“左联”的筹建工作。1931年起，他从事党的安全和情报工作，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代表红军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广东省政府主席、军阀陈济棠谈判；签订中共最初的两个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协定，长征中他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被中共中央指派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并担任联络工作，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1936年，他受王明指派与国民党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会谈，就合作抗日大事，达成在国内继续开展谈判的协议。

潘汉年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内，向党中央通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并作为谈判代表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的实际谈判。潘汉年由于双重身份，极受南京当局的重视。潘汉年经常出入宋子文、陈立夫、宋美龄的府第，结交的都是国民党的最上层和三教九流的头面人物，既做统战工作，又做情报工作，掌握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核心机密，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称他为“小开”“年兄”。

潘汉年抵达香港后，陈立夫立即派张冲赴港与潘汉年见面，邀他去南京，并希望他尽快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潘汉年带来南京方面的信息，中共中央极为重视，认为“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之势”，“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准备由周恩来亲自出马，前往广州与南京当局谈判。此前，周恩来于9月22日给蒋介石写信，信中说：“现大难当前，国人抗日之心，甚于‘五卅’，渴望各党合作之忱，甚于民国十三年改组”，“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速返南京。潘汉年离开陕北返上海，随身带了许多重要文件，有给宋庆龄参阅的《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周恩来写给陈立夫与蒋介石的信、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潘汉年于10月中旬回到上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10月22日，毛泽东电告潘汉年，告知南京已同意他会见陈立夫。11月7日，毛泽东又通知他以正式代表资格速赴南京，与陈立夫谈判，同时要他向宋庆龄借款买电台，同中央直接联系。国共谈判的重任主要落在潘汉年身上。



▲ 潘汉年

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同陈立夫、张冲开始了国共第二轮谈判。潘汉年向陈立夫转交了中共的重要文件和信件，阐述了中共对国共合作的意见。岂知此时蒋介石对中共政策又有重大改变。蒋介石认为在甘肃会宁会师的三支红军一旦与张学良、杨虎城结成巩固同盟，西北大局将不可收拾。所以当前最重要的已不是国共政治谈判，而是以强大压力拆散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的联系，并消灭红军主力。因此，当潘汉年阐述意见后，陈立夫就说：“潘先生，蒋委员长最近指示，国共合作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是中共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暂准保留3千至5千人，但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这一点如果同意，其他各节就好办了。”潘汉年说：“蒋先生的这些条件，不是联共抗日，而是过去‘剿共’政策的继续，对中共不是平等对待谈判，而是收编，中共决不能同意。”陈立夫说：“蒋委员长这个决定是不能改变的，而且首

先必须解决，否则其他方面无从谈起。潘先生，看来你我都不是军事当局，面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是否还是请周恩来出来一次为好。”潘汉年说：“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绝不可能来谈判。”双方各执己见，会谈无果而散。

蒋介石见对中共政治压服无效，便企图以军事进攻逼其就范。11月中旬，蒋介石集中五个正规军，伙同西北“三马”地方势力，从会宁至固原一线分数路进攻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红军避实就虚，诱敌深入，相继在明城堡和山城堡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整旅、两个整团，另击溃两个旅，使蒋介石不敢贸然发动进攻。蒋介石此时改变政策，除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使他害怕外，更主要是国际法西斯势力极为嚣张，德、日签订了反共协定，日本还企图拉



▲救国会领袖在苏州狱中合影，左起：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史良被押在女牢。）

南京政府参加反共集团。蒋介石还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逮捕上海著名抗日救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查封了十余种进步报刊。

11月19日，陈立夫在南京约潘汉年进行会谈。陈立夫说：“蒋委员长对上次所提各点，坚持不作任何让步，请潘先生速电告陕北中央。”“现在德、日正拉蒋委员长参加反共阵线，中苏关系可能逆转，到那时，中共的处境只会更糟，这点你们必须考虑的。”潘汉年说：“蒋先生既不愿做任何让步，在国内严厉镇压抗日运动，又准备参加国际反苏阵线，证明他已根本不想抗日了。根据这种情况，请问谈判又有何益？”陈立夫说：“我们希望中共方面为国家民族利益计，捐弃前嫌，我们也不希望中国参加反苏阵线。”潘汉年说：“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多次发表了团结抗日的宣言，所作让步有目共睹，我党中央最近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更是有力的证明。”说罢将这个文件交给陈立夫。潘汉年还责问陈立夫：“曾养甫最近又向我党中央重提蒋先生允诺的四条：一、共产党公开活动；二、苏区政府继续存在；三、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国会；四、红军改编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的组织与领导。而陈先生所言，则大相径庭，这是何故？”陈立夫张口结舌，无以对答，干脆抵赖说：“我从未见蒋委员长对第二个人讲过这四条，它是根本不存在的！”

谈判已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潘汉年将谈判情况报告党中央。张冲找到潘汉年，强调国共谈判不宜终止。共产党和红军负责人毛泽东等19人联合致信蒋介石，指出在日寇扩大侵略面前必须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如果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就要亡国，人民就要当亡国奴，失去人民的拥护，必

将为千秋历史辱骂。毛泽东以胡宗南在山城堡“剿共”惨败的事实告诫蒋介石，不是士兵不能打仗，而是不愿意在日本侵略面前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向红军缴枪投降。“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就是说“先生为什么不在床上扪心想一想士兵不愿打仗的原因？”希望蒋介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936年12月上旬，潘汉年对陈立夫说：“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我党决不接受任何侮辱红军之约束，红军只能在抗日救亡的前提下，改换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至于红军数量，不但不能少一兵一卒，而且为抗日还要迅速扩充。南京若有合作诚意，就应该立即停战，从苏区周围撤退，静候谈判之结果。如果逼人太甚，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决不作无原则让步。”

◎ 蒋介石逼张、杨“剿共”

和陕甘苏区紧密相邻的国民党西北驻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首领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成为中共争取的重要对象。张学良、杨虎城在逼蒋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方面，起了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长子。1919年进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炮兵，毕业后任奉天（今沈阳）督军署卫队营上校营长、奉天暂编第3混成旅2团团长。1920年任第3混成旅旅长，晋升为少将。1922年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任镇威军第二梯队司令，后兼奉天讲武堂校长。1924年任第27师师长兼东三省陆军训练副监，率部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升任奉军第三军军长兼第4师师长，在山海关方面作战。1925年率军进驻天津，晋升为中将。此后率部和冯玉祥

部国民军作战，进占北京，又兵进河南企图阻止北伐军，被击败。1928年4月任正太、京汉方面奉军总指挥，抵抗南京国民政府军北伐，败退回东北。6月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不顾日本反对，通电全国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将奉军旗帜改易为青天白日旗，任国民政府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930年9月依附蒋介石对阎锡山、冯玉祥一方作战，占领天津、北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坐镇北平成立副总司令行营。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患重伤寒在北平住院，得警报立报蒋介石，蒋密令“力避冲突”“听候中央处理”。12月被解除副总司令职改任北平绥靖主任。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兼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1933年3月，热河失守引咎辞职，赴意大利考察。1934年任国民党军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指挥“围剿”红军。1935年改任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6月，日军加强对



▲张学良

华北的侵略，东北军部队被调离河北，他极为不满。不久调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率东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次战役中连连败绩，被歼三个师，被蒋介石取消三个师番号。

杨虎城，原名为彪，号虎城，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当过童工。1908年其父受诬陷被清政府杀害，因无力埋葬，杨虎城联络乡邻成立丧葬互助组织孝义会，自任领袖，后将其改名为中秋会，以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为号召，会员发展到百余人。1914年因领导贫苦农民打死了当地的一个大恶霸而受到官府通缉，遂带领部分会员和贫苦农民进行武装抗暴斗争。1915年参加讨袁战争，1916年所部改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旅第1营，任营长。1917年参加靖国军，任左翼第五游击支队司令，后改为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1921年任靖国军第三路司令。1922年与北洋军阀战于武功，护送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离陕赴沪后，率部千里转战至陕北榆林，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署歩兵团。在陕北期间，他结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接受革命思想。1924年参加国民党。同年被任命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南下屡败北洋军阀刘镇华于关中地区。1925年在祁山、宝鸡地区重创北洋系陕西督军吴新田部后，升任国民军第三路军第3师师长。此时他已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耀县设立三民军官学校，聘请共产党员负责政治工作和担任教官。1926年4月在七倍于己的列镇华部围攻下，与陕西督办李云龙等坚守西安达8个月之久，后在冯玉祥部援助下，将敌军击退。1927年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总司令，后任第十军军长，率部出潼关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没有追随蒋介石反共，保护了军中的共产党人南汉辰、魏野畴等人。1929年蒋冯决裂后依附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4

师师长，参加了新军阀混战。1930年3月所部改编为陆军第17师，任师长。不久，部队先后扩编为第七军及讨逆军第十七路军，任军长和总指挥。10月任陕西省主席。1931年代理潼关行营主任，后改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通过南汉辰、汪锋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10月与中共中央达成秘密合作协议。

张学良同日本帝国主义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被蒋介石逼着不打日本人而到西北打红军，又连遭失败，其忧愤苦闷之情是不言而喻的。他一直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所以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千方百计寻找渠道与中共建立联系。他在共产党的好友杜重远和著名抗日将领李杜的帮助下，在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感召下，决心联共抗日。1936年2月中共中央派李克农、钱之光等到洛川，同张学良部下王以哲会谈，签订了包括两军一致抗日，互不侵犯，放行交通运输、物资上互通有无等内容的第一个协定。3月，张学良到洛川会见李克农等。张学良高兴地说：“我可是整销，不零售呵！”一句玩笑话惹得哄堂大笑。接着张学良提出了一些富有战略远见的意见：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包括蒋介石，不能反蒋抗日；二、中日之间，敌强我弱，对日作战，必须有相应的战略；三、红军东征不合时宜，应西出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四、红军与东北军应分别派员访苏，争取苏联支援中国抗日。李克农在许多问题上与张学良有共识。4月8日，张学良派人在延安城东迎接周恩来。9日在延安城内的天主教堂，双方进行了坦率的会谈，在许多问题上双方达成一致。张

学良说：“我有一大笔钱，可拿出来作经费。西安储备的大量无线电器材和卫生器材，也可满足红军的需要。”他要求周恩来协助培训他的干部。不久，张学良一下子拿出50万元给红军作经费，中共与张、杨合办的王曲军官训练团也开学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延安会谈，标志着红军与东北军结成了亲密的抗日联盟。

在共产党的努力争取下，张学良、杨虎城都和中共订立合作协议，形成了西北“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西安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阵地，掀起了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蒋介石惊呼“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必演成叛乱”，决心终止国共谈判和在谈判中所作的承诺，亲自出马拆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党的联盟，威逼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匪”，要予红军以“最后一击”。他于1936年10月22日飞到西安，对张学良、杨虎城说：“现在红军三个方面军已经会合，但人数至多3万余，他们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已走到日暮途穷的绝境，我只要两个礼拜，最多一个月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消灭。你们现在要绝对服从我的命令，做好‘剿共’准备。”张学良、杨虎城一再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的训斥。12月3日，蒋介石到西安，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率部开赴反共前线，进攻红军。任凭张学良进谏，甚至哭谏均无效。蒋介石对张学良说：“在你和杨虎城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服从我的命令，立即出兵进攻苏区，中央军在后面接应和督战；再一条是，如不愿意，你们的部队分别调往福建、安徽，陕甘宁地区让中央军驻防‘剿共’。”张学良、杨虎城的处境已是山穷水尽，只得另觅他途，在困境中去争取生存和光明前途。



▲蒋介石到达西安时张学良、杨虎城前往迎接，左起：蒋介石、杨虎城、邵力子、张学良。

◎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

张学良、杨虎城经过缜密的研究，确定了基本方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决不再打内战，除为了抗日而调防外，也决不到南方去，两军也决不分开，对蒋介石如果善劝无效，就只能采取兵谏，扣留蒋介石。如果这一着失败，就同红军一起打游击。

1936年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作出决定：要在12月12日上午6时开始捉蒋的一切行动。是日晚12时许，张学良召集东北军将领召开紧急会议，文武要员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缪澂流、孙铭九、黎天才、卢广绩、洪钊、应德田等一一到会。张学良向他们作了演说并宣布“兵谏”计划：“弟兄们！我们东北军为什么会从东北跑到西北来，这个缘由你们

是知道的。最近，蒋委员长为什么又赶到西北，他要我们干什么，这点你们也完全知晓了。他要我们全部出动打红军，要我们自相残杀，自毁长城。我们东北军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保，有敌不能杀，却要枪口对内。五年多来，我一直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黑锅，遭全国人民唾骂！如今又要我充当内战的祸首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难道我们还能够干下去吗？不能！决不能！蒋委员长这次来西安，我劝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真是一而再，再而三，可他一意孤行，根本不听我们的劝告，反骂我‘不要祖国’，‘不要父母’。我们对他已仁至义尽，可现在他逼得我们已无路可走了。没有办法，我和杨虎城将军已商定好，明晨就行动，实行兵谏，把蒋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就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各位将领一定要坚决执行命令，完成任务。”张学良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深深感动了与会的将领们。他们更加崇敬、信赖和热爱自己的领袖，完全支持他的正义行动。

蒋介石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倒行逆施会如此激怒了张学良、杨虎城，以致他们竟敢在自己头上动土，以军事手段逼他抗日。蒋介石在临潼所置的卫队不算很多，他住的华清池只有侍卫30多人，住在外院的宪兵也不过40多人。

12月12日凌晨5时许，晨曦已微染东方，昨天在华清池温泉中久久沐浴过的蒋介石仍在甜蜜的睡梦之中。东北军的一个团在唐君尧的指挥下已团团包围了蒋介石的行营。由孙铭九率领的卫队分乘几辆汽车，迅速开到华清池外，准备直冲进去，但立刻遭到蒋介石守门卫兵的阻击。孙铭九一面下令解除院外宪兵的武装，一面率领几十名士兵冲进院内，直扑蒋介石的住所——五间厅。院内蒋介石的卫队拼命射击，但寡不敌众，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就跪下交了枪。孙铭九迅速冲进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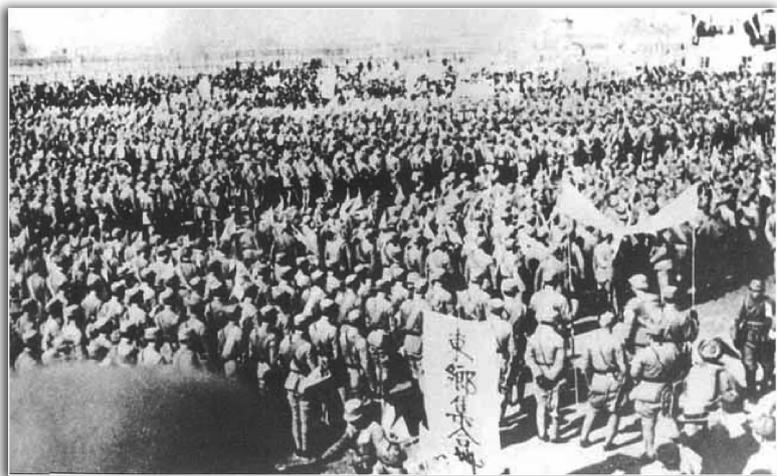
介石的卧室，只见衣架上挂着他的衣帽，桌上放着他的公文包和义齿，人却不见踪影。孙铭九伸手一摸被子仍是温的，料定委员长肯定跑不远，立即命令士兵在院内四处搜查。这时白凤翔和刘多荃也赶到了，见蒋介石跑掉了都非常着急，忙拿起电话向张学良如实报告。张、杨极为惊讶和担心，怕蒋介石跳进鱼池自杀，那将大大有碍全国局势。张学良命令孙铭九：“你们找不到委员长，就别活着来见我。”

华清池五间厅的后面是高高的院墙，有一扇小门通向后面的骊山。蒋介石听到枪声，以为红军打过来了，来不及穿好衣服和鞋子就往外跑。在几名侍卫帮助下爬上墙头，连滚带爬向墙外纵身一跃，腰椎几乎跌断，脚也被刺破了，跌跌撞撞地钻进一个大石头底下的茅草坑里藏了起来，被搜查骊山的士兵找了出来。孙铭九连忙上前报告：“张副司令命令我们前来保护蒋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去，领导我们抗日。”蒋介石首先消除了以为红军打来产生的恐惧，但仍担心愤怒的东北军会给他一阵乱枪。他见孙铭九对他还比较客气，于是又振作起来，说：“你们副司令在哪里？我是领袖，我不下山，叫张副司令来！”孙铭九说：“现在天寒地冻，委员长待在这里不好，还是请下山进城吧！”蒋介石说：“那给我备马。”孙铭九说：“现在到处警戒，马一时上不来，还是请委员长自己走吧！”这时天已大明，白凤翔、唐君尧也赶来了，他们给蒋介石披上大衣，回到华清池住所，然后推上汽车，送往城内的西安新城大楼。新城大楼是杨虎城办公、开会和接见宾客的公馆。

在捉蒋的同时，西安城内围捕南京高级军政大员的十七路军官兵在赵寿山的指挥下，没有费很大的力气就将西京招待所拿下。蒋系高级军政将领个个目瞪口呆，束手就擒。在清点时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一个是军政部

次长陈诚。继续搜查的结果是邵元冲在逃命时不听呼唤被击毙，陈诚在地下室的一个空啤酒箱里被搜出。12日上午8时左右，事变行动全部结束，南京高级军政大员无一漏网。张学良、杨虎城心中的大石块放下了。

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著名的八项抗日爱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杨的八项主张顺乎历史潮流，切中时局要害，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官兵在西安革命公园召开大会。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一传出，如同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各式人等如同万花筒一般，纷纷亮相。

事变后的南京，情况更加复杂了。以何应钦、陈立夫、陈

果夫、戴季陶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派大军围攻西安，扬言要用飞机炸平西安城。在这一派的压力下，南京政府于12月12日颁布“褫职严办令”，谴责张、杨“劫持统帅”，“行同匪寇”，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作出“讨逆”的决定。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率领大军进逼潼关，向华阴、华县挺进，大批飞机对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狂轰滥炸。但是，以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孙科、王宠惠为代表的主和派则坚持对西安采取缓和政策，反对以战争方式解决事变。孔祥熙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称：“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与共，必能开诚接受。”宋美龄更是坚决的主和派，认为如以战争讨伐张、杨，“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暴戾之叛军所残害”，表示要“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何应钦骂她“妇人之见，只知道要营救自己的丈夫”。她反驳说：“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认定何应钦策划内战“为非健全之行动”。她请当年担任过蒋介石顾问的英国人瑞纳去西安周旋，求得事件的和平解决。各国普遍的舆论都主张和平解决，主张释放蒋介石回南京。

当时的西安各界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要求严惩蒋介石的舆论占了绝对优势。这一天是西安古城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天，30万居民欢呼活捉蒋介石，一辆辆宣传车在大街上散发捉蒋号外和张、杨的通电，“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的口号声不绝于耳。这天下午，西安几十个救国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张、杨的爱国行动，发表了《致全国将领及全体武装同志书》、《告各党各派书》以及《拥护张、杨救国宣言》。历史

是最公正的证人，爱国者得人心，卖国者必遭人民唾弃。

12月14日，瑞纳飞抵西安，带来了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件，告诉蒋介石，南京是“戏中有戏”。



▲张学良阅读宋美龄的信

张学良、杨虎城以非常的行动捉蒋，事先并没有同中共进行任何商量，但无疑指望中共对他们的爱国行动予以坚决支持，并协助他们解决捉蒋后的复杂问题。因此，当事变一发动，他们就要刘鼎一分钟也不耽误，立即向中共中央发报。12月12日零时30分，中共中央收到西安发来的第一份电报，紧接着又收到张学良亲自来发的电报。电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电报要求中共速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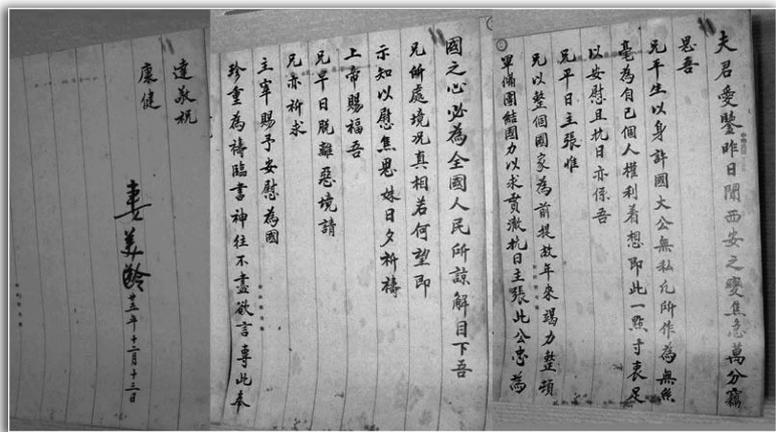
中共中央收到西安的惊人消息后，宁静的陕北高原小城保

安立即沸腾了起来。毛泽东连夜在他的办公室召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任弼时、关向应、张国焘等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事变的性质、意义、前途、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派代表团等问题。毛泽东喜笑颜开，点燃一支香烟，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说：蒋介石恶贯满盈，岂知也有今天么！周恩来接着说，他过去多次悬赏几十万元捉拿我，这次我们可一文不花呵！朱德也笑着说：这次恐怕要首先拿这个委员长开刀了。会议正式开始后，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说：“西安事变是爱国的、革命的，这个事变没有任何帝国主义插手的背景，由蒋介石控制全国局面的形势从此改变了。”他接着说：“事变的重大意义有两点：这就是既抗日又反蒋。为了抗日，我们要力争事变和平解决，在政治上我们同南京处于对立局面，我们应争取南京的妥协派，孤立亲日派；但是对蒋介石，我们不能轻易放他回南京，他必须受到全国人民的揭露和批判，必须受到全国人民公审。总之，他必须受到严惩。但在斗争方式上，我们应注意策略。”朱德、周恩来等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张国焘持反对态度，他说：“西安事变，第一是反蒋，第二才是抗日……”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他还利用休会时间去游说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随着西安事态发展昼夜不停地连续举行，毛泽东的窑洞常常是彻夜通明。中共中央作出了重要决定：一、立即给张学良发出万分火急复电，“元凶被逮，薄海同快”，对张学良的爱国正义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嘱张学良把蒋介石囚禁在自己最可靠的卫队营里，严加看管，情况紧急时应果断处置。二、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前往西安。建议由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由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大计。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中共中央后来考虑到蒋介石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中的

地位和作用，为了尽量避免动乱，以利全国团结抗战，指出只要蒋介石答应张、杨的八项条件，不但不杀他，也不把他当人质，可以放他回南京主持政府工作。

12月15日，风雪交加，陕北高原银妆素裹，几十匹战马疾向延安古城进发。这是周恩来、邓发、李涛、李克农、罗瑞卿、童小鹏等肩负重任去西安。毛泽东致电张学良，告之周恩来已出发去延安，让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在西安接待、会见各界人士，介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做通张、杨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张、杨等同意和平解决事变。

蒋介石被扣押之初态度很对立，不吃饭，不与张、杨说话，扬言“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还装模作样地给宋美龄写遗书。后来见到南京来的瑞纳和宋美龄带来的信，一种莫明的心情涌上心头，不禁大哭起来。又见张、杨无加害之心，态度有所改变，饮食照常。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时写给蒋介石的信

12月23日，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同张学良、杨虎城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两天正式谈判，达成如下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的具体的救国办法。第二天，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称蒋介石为“蒋校长”“委员长”，既严肃批判了他历年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同时又回顾了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贡献，热忱地希望国共再次合作抗日。面容憔悴的蒋介石不时地点头，目光里流露出感慨和羞愧，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要联合红军抗日，还表示回南京后要请周恩来到南京和他直接谈判。

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基本已成定局，但一部分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和西安少数高级人士坚持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呼声仍然很高。他们认为蒋介石的诺言必须有所保证，如协议要由蒋介石签字，中央军要立即撤到潼关以东，缓冲地带要由阎锡山部驻防，等等。周恩来、张学良耐心地开导他们：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蒋介石即使在协议上签了字，他仍可以撕毁；中央军退出潼关以东还可以再来，至于阎锡山这个人一贯老奸巨猾，怎能相信他会严守中立！现在团结抗日是主流，蒋介石若自食其言，他就在国人面前输了理，必将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蒋介石不会不考虑。持有条件释放蒋介石意见的人，虽然觉得周恩来、张学良讲得有道理，总觉得这样放蒋太便宜他了，不免议论纷纷。

张学良见到这种情形，不免有些担心，怕夜长梦多，于是

决定提前释放蒋介石。12月25日，张学良秘密将蒋介石、宋氏兄妹送往机场，登上飞机，亲自送回南京。但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翻脸不认人，无理扣押了张学良。

西安事变在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避免了国内更大规模内战的发生，全国人民渴望的国内和平终于实现了。这是历史的重大转折，它结束了10年之久的内战，迎来了全民族抗战，也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个和平局面，是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奋斗得来的，来之不易，理所当然地为全国人民和历史所讴歌。

◎ 国共两党恢复谈判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出尔反尔，违背在西安被扣时期许下的诺言，使开始趋于缓和的国内局势，又骤然紧张起来，内战的阴影笼罩着西北大地。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当前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无论如何要把握住这个大方向，坚决维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使国共关系的良好开端向前发展，最终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同国民党谈判。

谈判的主要内容有：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红军驻地与给养问题、西路军问题。关于共产党方面提出释放张学良，国民党予以拒绝，并制造一出审张、赦张、扣张的闹剧。但在停止内战问题上，蒋介石于1937年1月14日命令前方各军，没有得到总攻击令，不许对西安发动进攻，而总攻击令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达。关于红军驻地和给养问题，国民党方面不同意红军驻陕南的要求，许诺红军若回到陕北，待国民党三中全

会后按中央军待遇，按人马实数解决。对西路军问题，国民党方面意在消灭西路军，拒绝下令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疯狂围攻。

国共两党恢复谈判正值国民党筹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之际，中共中央为尽快促成国共合作，在2月初拟就了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要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将中共所提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共中央在电文中又说，如果五届三中全会能接受上述五点要求，将其定为国策，那么中共愿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三、在特区政府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电文最后说，“国难日亟，时不待我，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希望三中全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于2月10日送交国民党，它是国共关系史中的重要历史文献，既表明了中共对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基本政治主张，也为以后的国共谈判确定了基本原则立场。根据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文的精神，在潘汉年同南京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的同时，留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团从2月上旬至3月中旬，同西安国民党当局就国共合作举行了谈判。

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西安当局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谈判主要内容包括政治问题、红军改编问题、苏区改制问题和西路军问题。



▲参与谈判的中共代表，右起：周恩来、叶剑英、博古。

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对中共代表提出的条件原则上没有异议。但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双方争论非常激烈。中共代表力争红军编制要多一些，并应保证有较好的发展条件，最初曾拟提出编四个军、十二个师，每师五个团，组成一路军，后来考虑如果编制太大，恐怕南京国民党政府产生恐惧，对谈判反而不利，于是改为主力红军编四个师、十六个团，另编两个工兵师，总人数6万；要求改编后的红军设总指挥部，军队保持独立性，拒绝国民党向部队派人。国民党非常清楚一支强大的红军武装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因此国民党的方针是改编，改编不成只允许最小的编制。蒋介石最初只允许红军保持3千到5千

人，后来编两个师，每师四个团，总人数达 1.5 万。关于红军的给养，中共代表提出红军改编后按中央军统一待遇，从 1937 年 2 月起每月发给 80 万至 100 万元，又请发临时费 50 万元，以解当时燃眉之急。国民党原则上答应在红军改编后解决红军的供给，数目未定，同意先发给临时费 30 万元。

这一段国共谈判，除西路军问题由于国民党拒绝讨论而毫无成效外，其他问题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均有进展，并曾达成如下协议：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务三民主义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党政府分批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候公开合法存在。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红军驻地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和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中央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各级干部由自己推选，呈请军事委员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四、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五、现有红军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个旅、十二个团，及其他直属之工兵部队、炮兵部队、辎重部队和通讯部队。原有的红军骑兵编成一个骑兵团，约 1500 人马。三个国防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改编后的经费、给养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六、红军编余的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遣散。红军中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其数目经费，由行营及省府商定。

以上协议文本，本来是责成顾祝同、贺衷寒迅速上报蒋介石审核，以便执行。但是顾祝同、贺衷寒却无理加以扣押，并

进行单方面修改。如在协议中将红军人数减少到3万余人，取消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向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机构中派遣副佐人员，将“陕甘宁边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删去“民选制度”一语，将“要求”一词改为“请求”，“承认”一词改为“服从”，将红军改编后的干部“由自己推选，国民党军委任命”，改为“待由中央派遣”，等等。中共代表对顾祝同、贺衷寒单方面的、侮辱性的修改协议行为极为愤慨，并将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中共中央在3月12日给周恩来的指示中说：“贺、顾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关于此点，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并要周恩来在两周内返回延安，明确告知贺、顾“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3月16日，中共中央重新拟定了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五条，准备由周恩来带到南京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这十五条方案和原协议比较，立场更加强硬了，如把“承认三民主义”改为“承认革命的三民主义”；规定改编后的红军的总人数不得少于4.3万人，不提国民党派人来联络红军的政训工作；要求南京当局“释放政治犯，立即开始在全国各地释放共产党员，不再逮捕共产党”；要求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修改国防会议条例等。

虽然这次谈判由于顾祝同、贺衷寒的捣乱，再次达成的协议都被破坏，但总的形势对中共有利。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著名提案。宋庆龄在全会作了《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演说，指出中共的“五项要求”完全正确，批判了汪精卫的“剿共”提案；强调“救国必先

停止内争”，必须联合共产党。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所谓《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决议中虽然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进行了诬蔑、攻击，但规定了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制度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对五届三中全会的建议，接受了中共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已初步形成。

◎ 相遇西子湖畔与庐山谈判

阳春三月，江南莺飞草长，鸟语花香，西子湖碧波荡漾。游人接踵而至，流连忘返。周恩来身负国家民族重任，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杭州西湖，无暇欣赏这江南美景，急于同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从三月中旬到四月上旬，谈判告一段落。在谈判中，周恩来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六项要求和承诺，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应作出五个方面的保证。此外，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了六点口头声明。

蒋介石倾听了周恩来的意见，并就两党历史关系、两党合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会谈主要集中在苏区改制和红军改编两个问题上。

关于苏区改制问题，周恩来提出，我党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在红军驻屯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主制度；边区必须是一个整体，不许分割，其行政人员由地方推荐，中央任命。蒋介石说：边区可以是一个整体，不予分割，但边区的主要行政长官要由南京出，此人可以由你们在国民党内挑选；边区政府其他副职，均由你们推荐，工作也由你们自己干，国民党不来干涉。蒋介石解释说：“南京方面

出一个人任正职只是挂个名，目的是为了应付各方，否则我不好办。”又说，几个月后召开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共产党可以派人来参加。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说，红军可以取消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和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准备为国防需要而调赴前线；红军具体编为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及其他直属部队，总人数不得少于4万人，原苏区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及边区保安队；三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各级指挥员由我方推荐，国民党任命，国民党不得向红军派遣副佐人员及政训人员；红军改编后，各种薪饷待遇应与中央军相同；红军防地应增加。蒋介石表示：军队人数不与你们争了，总司令部也可以设，副佐人员及政训人员也可不派，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但南京要向改编后的红军派人联络。蒋介石还表示，部队改编后的粮食接济等一定设法解决。

在会谈中，蒋介石承认共产党是有革命精神和民族意识的，是新生力量，认为共产党几个月来在全国发动的和平运动效果很好，承认过去因国共分裂导致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蒋介石似乎有所醒悟地说：“我过去有错误，要检讨，你们也要检讨你们过去的决定，坚持新的政策。”他还表示今后再不要打内战，要永远合作下去，“我死了也不要分裂，免得英、日联合起来瓜分中国”。蒋介石还要周恩来拟订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说，制定一个共同纲领，是保证两党长期合作的有效办法。蒋介石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

这次杭州谈判，总的说起来比较顺利，也取得了一定成果。4月4日，周恩来离开杭州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并起草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1937年4月初，周恩来在西安谈判后回到延安，左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从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到6月中旬，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召开了苏区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在这些会议上，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实现国内和平后的新政治形势，把“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作为党在新时期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批判了只要抗日、不要民主，抹煞阶级斗争的右倾观点和关门主义的“左”倾观点；着重强调了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刘少奇作了《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发言；《关于白

区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关门主义错误，阐述了党的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这些会议都是党在新形势下为迎接国共合作而召开的，为全民族抗战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为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艰苦奋斗，但是国共两党从水火不相容的冤家对头到成为真正的朋友，不可能一帆风顺。所以，谈判任务仍然很艰巨。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7年5月下旬前往西安，准备与顾祝同进行谈判。到达西安时，恰遇蒋介石到洛阳巡视，于是周恩来偕同林伯渠于5月23日赶到洛阳同蒋介石会晤。蒋介石说国民党不久将在庐山召集一次全国各界人士的救国谈话会，我们到庐山去谈判吧！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6月上旬，周恩来携带中共拟定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草案》等文件抵达庐山。国民党方面参加这次谈判的除蒋介石外还有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谈判集中在下面四个问题上：统一战线组织形式问题、红军改编问题、边区政府改制问题和释放政治犯等问题。在谈判中，蒋介石在上述四个问题上均有后退，如统一战线组织形式问题，不同意周恩来提出的两种形式，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介石指定的国民党若干人和共产党同等数目干部组成，蒋介石拥有最终裁决权，反对包括其他政党派别参加；红军改编问题，改变了杭州会谈时允许红军改编后成立总指挥部的承诺；关于边区政府改制问题，仍坚持由南京派人任正职的意见；释放政治犯问题，拒绝释放“七君子”，只允许将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分批释放。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来做事”的挑衅性言论及主张进行了巧妙的反驳。

这次庐山谈判虽因蒋介石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而使双方仍

存在不少分歧，无法达成协议，但谈判还是给两党合作创造了良好气氛。6月19日，周恩来经西安返回延安，向中央作了详尽的汇报。中共中央为了早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郑重考虑了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决定在许多问题上再作出让步，重新拟定了十五条谈判方案和有关文件。其主要内容归纳为下列各点。

一、中共原则上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在双方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两党推选出同等数目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并同意他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的决定权。但同盟会不得干涉两党内部事务；同盟会的决定，两党都必须执行；同盟会的议案若违背了共同纲领的精神，两党之任何一方，均可拒绝讨论；两党之任何一方，如有违背或破坏共同纲领及同盟组织原则时，同盟会最高会议得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补救。中共提出的意见既照顾了蒋介石的要求，又对他借同盟会搞独裁给予制约。

二、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阐述了国共合作的三大纲领和中共的四项保证。三大纲领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必须切实迅速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实行民族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必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三、重新起草了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纲领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部分共五十二条。其基本内容是：对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解放；对内实施宪政，保障民权自由；发展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民生幸福。这个纲领把三民主义与抗日战争实际结合了起来，也把三民主义同中共民主革命的纲领结合了起来。

四、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坚持必须设立以朱德为首的总指挥部。希望国民党尽快发表红军改编的名称、番号；如继续拖延不决，红军将于1937年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以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4.5万人，其他编为师直属队，总部编3000人，地方部队、保安队编1万人。

五、在边区改制问题上，同意在宋子文、张继、于右任三位国民党人士中选一人到边区政府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如南京在此问题上拖延不决，中共将于1937年7月中在边区实行民主选举。

六、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应在全国发行；民主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名额增加数倍；修改宪法草案。

中共中央拟定的上述方案及有关文件，有的已经电告南京。但两党还没有来得及在一起逐一磋商，七七事变就发生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 卢沟桥的枪炮声

1937年7月初，北平（今北京）西南的丰台和宛平县城以东的日本驻军，连日来不断地进行所谓“军事演习”，从一开始使用训练弹到使用实弹演习，枪声不断。6日，北平地区降了一场罕见的大雨，呼啸的狂风卷夹着雨柱拍击着宇宙间的一切生灵。然而大雨并没有能中止日军的演习。驻守在宛平县城和卢沟桥畔的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3营官兵，警惕地注视着日军的“演习”。上午，日军演习部队冒雨来到宛平城东门外，要求让部队通过县城到长辛店演习，理所当然遭到3营官兵的拒绝。日军退回丰台。

7月7日下午，3营官兵在回龙观大殿举行战前动员大会。营长金振中进行了动员：“有一点是真的，谁也不能不承认，这就是鬼子兵的演习进行得非常认真，看样子他们真的要干起来了，今日开会就是要告诉大家：疯狗就要扑出来咬人了！”

大家都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着。金营长接着说：“这么大的雨，日军还在动用步兵、炮兵、战车搞联合演习，现在看来他们的狼子野心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暴露，是气势汹汹的暴露！是急不可待的暴露！是恨不得把整个

中国都吞掉的暴露！”

每个与会者都认真做着记录。有人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很大的狼头，那狼的舌头吐出来足有一尺长……

“日本人马上就要下手了！我们的头脑必须清醒，否则就要被动挨打。各连立即再检查一次战略工作的落实情况，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一旦发生敌人向我们进攻的事情，坚决回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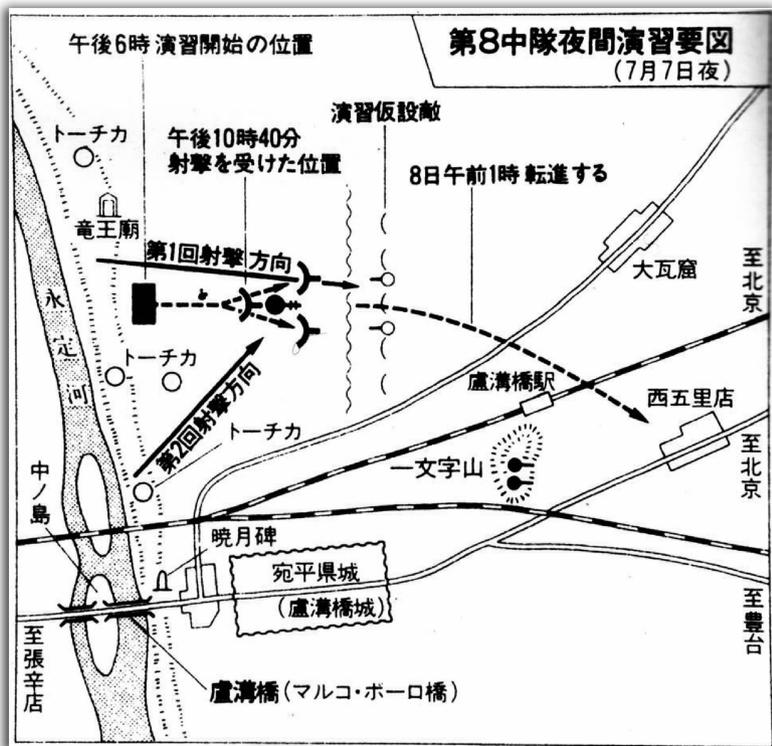
金营长把握紧的拳头高高举起：“如果有一个来犯的鬼子从我们的火网里逃走，那就是我们做下了有辱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追查责任，首先要追查在座的各位，用军长的话说要打屁股的。”他停下来平稳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说：“当然，那条规定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这就是日军进入我们阵地百米之内，我们才能还击。”

他又举起了拳头：“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战士们跟着金营长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阵阵雄浑的口号声响彻在卢沟桥上空。

7日深夜，雨还在下着，宛平县城东边突然响起几声清脆的枪声。枪声惊醒了宛平县城每个熟睡的居民。接着3营部队集合的哨声和跑步声使大雨中的宛平城在震颤。金营长立即拨通了旅长何基沣的电话，报告情况。何旅长明确指示金营长：“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回击来犯的敌人！”同时给第129团下达三条命令：“一、不得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如果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处。”

大约深夜11时40分，日军向中方交涉，声称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要求让部队进城搜查。真是血口喷人！时钟的指针刚刚指向零点，激烈的枪声又响了起来。这时驻中国的日本使馆武官给北平打威胁电话，声称如果再不允许他们进城搜

查，将用武力保卫前进。这是赤裸裸的战争威胁！中方给他们的回答很明确：不能同意你们进城，如果进城，一切后果由日方负责。随即日军包围了宛平城。



▲ 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日军第八中队夜间演习图（1937年7月7日）

中方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同意由双方派出代表同往宛平城进行调查，然后再谈处理办法。中方派出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参议林耕宇和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方有冀察绥靖公署日本顾问松井、日军辅佐官寺平和秘书斋藤。

就在双方代表乘车前往宛平城时，日军大队人马正向回龙观和平汉铁路桥开进。在双方就所谓士兵失踪问题进行调查处

理，开展唇枪舌剑辩论时，日军已做好进攻宛平城的军事准备。攻城的枪炮声代替了谈判桌上的较量。

枪炮齐放，宛平城立即淹没在硝烟中，夜空中窜起一股股尘烟。中国守军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流弹在空中相撞，发出铿锵之声，一群被惊飞的山雀穿过永定河飞向远方的群山。



▲ 驻守宛平县城的二十九军士兵跑步进入阵地

枪声、炮声不时震动着宛平城里的谈判桌。王冷斋指着外面的枪炮声责问松井等日方代表：“是日军首先开枪破坏大局，酿成了这次事变，责任完全在日方！”

松井无话可说，只是连连道：“阁下息怒！阁下息怒！”

王冷斋指着松井说：“你必须承认，日方要负完全责任！”

松井进行强辩：“开枪或许是出自误会。我们还应该致力调解此事，勿使扩大！”

“误会？宛平城都要被你们的大炮摧倒了！”王冷斋愤愤地甩下这句话破门而出。

卢沟桥事变完全是日军有预谋、蓄意挑起的侵华战争。日

军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在七年后的1944年多次说过：“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出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据今井武夫的回忆，在事变前一个月，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发生1931年9月18日‘柳条湖’一样的事件”。6月30日，满铁总裁松井洋右派驻北平的人士曾和人打赌：“一个星期之内，如果不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就把我的脑袋给您。”由此可见，卢沟桥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

◎ 中华民族的呼声

卢沟桥被日军占领了，第二十九军官兵浴血奋战的呐喊声停止了，枪炮声停止了，仿佛中国的一切都凝固了。等待中华民族的将是什么？是当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任意宰割的亡国奴，还是挺起胸膛，拿起刀枪杀豺狼？一位叫“流火”的作者，写下了铿锵的诗句：

怒吼吧，卢沟桥！
我们抗日的日子已经来到。

忍辱负重已非一日，
祈望和平亦非一朝，
可是我们得到的是，
卢沟桥头的无理取闹。

如今已有二十九军的崛起，
用铁血回答着敌人的横暴！
听呀，杀敌的喊声起了，

健儿们的鲜血已洒在北国的荒郊！

不要迟疑，不要退，
让我们大家持着枪和刀，
前进吧，热血的男儿啊！
把数十年来的仇恨一齐报。

卢沟桥，怒吼吧！
我们抗战的时刻已经来到。

这诗句，像号角，震颤着每个中国同胞的心扉，抗战的时刻已经来到！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震怒了中国人民。各阶层、各团体、著名人士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对日宣战。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发出“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告。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钢铁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通电全文发表在1937年7月12日出版的《解放》周刊上，转抄如下：

本月7日夜10点，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果，即将扩大成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

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中国的同胞们！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37年7月8日

7月9日，红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愿立即改名国民革命军，并请

受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北平宛平城和卢沟桥弥漫着日军炮火硝烟之时，在江西庐山的蒋介石正宴请庐山避暑的各国使节。大宴过后便是舞会。一束束忽明忽暗的彩灯和先生、太太、小姐的舞步随着舞曲的节拍，有节奏地一起旋转。蒋介石没有跳舞，在休息室里闭目养神，很晚才回到别墅，简单洗漱后立即安睡。大约11点钟，侍从室的电台忽然收到南京急电：“卢沟桥出了岔子，二十九军同日军发生了冲突。”

侍从室主任（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拿着电报考虑要不要叫醒蒋介石。他推开蒋介石的卧室的门，见蒋介石正熟睡，便把电报纸轻轻放在办公桌上，然后退了出来。

蒋介石一觉睡到8日清晨，一起床就看到南京急电和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战况报告。他看罢电报后，脑袋嗡的一下几乎晕了过去。卢沟桥出事虽在意料之中，但事态恶化得这么快，是他始料不及的。

当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文字：“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将与宋哲元为难，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他致电宋哲元：“宛平城将固守不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这一年的夏天，天气反常的热。灼热的阳光从云缝中射出，把庐山烤得像一个火炉，往日清凉似泉的浓荫也躲了起来，游山观景的旅行者也被这酷热的天气赶进了屋内，但室内的闷热比外边的高温好不了多少。

蒋介石倍感天气的炎热、日光的焦灼，加上这些天来从卢沟桥畔不断传来的战况更使他坐立不安，在房内走来走去。他希望这只是偶然发生的地方性事件，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

赔个礼、道个歉就会烟消云散。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卢沟桥事态的发展，表明这只是日军全面侵略战争的序幕而已，所以蒋介石非常烦恼和不安。卢沟桥的枪炮声使蒋介石想起周恩来对他说的的一句“战争迫在眉睫”。

那是西安事变发生以后的事。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努力下被释放了，碍于面子，放不下总裁的架子，他当然不会把感激之情流露于脸上，但他不能不记着共产党人的“救命”之恩。在双十二协议签订后，曾就中国形势的发展动向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只说了上面六个字。说实话，蒋介石对“战争迫在眉睫”不以为然。对于战争威胁的存在，他什么时候都承认，但对“迫在眉睫”却实在不敢苟同。不过周恩来的才华和学识，使他不得不把周恩来的话放在绝对重要的位置上，否则，后来他就不会把他的智囊人物集中起来，就中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中国的对策问题进行商讨。周恩来关于“战争迫在眉睫”的警告使他揣上了一块心病。卢沟桥事变发生了，而且日军完全是一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势头。日本政府在事变发生后，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华战争。一筹莫展的蒋介石如果早在半年前重视周恩来对他的警告，做些防范准备，就不至于在日军进攻面前束手无策了。现在他不得不考虑要表明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 妄想强盗发善心

这个态度怎么表，从他与陈布雷的一段对话和庐山谈话中可以找到答案。

陈布雷跟随蒋介石 10 年，一直是蒋介石的秘书和得力助手。在蒋介石的众多秘书中，陈布雷几乎包揽了蒋介石政治舞

台上的全部重头戏。蒋介石对陈布雷宠信倍加，陈布雷对蒋介石可以说是“士为知己者死”。在日本侵略面前，陈布雷也有激进、革命、爱国救国的愿望。

这一天，蒋介石召陈布雷到自己的办公室，示意他坐在自己的对面，摇晃手中的电报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处心积虑地谋算我们，难道我们就甘心做瓮中鳖？”

陈布雷立即意识到总统今日有重大决策出台，心头不由得兴奋起来说：“就在我们力求和平之时，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已，连世界舆论也震惊异常。日寇天天都在逼着我们抗战。”

蒋介石接着说：“近日以来，我常常有一种事态恶化的不祥征兆，噩梦夜夜不断。不仅仅是个卢沟桥，这座桥以及桥头的宛平一旦失守，北平为何不能变为沈阳？南京又为何不可能变为北平？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卢沟桥事件的推演，关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陈布雷说：“日军一面搞谈判，一面调遣大批军队开入我国河北省内，他们要干什么，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的准备不能不搞，不能不早搞，不能不大搞！”

“布雷，你刚才那句话说得极好，现在是日本人逼着我们抗战，我们不能再犹豫了，要真刀真枪地拼民族的性命，才可能求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把手中的电文交给陈布雷说：“我要找一些人就抗日问题谈一次话，你先拟个稿子，我们刚才谈话的主要内容都可以写进去。当然是越快越好。应该说这个谈话很重要，它是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在公开场合第一次动员军民奋起抗日的谈话，要看出政府和我个人的决心。”

7月1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联名邀请全国各大学校长、教授和各

阶层代表、各社团领袖，新闻界著名记者等 100 多人召开共同谈话会。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后国人称之为《蒋委员长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声明》，全文如下：



▲ 蒋介石在庐山发出“抗战到底”的号召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已，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 2 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总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

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中全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或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件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古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

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变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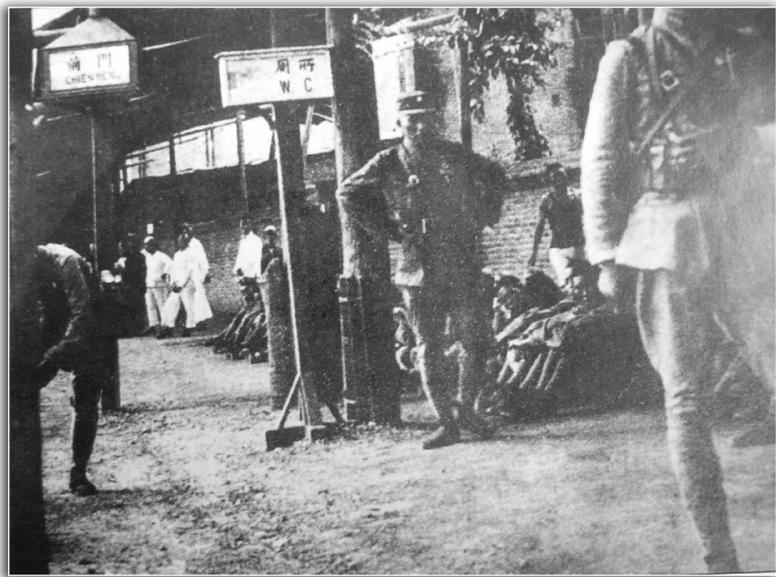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

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察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政府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鲜明的政策性谈话，表明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



▲北平前门火车站等候撤离的第二十九军部队

的欢迎。但是，蒋介石在日本政府内“稳健派”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影响下，仍然把卢沟桥事件作为“地方事件”处理，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让外交部和驻日大使许世英同日本进行交涉，让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宋哲元与华北日军进行谈判，争取“和平根本绝望前的一秒钟”，做着所谓局部事件、和平解决的美梦。

◎ 和平美梦的破灭

卢沟桥畔中国士兵的鲜血在流淌，也染红了日本东京上空的早霞。当中日双方达成所谓“停战”协定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日本军界所谓“不扩大派”感到高兴，而“扩大派”当然不舒服，恨不得一个早晨把中国打败、占领。

什么是“扩大派”与“不扩大派”？

七七事变后，就要不要把一场局部冲突扩大为侵华的全面战争，在日本陆军中央部出现了两种意见，或者叫两派。他们在武装侵略中国上是一致的，只是各有其具体的想法。

“扩大派”是想快刀斩乱麻，迅速给中国一击，使之屈服。在这些疯狂者看来，中国不堪一击，只要用列车载运三四个师团的兵力开进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他们认为“中国的事变用一个月时间就解决了”。“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也是“扩大派”的强硬代表。“扩大派”占多数。

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策划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比较重视中国的抗战力量，他们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在卢沟桥发生的冲突。理由是：一旦真的发生全面对华战争，日本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更可怕的是苏联

会从远东出兵夹击日本，那样局面就不可收拾了。“不扩大派”有一个估计：如果日本不动员十五个师团的兵力，筹集55亿日元的军费，出兵中国肯定是失策。

杉山元的得意很容易使人们想到狂妄、野心四个字。一位外国记者是这样描述杉山元的：杉山元在卢沟桥响起枪声那些日子，饭量突然猛增，吃起来狼吞虎咽……法西斯分子侵吞别国领土、掠夺别人财富永远是“美餐”。豺狼的逻辑是吃人肉比什么都好。

从7月8日起，参谋本部宣布了向中国华北派兵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朝鲜抽调一个师团，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

杉山元踌躇满志，又是带着明显的担忧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派兵到中国去教训蒋介石，否则蒋介石就会以卢沟桥事件为借口收回满洲。这样，必定危及我们控制的朝鲜，最终使日本受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控制。”石原莞尔也在解释自己的主张：“今日的中国并非昔日的中国，这个国家现在是统一的，能够举国一致地动员起较强的力量。眼下我们与中国的冲突一旦发展成大战，必须是一场持久战，日本就会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一句话：我们必须避免这样的不幸。”

“扩大派”另一个代表人物、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立即反驳石原莞尔：“这可真是奇谈怪论！当年不是你策划了满洲事变吗？我们只不过是仿效你的事业而已，没想到你却打起了退堂鼓。”

石原莞尔不语。接着发表与石原莞尔针锋相对意见的是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他说：“石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其实只要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派出大量部队出兵中国，这是贯彻我们方针的

最好的策略。”

……

日本国内两派意见的争论传到了中国。于是，在中国对侵略者日寇也就有了两种态度。一种观点是坚决守卫国土，无情地回击强盗的侵犯。另一种态度是对日寇抱有幻想，总想稳住日军，使战局不要蔓延。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的态度也很明朗，他讲的话也很特别。

何应钦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曾悄悄提醒何应钦，如果中国军队不立即从华北撤走，局势可能无法控制。何应钦以反提醒的口气对喜多诚一说：“如果爆发战争，中日两国都将战败，唯有俄共与中共会得到好处。你现在不相信的话，十年后看。”

喜多诚一对老朋友的话很不在意，也没有公开反对。何应钦要尽到朋友的责任，接着说：“请你把我的话转告你的政府。同时，你还要告诉他们，中国人民将战斗到最后最后一兵一卒。”

何应钦是个预言家，他说的话果然特别。1937年7月说的话，不到十年，日本战败投降，战争的结果应了他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消息使正在召开的日本内阁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形势急转直下，会议当机立断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杉山元等人的派兵案被搁置起来了。内阁四相会议通过的“日本政府解决事件”的“不扩大”方针是：

一、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二、我们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反省，而能早日解决事件；三、如果中国方面不反省，使事态恶化，我方将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四、各阁僚应做好随时出席临时内阁会议的准

备；五、帝国政府的解决方针是：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道歉和对今后提出保证。

人们很容易从这五点得出一个结论：实质也是要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所谓“不扩大”方针和“扩大派”的主张没有区别，何以见得？请看：第一，它把卢沟桥事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方面，以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为前提来解决事变，提出要中国撤退军队、道歉；第二，它还提出“如果中国方面不反省”，日本将采取“适当措施”，这就再也明白不过地告诉人们，日本随时都可以找个借口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使事态扩大、复杂化。巴不得别人变成僵尸，他再用鞭子任意抽打，他一边打还一边念念有词：我打你是为了你活。

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强盗逻辑：明明在中国土地上行凶作恶，却用一本正经的面孔向中国政府提抗议。胡德坤在他所著的《七七事变》一书中进行尖锐的、一针见血的剖析：

明明是日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却反倒要中国方面道歉；明明是中国领土、中国军队的防地，却要中国军队撤出；明明是日本的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却无理要求取缔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团体。这完全是有意提出中国方面不能接受的条件，以制造事端，为扩大战争制造新的借口和时机，也是对日本内阁“不扩大”方针的最好注脚。

7月11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陆相杉山元在会上捏造所谓“驻在华北的军纪凌乱的中国军队在肆意地屠杀该地区的日本商人和侨民”的谎言，挑起与会者的反华情绪，连曾经说过“只要我活着就别想有一兵进入中国”的“不扩大”派首领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也同意向中国派兵。五相会议作出增兵中国华北的决定。下午3时，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五相

会议决定。4时日本天皇批准了内阁会议派兵中国华北的奏请。

7月20日，日本驻朝鲜的第20师团和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到达北平郊区密云、怀柔和天津。7月27日，日军参谋本部命令驻日本本土的第5、第60师团开赴华北，并向北平、天津进行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官兵英勇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猛烈攻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战场壮烈牺牲。7月28日夜，宋哲元等奉蒋介石之命从北平撤退到保定。7月29日、30日，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随后向华北腹地大举进犯，并染指上海。8月13日，发生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向中国军队射击事件。中国京沪警备司令长官张治中率领第87师、第88师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并于14日对虹口、杨树浦一带的日军据点发动全面攻击。



▲ 中国军队在淞沪抗战中的街心堡垒阵地

日军一系列的侵略行径，打破了国民党政府的和平美梦，使其不得不重新面对严峻形势。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并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并调动几十个师的兵力，在上海对日作战，这就是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

◎ 国共第二次庐山会谈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明确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的一切决心”，“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937年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应蒋介石的邀请，第二次到庐山和国民党谈判。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国民党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和康泽等进行谈判。

蒋介石由于对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侵华形势的严重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国共合作仍没有紧迫感，因此在谈判中不但不作丝毫的妥协，反而提了不少令中共难以接受的条件。如在红军改编问题上，他反对设立总指挥部，强调朱德、毛泽东必须出洋，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出，连副师长、副团长、副连长都要由南京派；在边区改制问题上，他反对中共提出的宋子文、张继、于右任中任何一人任边区政府正职，提出由丁惟汾出任边区政府正职，还提出南京也要向边区派专员、副县、副区长等。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上，蒋介石不同意文件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要修改，反对在7月中旬发表，竟将文件搁置了起来。

针对蒋介石立场的大后退，代表们的态度就更加严厉。周恩来提出，改编后的红军不仅要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而且还要保持原有政治部，由任弼时、邓小平分别任正、副主任；无论军队或政权，中共的原则是“包办”，“国民党不得插入一人”。由于谈判中双方立场相距太远，无法达成协议。7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暂停谈判，周恩来等离开庐山到上海，以观时局的变化。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11日下午4时，日本天皇批准了内阁会议关于向中国华北派兵的奏请。

7月11日下午17时15分，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官参见天皇，上奏海军的用兵事宜，得到批准。

7月11日下午18时24分，日本政府正式发表《关于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竭尽全力为他们的武装侵略行径进行无耻的辩护，声称：

一向与我合作负责的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我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第二十九军虽曾尽力和平解决，但7月10日夜，突然再次向我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而不断增加其第一线的兵力。……他们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谈判。

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不待赘言。为维护东亚和平，最重要的是中国方面对非法行为，特别是对排日侮日行为表示道歉，并为今后不发生这样的行为采取适当的保证。由此，政府在日本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

7月11日下午18时35分，日本总参谋长载仁向关东军司令长官植田谦吉发出“五十六号”命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所辖的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空军六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和电讯、汽车等部队各一部去华北，受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并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于兵站、交通业务方面向中国驻屯军加以援助。

7月11日下午19时40分，参谋总部又发出“五十七号”命令，命令驻朝鲜的第20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同时命令第20师团长川岸文三郎，务须迅速到达华北，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7月11日晚上，日本首相近卫为统一国内舆论，在自己的官邸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士和新闻界代表开会，他以按捺不住的狂热口吻宣讲了日本政府派兵华北的决定，阐明了政府的决心，要求各界理解和支持。近卫在极短的时间里以两副面孔，先后作出几乎完全相反的决定。起初他坚决反对对华北派兵，眼下他竟然一反常态成了增兵华北的强硬派。这只能说明他对发动侵华战争早就是主战派之一，只是用无法抹掉的实际行动撕下蒙在脸上那块遮羞布而已。

7月11日夜，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向各方面发出了准备命令，海、陆、空各军种都紧急动员起来了。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协商后，作出了相应的战争准备，并与参谋本部达成《陆、海军关于在华北作战的协定》，其指导方针为：“力求把作战地区限制在平津地方，在华中、华南不行使武力，但在不得已时，应保护在青岛、上海附近的日本侨民。陆、海军要协同作战。在执行本协定时，要极力避免干预第三国的事情。”对于作战任务，协定规定：平津地区作战由陆军担任。海军负责运输和保卫，并协助在天津方面的陆军作战。在华中和华南由海

军为主担任警戒。在上海、青岛附近，陆、海军必要的兵力协同作战。1937年7月30日，日军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接着兵分四路，一路沿平绥线、同蒲线攻山西；一路由平汉线南下进犯中原；一路沿胶济线取青岛，占领整个山东；一路沿津浦线南下，直扑徐州，攻陷江淮。

在这种严重的形势面前，蒋介石已经下了抗战的决心。他在督促华北积极抵抗、在上海组织大会战的同时，于8月6日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讨论和制定抗战的战略方针。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也应邀抵达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于8月12日起同蒋介石、邵力子、康泽等进行了谈判。



▲1937年8月，国防会议期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黄琪翔、郭秀仪（女）等合影。

关于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分歧仍然很大。蒋介石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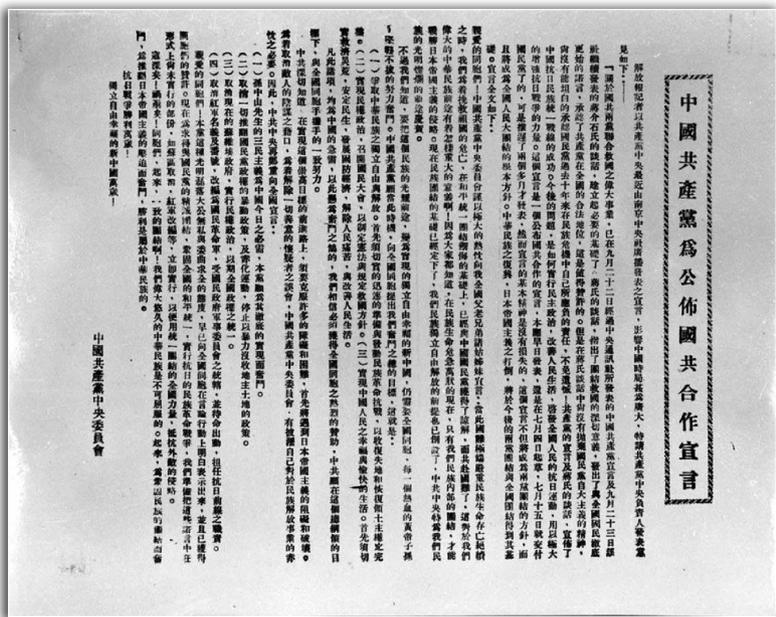
意中共所拟宣言的某些条款，康泽在修改宣言条款时，把“国民党”统统改为“政府”。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康泽把有原则的合作歪曲成共产党单方面屈服、投降，提出删去宣言中关于国共合作的三大纲领，只剩下四项保证。对这种恶意修改，中共代表表示愤慨，理所当然地坚决拒绝。毛泽东于8月14日电示周恩来等“不忙于要求发表”，将“三大纲领”改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由于上海会战正激烈进行，蒋介石希望红军能立即出动到前线作战以牵制日方兵力，减轻上海的压力，因而在谈判中作了部分妥协；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部队给养一律照发。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9月11日，又按照抗战序列，改称八路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以后习惯称为八路军。蒋介石让改编后的部队早日开赴前线。之后他仍坚持向八路军派人，提出向三个师和总指挥部派四个联络参谋。康泽提出的四个联络参谋人选不经中共同意就动身前往西安。9月20日，中共中央电示叶剑英、博古对此坚决予以拒绝，“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

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中共代表提出国民党不得向红军游击队派人，应该解决红军游击队的薪饷，划定对游击队较为有利的地方让游击队驻防。国民党代表提出要向游击队派人，并按南京指定的地点集中。双方意见分歧仍然很大，国民党采取拖延方针，不予解决。中共中央规定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未达成协议前先自行整编：集中五分之三兵力组成一个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或刘炎任参谋长；五分之二兵力在原地改为保安队坚持斗争。12月12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上海会战开始后，蒋介石曾多次催促中共军队全部出动，到五台山东北的涞源、蔚县等狭小地区，企图借刀杀人削弱八路军力量。为了逼迫国民党在边区政府等其他问题上继续作出让步，中共中央电示博古、叶剑英：我军“不忙于迅速出动”，也不明告出动多少。经过中共代表的原则斗争和不懈努力，终于使国民党作出妥协，双方代表在国共合作宣言草案上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全文

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始终不渝为之奋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全民族抗战的支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团结抗日的局面，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都汇集到国共合作的大旗下。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国民党的战略部署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之后，随即继续向华北增兵，准备以平津地区为阵地，向华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1937年8月中旬，日军相继向平津地区调集第20、第5、第6、第10、第14、第16、第108、第109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11、第2、第15旅团，连同原来驻平津的一个旅团和两个支队，共计20万兵力，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辖三个旅团、两个支队）和华北方面军（辖第一、第二军共八个师团，两个旅团）。日军狂妄地叫嚣“三个月之内以武力灭亡全中国”。采取长驱直入，速战速决的方针，沿平汉、津浦和平绥三条铁路线发起战略进攻，会战于沧州、保定附近，决战于平汉路地区；追击石门（今石家庄）、德州之线的中国军队，达到“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之敌”，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向日本屈服、投降，结束中国战局的目的。

1937年8月15日，日本下达侵华总动员令，华北方面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向平津集结。然后，第一集团军第20师团于9月14日向琉璃河进攻，第6师团由固安、第14师团由永清分别向涿县进攻。9月18日，涿州失陷。9月21日，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向漕河、满城进攻。22日，满城陷落，24日，保定弃守。日军第二集团军之第16师团、第10师团、第109师团由独流镇向津浦线北段进犯。9月10日，日军第10师团的陆、空、步、炮各兵种协同进攻马厂，第二天马厂失陷。9

月23日大城失守，30日桑园失守。10月5日德县失守，6日献县失守。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第5师团向平绥线、同蒲线上的南口进攻，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三个旅的兵力由多伦向张家口推进，并派遣大井支队由沽源南下进攻独石口、延庆县。8月26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攻陷了张家口。接着，日军沿平绥线继续向西进犯。9月11日，天镇失守。日军骑兵第1、第4两个旅团和伪蒙军骑兵九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出击，策应其主力对大同的进攻，结果大同的中国守军不战而弃城后撤。从9月16日至10月17日的一个月时间里，丰镇、集宁、凉城、陶林、武川、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和包头相继陷落。

◎ 国民政府的战区划分及防御部署

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已经侵占了察哈尔东部、热河，并制造了华北事变，企图消灭华北的中国军队。

针对日军的侵略企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5年制定了防卫大纲，将全国分为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有山西、绥远、察哈尔、江苏、浙江、福建、广西、广东区；第二道防线有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区；第三道防线有山西、绥远、陕西、甘肃、湖北、四川、云南区。蒋介石在视察了四川、陕西和云南后说：“对日应以长江以南和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云南、陕西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大后方。”1936年，军事委员会具体规定了国防军事主要任务：“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长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长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对日作战总方针为：“为保全国土完整，维护民族生存

起见，应该拒敌以沿海岸及平津以东和张家口以北地区，不得已时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强韧之抗战。”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四个国防区：抗战区为察哈尔、绥远、河北、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警备区为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绥靖区为四川、陕西、甘肃、宁夏；预备区为四川、陕西、湖南、湖北、广西、江西、贵州、新疆、青海、西藏、西康。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在抗战区分别设六个国防军指挥部，在其他区域设立预备军指挥部，并进一步划出五道自北向南的抵抗线，以淮阴、徐州、归德、开封、新宁、郑州、洛阳为最后抵抗线；将全国战场划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北正面，辖山东、河北、察哈尔、河南、徐海区；二是晋绥侧面，辖山西、绥远区；三是东正面，辖江苏、浙江区；四是南海岸区，辖福建、广东区；五是警备区，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



▲1936年参加第二方面战场绥远抗战的晋绥军

1937年1月，国民政府拟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国防作战计划》甲乙两案，同年3月修订完毕。该计划不但取消了继续内战的内容，而且在上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的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的形势作了较为确切的分析和预测，明确提出了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方针，要求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根据预定作战需要，全国划为鲁、冀察、豫、晋绥、徐州、江浙、闽粤七个国防区及陕甘宁青、湘鄂赣皖、川康、滇黔、桂五个警备区，分别置于第一线 and 总预备队的位置上。同时，还部署了第一至第五方面军分别在山东、河北、察哈尔、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战斗任务。这次国防区的划分，不仅体现了国民党从内战转向抗战的开始，也与七七事变后战区划分大体接近。

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主要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区划分。

第一次是在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制定了抗日战略路线，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区划分。根据抗日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的作战指导方针，抗战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程潜为参谋总长，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以河北省和山东省北部为作战区域，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刘峙为副司令长官，辖宋哲元、刘峙、卫立煌三个集团军；第二战区以山西省、绥远省和察哈尔省为作战区域，阎锡山任司令长官，辖杨爱源、傅作义两个集团军；第三战区以苏南、浙江省为作战区域，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辖张发奎、张治中、刘建绪、陈诚四个集团军，以及由谷正伦为司令的首都警卫军；第四战区以福建省、广东省为作战区域，何应钦为司令长官，余汉谋为副司令长官，辖蒋鼎文、余汉谋两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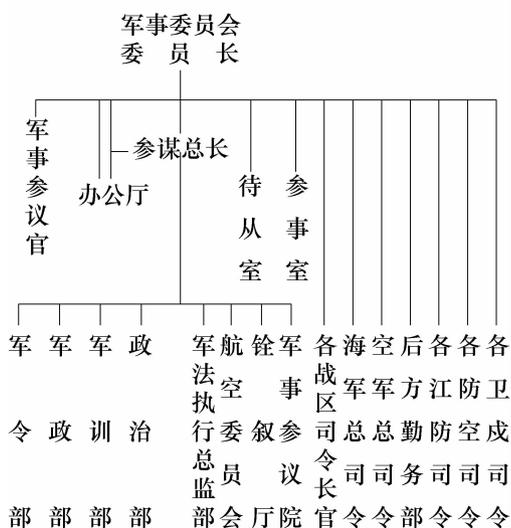
集团军；第五战区为连接南北两个战场而设，具有“中枢”地位性质，以江苏省北部、山东省南部为作战区域，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辖顾祝同、韩复榘两个集团军。此时中国陆军共有 170 万人，绝大部分兵力投入各战区。

这次战区划分，确立了战区作为正面战场基本战略单位的地位，初步形成了对日战略防御的作战体系。其特点是：首先，它是前一个时期国防区划分的继续和发展。早在 1936 年，国民政府就有集重兵于东南沿海的打算，认为日本陆军主力便于由东北向西南侵犯，更仗其海空军的优势，随时可能于青岛、连云港、长江三角洲、杭州湾、福建、厦门等处掩护其陆军的一部任意登陆，因此，将东南沿海置于“抗战区”内。这次战区划分，以七七事变前的国防区划分为蓝本，依据敌我军事态势，除了对华北地区的第一、第二战区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外，更多的是突出了华东地区的第三战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刘峙、汤恩伯屯兵华北，陈诚、顾祝同、张治中以及后来的薛岳均坐镇华东地区便是证明。其次，它体现了“持久消耗战略”的基本方针。所谓“持久消耗战略”，即战略上的持久战，“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这一战略思想确定后，为抗战时期的战略指导思想，无疑也是这次战区划分的战略指导思想。

改编后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分别划入第二、第三战区建制；整编后的地方部队，如桂系的三个集团军，川系的五个军，滇系的两个军，在淞沪会战后不久纷纷出境，迅速编入各战区序列。此次战区划分后，因抗战的需要，作过小规模的调整。一是少数战区作战区域的变动。如平津沦陷后，军委会针对日军进攻平汉线的战略企图，就将第一战区辖区改划为平汉线北段。如为便于华东战场的作

战指挥，福建省划归第三战区。二是第六、第七战区的建立与撤销。平津沦陷后，津浦路方面战事吃紧，军委会于9月初在津浦路北段设第六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后因作战区沦陷，于10月17日取消，历时月余。上海沦陷后，华东、华北战场形势日益恶化，11月25日军委会又成立第七战区，位于第三、第五战区之间，作战区域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川系首领刘湘任司令长官，陈诚、邓锡侯任副司令长官，辖五个军。该战区因抗战需要而设置，蒋介石也达到让川军出川的目的和以加速四川“中央化”，建立四川大后方的战略目的。1938年1月刘湘病死，川康实力派群龙无首，就撤销了第七战区。某些战区司令长官的调换。淞沪会战进行到白热化阶段，蒋介石自己辞去第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兼职，并在调走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后，又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参谋长程潜、桂系李宗仁分别出任第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中国军队作战机构系统表



为阻止日军南下、西进侵犯华北，中国军队以第一军团骑兵、第10师在码头镇、琉璃河、房山一线占领阵地，第47师推进至涿州；第三军在高碑店、涞水、易县一带设防；第五十二军、第17师在安新、漕河、满城、保定一带构筑工事。在津浦铁路沿线，由平津撤出的第二十九军在静海、马厂一带设防，河北保安队在河间集中；第67师在集结于文安、大城一带；第39师在沧县集中；第四十九军、第23师集中到德县一带。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保山西地盘，决定以赵承绶骑兵军协同第七集团军先袭取商都，以刘汝明第143师攻占张北，再向多伦推进。

◎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王阎锡山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王阎锡山，生于1883年，字伯川，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今属山西定襄县）。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留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不久，参加太原反清起义，被推举为山西都督。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参议。1914年被窃国大盗袁世凯任命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袁世凯死后投靠段祺瑞，1916年任山西督军，1917年兼任山西省省长。北洋军阀混战期间，先联冯拥段，后依附奉、直讨冯，进行政治投机，1927年自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悬挂起青天白日旗。1928年至1930年，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平津卫戍总司令、内政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太原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发动过冯（玉祥）、李（宗仁）倒蒋（介石）

的中原大战。大战失败后逃往大连，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潜回山西，1932年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后在山西大搞“自强救国”，成立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同蒲铁路（窄轨），整理山西省银行，发行晋钞，使山西成为他的独立王国。1935年华北事变后，迫于形势提出“守土抗战”口号。1936年由于日军对山西的步步进逼，加上国民党军队企图吞并山西，他被迫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采取联共抗日政策。同年9月，山西的进步人士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他担任会长，后和共产党秘密建立统一战线关系。1937年8月，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晋绥战事，统一指挥该区域的作战部队。当时这一区域的作战部队有：由晋绥军编成的第六、第七集团军，汤恩伯的第十三军、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刘汝明的第143师，红军改编后的八路军也属第二战区序列。



▲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的阎锡山

1937年8月上旬，日军以独立混成第11旅团为主力，在第5、第10师团等部配合下，进攻通向察绥和山西的重要咽喉——南口。另以关东军一部由绥北南下，猛攻张家口，企图截断平绥线，夹击南口的中国军队。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率所部第十三军及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在南口、居庸关、延庆、怀来一线，依托长城天险和日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卫立煌率第四十三军的三个师从石家庄增援南口。为策应南口方面的作战，阎锡山、刘汝明部及骑兵军分别向崇礼、张北与尚义、商都往北一带攻击日军。8月17日，阎锡山又电令傅作义率一个师又三个旅增援怀来；20日傅作义在怀来召开作战会议，准备反击进攻南口的日军。这时察北日军又向张家口发起进攻，于是傅作义率领第200旅、第211旅回援张家口。增援南口的卫立煌部在行至永定河右岸时，即遭日军阻击，旋即被迫撤走。张家口也因刘汝明部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迅速陷落。南口、张家口失守后，蒋介石又将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刚由第143师扩建而成）调往平汉路。这样，国民党的军队除高桂滋的第十七军归第二战区外，其余的部队已从绥东、察南撤走。山西的北部完全暴露，战事开始进入第二战区的范围之内。

阎锡山万万没有料到战局变化如此之快。他原认为，日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以一部兵力由蔚县向广灵佯攻，以主力沿平绥路西进，夺取大同以图切断晋绥之联络线；二是以一部兵力向天镇进发，牵制攻击，以主力进攻广灵，企图截断雁门关后路。于是他拟定了一个大同会战计划，实施机动的作战方针，其具体作战方案为：以李服膺第六十一军在西湾堡、天镇、阳高等地设防，占领既设的“国防工事”，阻击日军西进，掩护大同、聚乐堡主阵地，其任务是沿

平绥线节节抵抗，诱敌至大同外围，然后北移于镇边堡、长城线方面，归北兵团序列；以王靖国第十九军占领大同东面的聚乐堡南北线上的主阵地，吸引敌于熊耳山和长城线间的南浑河盆地；以骑兵集团军赵承绶、门炳岳部设防于绥东的兴和东北地区，刘奉滨第73师布置在广灵以北的火烧岭——洗马沟一线担任警戒；以杨澄源的第四十三军及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为南兵团，集结于浑源、东井集间；以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及绥远的两个骑兵旅为北兵团，集结于丰镇、得胜口等地，准备南北合击深入大同外围之敌；陈长捷的第72师和独立第2旅的于镇河部编为预备第一军，作为预备兵团，由阎锡山直接掌握；孟宪吉的独立第8旅设防于雁门关；章拯宇的独立第3旅部署在五台、龙泉关间。

阎锡山自己则于雁门关下的岭口设立行营，亲自督战。他自信这一计划万无一失，并上报蒋介石，很快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和鼓励。蒋介石还答应速派刘茂恩军到山西，归第二兵团建制。

但是，日本侵略军并没有如阎锡山设想的那样行动。1937年8月末，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伪蒙军的配合下，由张家口沿平绥线西进。9月2日先头部队进抵天镇城东永嘉附近。另外又兵分三路：一自张家口趋兴和，指向集宁；二由怀安逼阳原，进攻浑源；三从怀来扑蔚县，直插广灵，企图由长城内外形成对大同的包围，尤以第三路为主攻。9月上旬，日军进犯天镇，击破了李服膺部据守的永堡、天镇的“国防工事”，随即又攻下了阳高城。李服膺部一触即溃，不仅不能按预定计划北移，反而南逃大白堡，直抵桑干河南。李部的溃退，危及全线，使平绥线正面失去了防御力量。与此同时，日军板垣的第5师团的主力沿着蔚（县）代（县）公路进攻广

灵，在洗马河一带打败了刘奉滨的第73师，并紧逼不舍，直趋灵丘。

阎锡山得悉后大吃一惊，领悟到日军的主攻方向不在大同一雁门关，而是灵丘—平型关，攻占了平型关，就断了雁门关的后路。于是他急派孟宪吉独立第8旅驰赴平型关，增援第73师；另调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至大营，指挥高桂滋部十七军、第73师以及三十三军的独立第3、第8两个旅，在平型关南北的既设阵地阻敌。这时他对大同会战的计划开始动摇，当王靖国向他建议“大同无死守的价值”时，便下令放弃雁北和绥远，将李服膺、王靖国、傅作义等部一律撤至雁门关内。只留赵承绶的骑兵在绥远维持地方政权。这样，日军在未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于9月13日占领了大同。

大同会战的破产，使阎锡山极为沮丧。尤其是日军主力从他的背后插进一刀，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日军主力选择的进攻路线，是阎锡山原先以为最安全的地带。这里地形复杂，为用兵之大忌，是一个静态的战役走廊，但却是一个要害点，阎锡山是知道的，不过他认为日军人地生疏，是绝不敢冒这个险的。因此，他没有重视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适当兵力以防万一。这就形成了国民党大同一涿州防线的中间裂缝，也正是国民党第一、第二战区防御部署的空当。而日本人偏偏钻了这个空子。日军如果不是对这里的地形了如指掌的话，是不敢冒这个险的。想到这里，他不禁暗暗叫苦，十分懊悔地记起一件事来。

那是在1936年的夏天，他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窗板垣征四郎，作为关东军的使者，到山西拜访他。板垣征四郎一不坐飞机，二不坐车，而是徒步旅行，特别选定了一条路线，这就是经察哈尔省的蔚县到山西省的代县的蔚代公路，并对周

围地带也一一作了勘察。这些阎锡山是知道的，但他并不在意。当今天板垣征四郎率兵再次从蔚代公路直插他的背后时，他才追悔不及，但已为时过晚，只能是自食其果。

当阎锡山弄清楚日军主力的真正意图是攻取平型关时，他不得不忍痛放弃雁北和绥远，重新集结兵力，沿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阳方口一线设防，占领内长城的既设阵地，其重点在平型关。



▲ 晋绥军炮兵阵地

改编出征迎顽敌

◎ 洛川会议

为使全党和红军适应全国抗战后国内出现的错综复杂局面，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于 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聂荣臻等 22 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做了报告。张闻天也在会上做了有关政治形势的补充报告。接着就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兵力部署等问题，会议展开了讨论。与会者畅所欲言，激烈争论。

从遵义会议到这次洛川会议，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日益上升，特别是在战略问题上他有着无可争辩的权威。但是在战役问题和战术问题上他与其他领袖们时有争论，有时是非常激烈的。这正是共产党的民主作风，不搞一言堂，这是一种优良传统。

夏日陕北高原的阳光是灼热的，从南面的窗口照进窑洞，毛泽东打着蒲扇不停地扇风，点燃一支劣纸烟，环视了一下会场。这是一所私塾老师教书的窑洞，古朴的桌椅磨得溜光发

亮，看起来似乎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桌子拼在一起，20多人围坐在四周。三天激烈的争论之后归于平静，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的目光盯着毛泽东，等着他的高见。一股淡蓝色的烟雾从毛泽东的口中缓缓吐出，他稍稍提高了嗓门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在整个战略部署下，我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执行统一战略意图的灵活机动权，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尔后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通过广泛的游击战，达到开辟战后战场，支援正面战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洛川会议的会址

毛泽东停顿片刻，又抽了一口烟，朝坐在对面的林彪瞥了一眼。在三天的争论中，这位年轻的红军大学校长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激烈的争论。林彪主张以运动战为主，他的依据是十年

内战中红军曾经有过整师整旅歼敌的经验，特别是经过长征的锤炼，红军最明显的优势是擅长运动战。说服林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从南昌起义开始从排长一级一级升至军团长，加上当了一年多的红军大学校长，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他授课的讲义被译成四种文字传扬一时，因此他的发言逻辑性很强，条清目晰，有板有眼，看起来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他发言时总是不动声色，冷峻得像个哲学家，与诗人气十足的毛泽东形成了鲜明对比。

毛泽东微微皱了皱眉，望着对面那张白皙清瘦的脸，足足凝视了半分钟。虽然林彪已经表态支持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但是此言是否由衷？

林彪微闭双目，那两道著名的扫帚眉如阴云般永远垂挂在宽阔的额头下，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井冈山。那时他才20岁刚出头，就已经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颇有城府高筑、老谋深算的味道。由于他骁勇善战，仅三年时间便从营长升到了军团长。朱德在井冈山曾对毛泽东说：“这个伢子不可小视呀！”林彪带兵打仗很有办法，他本人也自视很高，他的军事才能很少有人怀疑过。不过，毛泽东认为林彪缺乏战略眼光，他们之间有过几次争论。第一次是在井冈山，林彪致信毛泽东，发出“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的回答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致林彪的私人信件，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第二次是在长征中，刚刚从遵义会议上获得指挥权的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林彪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大发牢骚，指责毛泽东“专门走背路，一个赤水河折腾了四次，部队都拖垮了”，并致电彭德怀要求他接替毛泽东的指挥权。这一次毛泽东不客气地回敬他“你懂什么？”

你个娃娃！”

洛川会议的三天辩论中，林彪再次显示出缺乏战略眼光的弱点。毛泽东不敢肯定他麾下的这员大将是否真的领会了自己的战略意图。辩论结束了，大家的思想和认识统一了，现在不再是个人的主张问题，而是党的战略方针的问题。林彪非比寻常将领，在长征中他作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曾肩负先锋大将的重任。全面抗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中央决定再次让他扮演这个重要角色。这位盛名之下的年轻将领能否当此重任？毛泽东的心里涌起一丝隐忧。

林彪似是从假寐中清醒过来，睁开双目正好与毛泽东的目光相碰。他的心为之一震，这是什么意思？林彪环视会场，见其他人都在聚精会神地聆听毛泽东的报告，赶忙挺了挺腰板，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他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带兵打仗了，去年3月中央红军刚到陕北，处境艰难，南有胡宗南的20万大军，西有剽悍的马家骑兵，北是茫茫大漠，只有东渡黄河向山西王阎锡山要人要粮。毛泽东决定以抗日的名义渡河东征，向山西发展。渡河之初正逢大雪纷飞，天地皆白，毛泽东诗兴大发，骑在马上吟成日后传颂一时的《沁园春·雪》。红军入晋大败阎军，但形势并不乐观。胡宗南率大军渡过风陵渡，沿河北上，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黄河东岸。毛泽东下令回师，北路的彭德怀连遇恶战，需要补充兵员，正好南路的林彪在晋西南征兵数千。毛泽东命令林彪调拨一部分新兵给三军团，林彪却没有执行。红军西渡回到陕北，毛泽东大发雷霆，批评林彪的本位主义。不久，一、三军团合并，大批中高级干部被精简。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将精简下来的干部集中起来学习军政理论和文化知识。林彪当了校长，在几孔破窑洞里教授了一年多的战役课。西安事变之后，他屡次请缨要求上前线带兵，都没有得到毛泽

东的批准。为此，他找朱德，也没有管用。总司令总拍着他的肩膀笑着打哈哈。林彪有些闷闷不乐，常有失宠的感觉。

洛川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在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就八路军出兵时机、数量及陕甘宁留兵多少、作战形式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 11 人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主席、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战的正确方向，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及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可靠的政治思想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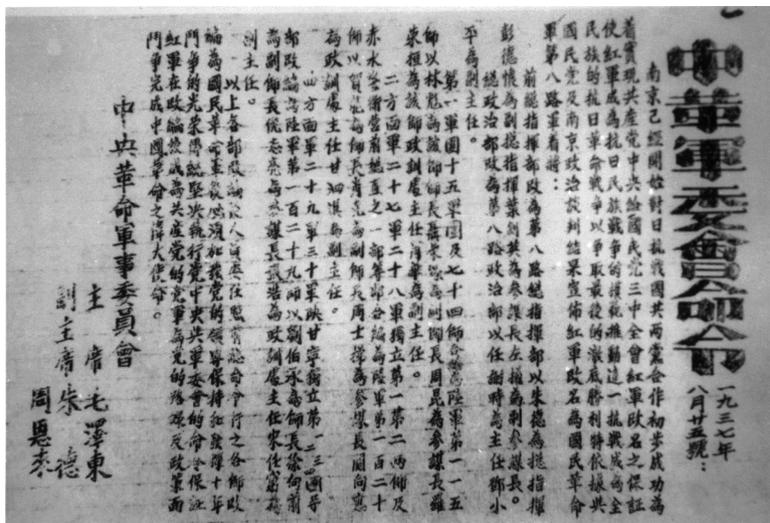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的洛川会议，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等待红军改编后开赴抗日前线。中共中央为促成全国团结抗战，从 1937 年 2 月起，就红军改编问题，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改编，取消、削弱和控制红军，因而一直拖到全国抗战爆发一个多月后，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时，国民党当局才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1937 年 8 月 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 1.5 万人。

洛川会议结束当天，8 月 25 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 月 11 日，按全

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及陕南第74师等部编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训处主任，肖华任副主任，下辖第343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第344旅（旅长徐海东）以及独立团和三个直属营，全师共1.55万人。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及独立第1师、第2师、赤水警卫营和总部特务团一部组成，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任副主任，下辖第358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第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及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全师共1.4万人。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军、独立第一至第四军和第十五军团的骑兵团等部编成，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张浩任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下辖第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第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以及教导团和五个直属营，全师共1.3万人。此外总部直属队3000人，全军共4.6万人。

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组成，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在前方军委分会领导下，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16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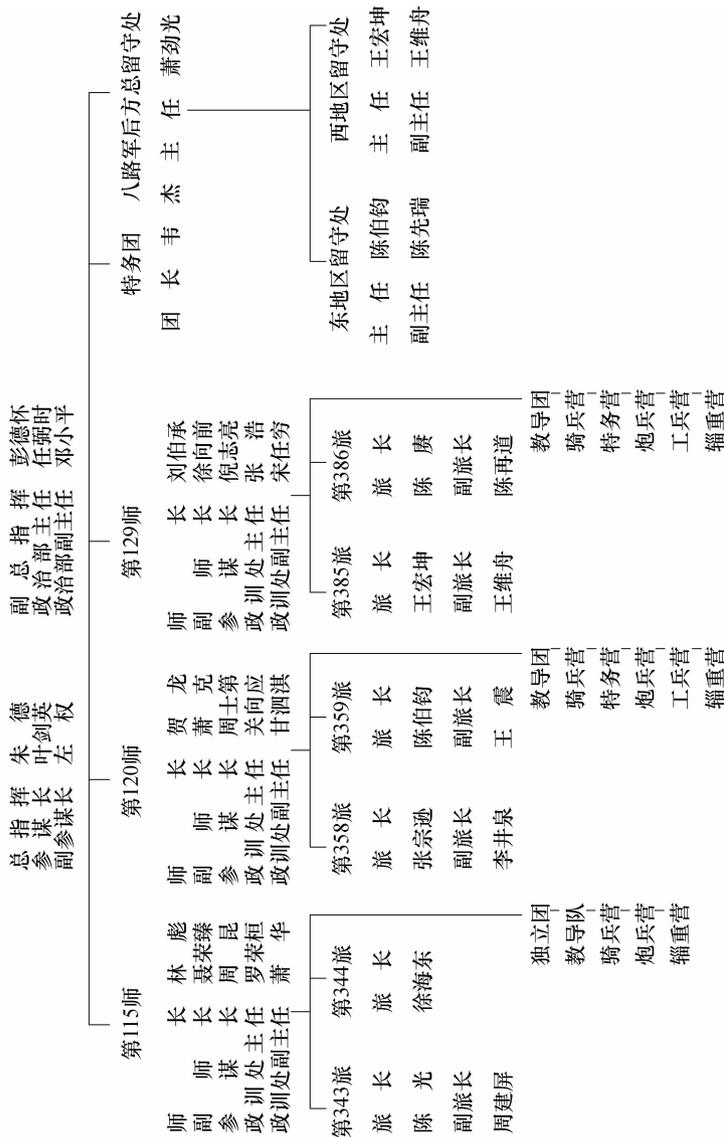
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总政治部，任命任弼时为主任。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因受国民党干涉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师、旅政治委员。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任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政治委员；肖华、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别任第343旅、第344旅、第358旅、第359旅、第385旅、第386旅的政治委员。并撤销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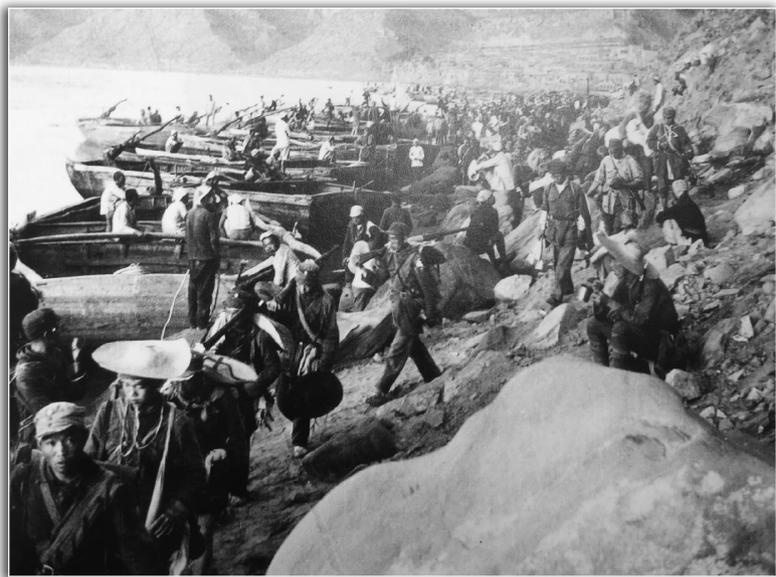
▲1937年8月中央军委关于改编的命令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红军改编中，坚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保持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人民军队的本色，胜利地完成了改编，并通过改编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一次普遍深入的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使红军顺利实现由国民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更加坚定地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奋斗。

八路军序列表 (1937年8月25日)



在日军不断增兵并大举进攻，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于8月22日，以第115师主力由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经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9月3日第120师主力由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出发，随第115师之后北上。9月4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由陕西泾阳县云和镇东进。9月30日，第129师主力由庄里镇出发东进。为使八路军展开于敌之翼侧和后方，向沿平汉铁路南进和沿平绥铁路西进之敌实行侧后的游击战，袭扰、牵制和打击日军，协同友军作战，张闻天、毛泽东于8月4至5日提出，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讨论同意，八路军全部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四省交界地区。根据这一战略部署，第115师、第120师向四省交界的恒



▲1937年9月6日，八路军总部开赴抗战前线。

山地区挺进。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为加强对后方留守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成立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以萧劲光为主任，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 以茶代酒送将士 饯行“美酒”壮行色

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生于1907年，湖北黄冈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军事教导团任排长，后任叶挺部队的一个连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第二十一军军部特务连连长。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参加湘南暴动，1928年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年底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28团团长，1929年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任红四军军长，1931年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领导下，指挥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和战斗，多次打败了敌人的军事“围剿”。1936年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

聂荣臻，生于1899年，四川江津吴滩镇人。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就读于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参加周恩来领导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团训练部副主任。1924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后转入红军学校学习军事。1925年8月回国，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为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参与向北伐军中派遣中共党员的工作。1927年7月中旬被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中组织张发奎部队两

个多团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同年12月参加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在起义受挫的紧急关头，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力量。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起调到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委参与指挥了漳州战役。同年冬起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长征过金沙江后与刘伯承一起率先遣队为红军开路。到达陕北后，率部参加直罗镇、东征和西征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



▲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

洛川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8月26日，陕北高原黄沙弥漫，阴云密布，正是山雨欲来之时。毛泽东、张闻天并肩走出窑

洞，兴冲冲地朝院子里即将出征的将领们走去。毛泽东提着一壶开水，张闻天抱着一摞大碗，朱德见状大笑道：

“大将出征，美酒钱行，诸位请入席！”

“此地荒僻，无酒无肉，权且以茶代酒为各位钱行。”毛泽东亲自为每位出征将领“斟酒”。

“怕是辣椒水吧，主席。”任弼时端起一碗茶吹了吹说。

“征程多艰，各位免不了流汗，此番不爬雪山就免放辣椒。”毛泽东捧起一碗茶，突然收敛笑容，厉声说：“刚收到南京急电，南口防线已经崩溃，华北危急！诸位出征可谓‘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祝诸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毛泽东捧碗咕咚咕咚一饮而尽。众将随后，满院都是豪饮之声。朱德用衣袖抹抹嘴唇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哈哈哈……”

毛泽东放下碗朝林彪、聂荣臻走去。聂荣臻连忙握住毛泽东伸来的手说：“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罗荣桓、陈光已经率一方面军出发五天了。我们从江西中央苏区带来的人马只剩这么多了，都是骨干分子，是革命的本钱。中央决定将这点本钱交给二位，你们要珍惜呀！”

“主席，请您放心！我们还要靠这点本钱大展宏图。”

毛泽东放开聂荣臻的手，对林彪说：“蒋介石虽然同意我党出师抗日，常言道，大军未出，粮草先行。可是我军已出，粮饷、弹药如何补给尚在谈判，我料定最终还得靠我们自己设法解决。与日军交战要尽量避免消耗战，否则打了上一仗，就打不了下一仗，我们的家底薄哟！”

1937年8月26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人乘坐一辆卡车从洛川出发，奔赴八路军

云阳总指挥部。一路上山路崎岖，到处是坑坑洼洼，一车人被颠得晕头转向。好在一车人说说笑笑便到了中部县黄帝陵。任弼时提议到轩辕庙去看看老祖宗的神像。朱德说：“今年清明节我和毛主席专门写了祭文，派人给老祖宗扫过墓，都去看看。”

朱德等人翻过遍布苍松古柏的桥山，涌进轩辕庙。果然，在黄帝塑像下供着许多祭文，林伯渠亲笔书写的那幅格外引人注目。朱德双手叉腰，气宇轩昂，朗声诵起祭文：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跎；越数千载，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河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朱德诵完祭文领众将脱帽朝黄帝神像鞠躬致礼。礼毕，彭德怀拱手道：“老祖宗得罪了，军情紧急，未备香火。等我们收拾了小鬼子再多宰牲口大祭老祖宗。”

彭德怀说完纵声大笑，声若洪钟。众人随朱德出殿，唯林

彪迟迟疑疑像是默祈什么，站在神像前发了一阵呆。

“老林，快走吧！”彭德怀在大殿外嚷道，“你是先锋大将军可迟疑不得。”

8月30日，汽车在大雨中抛锚，朱德一行只好顶着倾盆大雨徒步行军。当日下午抵达云阳总指挥部。罗荣桓、陈光率第343旅和独立团已经禹门渡口，徐海东、黄克诚率第344旅已过蒲城。

林彪、聂荣臻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决定连夜骑马奔赴西安，改乘火车经风陵渡过河去追赶部队。临行前，聂荣臻收到罗荣桓、陈光二人自禹门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谈到第685团团团长黄永胜不安心工作，与政委闹矛盾。刚好有一批红军大学（当时已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生抵达总指挥部，正等待分配。

“我去把杨得志要回来，让他代替黄永胜怎么样？”聂荣臻建议道。

林彪点了点头，朝门外走去，出门后回头说：“你去找杨得志谈谈，他长胖了。”

“报告聂政委，685团团团长杨得志前来报到。”

聂荣臻抬头见一位彪形大汉正朝他敬礼。杨得志将总政治部的通知递给聂荣臻，是任弼时的字体，墨迹还没干。

“真的长胖了，‘窑洞大学’的伙食不错么？”

“能吃饱就不错了，”杨得志笑道，“少走了几里路少爬了几座山，身体就松松垮垮了，打上几仗保管结实。聂政委下任务吧！”

“部队已经到达芝川镇，明天拂晓开始渡河。”聂荣臻走到地图前，指着禹门渡口说：“你火速出发，快马加鞭去追赶部队，你们团是全师的先头部队。”

“是！”杨得志敬了个军礼，转身离去。

杨得志走出师部，迎面碰上几位老战友，个个兴冲冲的。

“喂！你们几个分到哪个团？”

“我们一致要求回老红一团，任主任批准了，红一团改编成独立团了。你呢老杨？”

“我分到了 685 团。”

“你是老红一团团长，应该到独立团呀，老战友在一块多好。”

“好，你们等着，我去找聂政委。”

杨得志风风火火撞进师部，见聂荣臻正在整理行装准备上路。

“聂政委，”杨得志一把揪下军帽，擦了一下冒汗的额头，不好意思地说，“我还是去独立团当副团长，685 团的团长让别人去干吧？”

“为什么？”聂荣臻取下墙上的马鞭朝裤上的灰尘抽了几下。

“我是老红一团的，熟悉情况。”

“你去 685 团是命令，部队马上就要渡河，形势紧急，你还磨蹭什么？快执行命令！”

“是！”杨得志立正敬礼，返身离去。

罗荣桓和陈光于 1937 年 8 月 31 日率部到达渡口准备渡河。八路军第 115 师独立团是中共中央决定增设的，未经国民党方面批准，在第 115 师战斗序列中找不到这个独立团。尽管独立团最先到达渡口，看到渡口检查官拿着皮夹子查得很严，为了避免麻烦便命令部队全部到树林里休息。恰巧 686 团的骑兵侦察哨来到渡口，杨成武迎上去问道：



▲ 杨成武

“你们团离这里还有几里路？”

“大概三里，十几分钟就可开到。”

“你快回去告诉你们团长，让他把部队先拉进树林与我们会合。”

“是。”

侦察兵拨转马头，很快消逝在蒙蒙细雨中。

十几分钟后，李天佑和杨勇率领 686 团赶到。杨成武说：“老李，国民党在渡口设有检查站，检查官是个上校，如果要从这里过河，非得他那个皮夹子里有我们部队番号才行，否则他是不会放行的。”

李天佑说：“我这个团是有番号的，干脆两个团混在一块，一拥而上，先占了船再说。”

“好主意，就这么办。”杨成武手一挥，“独立团听令，立即插进 686 团队列，速度快一点！”

李天佑折下一根树枝，拔出匕首，边走边削，领着队伍来

到渡口。

“你们是八路军第 115 师吗？”检查官脱掉雨衣，露出上校军衔，“请问贵军番号。”

“第 343 旅 686 团。”李天佑把玩着的匕首对检查官说：“前线吃紧，小鬼子猖狂得很。本团长奉上级命令日夜兼程往前线赶。阎长官恐怕急眼了，盼着咱们早点上去呢。”

“你们团有多少人？”检查官问。

“两千多人，大部队马上就要开来了，”李天佑将匕首插入刀鞘，挥着树枝说，“没什么问题的话，本部人马立即渡河。”

李天佑故意将“立即渡河”四个字说得很重，身后的战士一听跟着吵吵“立即渡河，快上船”，一窝蜂似的涌上码头，将 20 多条大船全部占了。

面对这乱哄哄的官兵，也许检查官无法点数，也许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 686 团为什么多出一倍人马他并没有提出异议，待登船完毕便同意放行了。独立团和 686 团渡河抵达东岸不久，罗荣桓和陈光率 685 团和师直属机关到达西岸，徐海东、黄克诚率第 344 旅的两个团紧随其后。

此时，第 115 师主帅林彪、聂荣臻正冒雨骑马朝西安疾驰。秋雨连绵不绝，二人行至西安城外时浑身湿透了。聂荣臻指着一洼积水说：“老林，照照你的模样，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将军变成泥鳅了。”

林彪嘿嘿一笑，回敬道：“五十步笑一百步，你以为自己俊俏吗？”

聂荣臻翻身下马，笑道：“请林将军‘对镜梳妆’，否则城门口的卫兵会怀疑我们的身份证是伪造的。”

林彪下马，见路旁的那积水还算清亮，便招呼聂荣臻一起

掬起水来洗脸。两人从皮包中取出干净制服，套在湿漉漉的衬衣上，提着脏衣服朝城门走去。

周恩来已于昨天到达西安，他安排了一辆专列，送首批赴山西的干部至潼关，再经风陵渡渡过黄河。林彪到达西安的那天正好赶上这趟车，便辞别聂荣臻登车先行去追赶部队。聂荣臻则陪同周恩来处理事务，第二批入晋。

◎ 战略部署的更改

1937年8月25日，日军取得了南口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由于李服膺部失败后不按预定计划北移，反而南逃大白堡，国民党军队大雪崩塌般的溃退开始了，不是一触即溃，便是风声鹤唳，望风而逃。李部的逃跑危及全线，使平绥线正面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地，从北平近郊至晋西南的千里交通要道填满了狼奔豕突的溃兵。八路军指战员在开赴抗日前线途中不时碰见溃兵。

在原平车站，独立团奉命开赴平型关，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等敌人飞机一走，突然间像变戏法似的从树林里、草丛中、沟坑石缝间钻出无数乱哄哄的国民党溃兵，把公路挤得水泄不通。

溃兵看见八路军往北开，就大叫大喊：“你们搞错方向了，快掉头往南走，前面是日本人！”

“没有错，我们就是去打日本人的。”

“咦！是八路。”一位见过世面的老兵惊讶地说，“日本人飞机大炮坦克厉害得很啦！你们有什么？大刀片、‘吹火筒’真是找死哟！”



▲八路军第115师向平型关挺进

“听说日本兵人人胸前挂个小佛，刀枪不入，一个班能攻下一座县城，你们上去了就下不来啦！八路弟兄快掉头逃命吧！”

“八路就是从前的老共，我明白了，准是上面故意让他们去送死！”

……

在侯马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酒店几个喝得醉醺醺的溃兵见了独立团杨成武和熊伯涛就说：“瞧，又撤下来一群死鬼，城里挤不下把营扎在外面，被雨淋得像落汤鸡，那两位老兄准是那一路的。”

“咦，你眼花了，那臂章写的什么字，八路，这不是老共吗？”

“他们不是从前线撤下来的，是陕西开过来的，想上前线送命，不知天高地厚哟！”

有的溃兵见到八路军战士就说“小兄弟，日本鬼子厉害得很！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大炮，他们的炸弹、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一炸一个准！”

小兄弟，快回去吧，抗什么战，抗来抗去把脑袋抗掉了，犯得着么。”

有的战士问：“日本鬼子什么样？”他们说：“当官的不让打，让撤，没有看见日本鬼子长得什么样子。”

1937年9月17日，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点燃的纸香烟拿在手上，站在地图前陷入沉思之中，香烟快烧到手指头都没有发现。战局的戏剧性变化不仅令世人瞠目，连一向深谋远虑的毛泽东也大感意外，他没有料到阎锡山的部队这么不经打。日军在华北的总兵力为八个师团另一个混成旅，加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总共才19万人，而国民党军队第一、第二、第五战区的总兵力为九十六个师另十二个步兵旅共80万人。中日双方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然而战争形势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国民党军队失败得如此之快，致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八路军的兵力部署。

毛泽东从洛川骑着大青马回到延安，即对南京统帅部的战略部署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研究：“蒋介石平分兵力扼守三个战略支撑点，第五战区布防沧州扼津浦线，第一战区布防涿州扼平汉线，第二战区布防大同扼同蒲线。同蒲线的东部是太行山，平汉线的西部是恒山，两山地势险要，乃天然屏障，看似无懈可击，实际上隐藏着一条祸根。这便是两山之间的一条战略走廊——蔚代公路。日军若出一支奇兵从这里楔入，第一、第二战区的防线被撕开，再挥兵南下，即处于大同、涿州两阵

地侧背，向西迂回大同不保，向东迂回涿州，保定危矣！”

不出毛泽东所料，日军第5师团几天后正是沿这条走廊发起攻击，使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都忽略了这个关键的结合部，如此重要的战役走廊竟没有国民党的一兵一卒，使日军长驱直入，未遇任何抵抗。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决定将八路军三个师都部署在恒山山脉，东可俯视豫冀平原，西可向太行山脉发展。由于日军第5师团的楔入，大同遂于9月17日沦陷敌手。刘峙主力集结在涿州至保定一带，当觉察西侧一支日军直扑涞源，有东进抄其后路之险，固守原阵地的意志立即动摇，准备弃阵南撤。这样一来，恒山山脉和太行山脉都处于日军的迂回包围当中。日军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毫无疑问是攻取太原。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面对这种态势，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战不会持久。他们可以南撤，而八路军无路可退，必须独立自主坚持在敌后抗战，原来的部署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必须马上改变。他命人将张闻天叫来一起研究。

当时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他对马列主义理论有很深的修养，但对军事却缺乏研究。毛泽东的几位大将都已披挂上阵，周恩来又在阎锡山身边协调两党两军关系，主要领导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率八路军总部刚刚渡过黄河，叶剑英在南京国防部，身边只有张闻天可以商量。

“洛甫同志，华北战况可谓瞬息万变。”毛泽东边用铅笔敲打桌上的军用地图，边对刚走进窑洞的张闻天说。

“又有新的情况吗？”张闻天在毛泽东身边俯下身，目光在地图上扫来扫去。



▲八路军总部部分领导人朱德、左权、任弼时和邓小平在渡船上

毛泽东猛吸两口烟，把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起身在窑洞里来回踱步。

“一方面军（即第 115 师）出动时原定参加南口战役的，还没有过黄河，南口、张家口就丢了。我揪住刘峙、阎锡山两军结合部，料定此空当事关全局，命令我军北上蔚县，堵住这个漏洞。我军未到，蔚县即告失守。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受第二战区节制，阎锡山命我军防守飞狐口。林彪来电说飞狐口情况不明，建议不要接受正面防御任务。现在日军直扑涞源，飞狐口的防守已经毫无意义。阎锡山又命我军协防平型关，是要在平型关与敌决战。”

张闻天感叹道：“国民党军如此不堪一击，实出意料，搞得我们连改变计划都来不及，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蒋军没有败在作战上，而是败在谋略上，”毛泽东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他们缺乏战略头脑，日军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日军的指挥官是非常精明的，蔚代公路这支奇兵真是妙不可言。他们避开蒋军的正面防御，几个侧翼迂回便弄得蒋军仓皇南撤，溃不成军。”

“主席，看来蒋军在华北难于支撑局面，我们应该考虑下一步的部署。”张闻天建议道。

“我考虑了很久，下一步的部署应该做一些变动，你看如何？”张闻天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香烟，俯身卷起桌上的地图，提起毛笔说：“我建议立即调整我军的战略部署，征求朱老总他们的意见。”毛泽东在纸上笔走龙蛇，将几天来深思熟虑的情况判断及战略计划和盘托出。

朱、彭、任，林、聂，贺、萧，刘、徐：

关于情况判断及战略部署问题：

一、判断敌攻华北大约分为四路，总兵力约十五万至二十万人。一路山东，现未出动；又一路津浦线，约一个半师团，现攻至马厂；又一路平汉线，约一个师团，现在涿州以北未动；又一路平绥、同蒲线，约三个师团，为其主力，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至于上海进兵，于破坏中国经济命脉外，又钳制中央军之主力，以便利其夺取华北。以上是对日寇第一期作战计划之基本判断。

二、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三路，均以追击姿势前进。

一路沿平绥东段、同蒲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由天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涑源之势，系向卫立煌军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此两路判断系组成联合兵团，至少两师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

三、蒋以卫立煌军处于敌之包围中，令其向平汉线撤退。阎以灵丘为山西生命线，拟集中十四个团在平型关以北举行决战。判断如决战胜利，则敌之南进可稍延缓，但必增兵猛攻。如决战失败，敌必速攻平型关、雁门关，待后路预备兵团到达后，主力直下太原，使绥远西境之晋绥军，恒山山脉南段五台等处之各军，平汉北段之各军，均不得不自行撤退，彼可不战而得上述各地，娘子关之天险亦失其作用。

四、涑源、灵丘为敌必争之地。阜平、五台、盂县如无南北公路，或可暂不被敌占。如有南北公路，敌有出一支向南切断正太路之可能。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主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之被占所证明。

五、晋阎指挥下之傅、杨、刘、汤各军，均失锐气，使我们不能作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之结论。

六、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決定作用。

七、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基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

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八、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战略部署：（一）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外交问题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一方面军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四）总部进至太原附近，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

九、你们意见如何，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张闻天看完毛泽东写好的电文不住地点头称赞：“好！好！这样部署我军可在近期内控制大片地区，求得迅速发展。”

毛泽东轻轻放下毛笔，起身在窑洞内伸了个懒腰：“洛甫同志，日军在华北只有区区十几万人马，他们只能控制交通要道和重要的据点，在要道两侧和据点周围有大片的真空地带。蒋军和阎军的致命弱点是脱离群众，在没有交通要道的地方他们无法生存。日军不占，蒋阎军不敢占的真空地带便成了我们开辟游击根据地的新天地。”

“主席，蒋介石、阎锡山能同意我们的战略部署吗？”张闻天拿着电文有些担忧。

“蒋、阎二人都缺乏战略眼光，两个月的战争形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笑道，“他们巴不得共产党自陷绝境，好借东洋刀杀人罗。”



▲1937年8月任中央军委主席时的毛泽东

毛泽东将地图在桌上铺开，指着蓝色箭头说：“现在是日军战略进攻阶段，中国的两支抗日力量的态势如何？蒋军处于战略防御，这代表了中国的形势，日军正当锋锐之时，蒋军的退却暂时无法遏止。再看我军的态势，我军迎着溃兵北上，但并不是要一头撞在日军的攻击矛头，而是避开其正面，乘隙向他的侧后挺进。整个形势必将如此。日军向国民党军进攻，我们向日军的纵深和后方进攻。随着战线的扩大，日军的后方愈显空虚，而我们在此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同时以游击战的方式向日军猛烈袭击。游击战在近期暂时不起支配全国抗战形势的作用，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巩固，民众抗日力量

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一个以我党为领导的全民族抗战的形势必将出现。日军的进攻势头势必因后院起火而逐渐减缓，最终不得不停下来，战略相持阶段就到来了。那时日军会将主要力量用于对付我们，在幅员辽阔的敌后战场，游击战上升到了战略高度，将起着支配全国抗战形势的决定性作用。我党我军将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突然顿住，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设计的战略前景，兴奋得双眼熠熠闪光。他突然扯开胸前的纽扣，拉起张闻天的手说：

“走，骑马到抗大，给我们的‘窑洞大学生’讲一讲！”

十里埋伏迎日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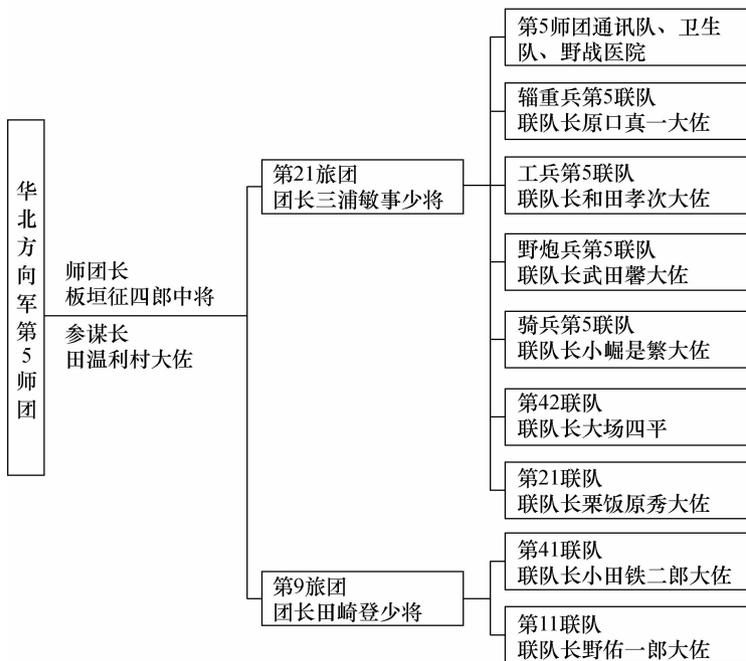
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1885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从进入日本军界起，就是一个疯狂的军国主义者，从事侵华战争活动，而且一贯主张以武力征服中国。他担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边防军参谋以及云南、汉口、沈阳等地日本特务机关长和公使馆武官期间，就获得“中国通”的称号。他不仅能流利地用汉语对话、写作，而且对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1928年6月，另一个著名的日本军官大佐河本，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阴谋炸死了家喻户晓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不久，河本在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被解职，接替河本担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的，便是已在日本军界崭露头角的板垣征四郎。板垣同河本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任不久，就同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合谋策划参与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紧接着他同颇负盛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联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也就是说，板垣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接连创造了两个“惊世之举”。后来，他的官阶不断上升，先是任关东军参谋副长，然后是参谋长，日军大举侵华的前夜，他被调任陆军本部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第5师团的师团长。他对这个任命非常满意。第5师团是在日本明治二十一年编成的精锐部队，是日本军队建军历史最长的师团之一，曾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它曾入侵中国山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建立了殊功。

七七事变后，第5师团作为日本国内第一批动员侵华的师团，率先进入华北的心脏平津地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本打算将强大的第5师团投入平汉铁路正面，作为战略攻击中的主要突击力量。南口战役展开后，由于第11旅团进攻受挫，第5师团才奉命加入平绥线方面的战斗。

1937年9月初，由于国民党第二战区执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并在恐日情绪下，使日军华北方面军板垣师团及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平绥方面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夺城占地，严重威胁山西。于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准备太原会战，首先在平型关地区布防，陷敌于包围之中。

日军第5师团序列表



9月下旬，日军第5师团由察哈尔向山西内长城推进，即由天镇、阳高、阳原、蔚县向大同、广灵、涞源进攻；接着向左云、怀仁、浑源、灵丘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要隘，向雁门关进攻。计划独立混成第15旅由怀仁向应县、山阴进攻，主力由灵丘突破平型关向繁峙进攻。协同沿同蒲路南下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攻占太原，给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以打击，配合平汉线方面的作战。

◎ 阎锡山的平型关策划

面对日军的疯狂气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策划了平型关会战。

阎锡山鉴于他在1927年和奉军混战于灵丘、五台、繁峙地区时，让奉军进入平型关内予以打击的“成功”经验，拟放纵日军逾越平型关，诱其深入到砂河以西地区，而后从五台山、恒山南北发动钳击，同时截断平型关险隘，把日军板垣主力围歼于滹沱河上游的盆地。阎锡山自诩“把敌人放进口袋里，给以狠狠的打击！”遂作了如下的部署。

一、平型关正面

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三军军长孙楚，指挥第三十三军（独立第3旅和孟宪吉独立第8旅）以及高桂滋第十七军第21、第84师，以及从广灵退下来的第73师各部，于灵丘、繁峙间，沿内长城设防筑阵地，阻止从灵丘西犯之敌，掩护大军从雁北撤入雁门山南集结。第三十三军在南，主力保持于平型关；第十七军在北，主力保持于团城口。

平型关、团城口两军，对敌人的进攻先依险挫敌锐进，须支持较长时间，而后择机撤退，转移到五台山里，集结为机动

的南兵团，待机北击接近繁峙之敌。



▲平型关

二、雁门山北侧

主作战军东向平型关方面，左侧背以恒山、雁门山的险阻为屏障，监视雁北敌人动静，机动戒备。

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负责守茹越口（繁峙城北）以西与雁门关既设阵地，以新归入第十九军序列的方克猷独立第2旅守五斗山、马兰口、孤峪间，警戒50余里山隘，把第十九军主力三个旅排列于水峪沟与雁门关两侧，保持重点于雁门关方面。

第三十四军军长杨澄源负责守备北楼口（砂河北）西与茹越口间，第101师李俊功守北楼口及大小石口，刘谭馥独立第200旅为之支援，兼与恒山中的刘茂恩机动军取得联系，对平型关方面警戒。以军主力梁鉴堂独立第203旅专守茹越口，

巩固雁门山东远翼，正在北调的姜玉贞独立第196旅准备布控于繁峙城附近，保持军守备重点于茹越口。但在第三十五军未到达宁武时，姜旅暂停止于阳明堡，作为对雁门关以西的策应，忧虑平绥线上有敌后续主力到达，将南冲雁门关。

三、决战地带

阎锡山称为捕捉敌主力军的“口袋底”阵线，选定砂河西和繁峙间地区为主决战地带。以收容整理起来的刘驥馥旅附以山炮两个连于砂河以东，南连五台山、北连恒山的两机动兵团，占领广大正面，对平型关西犯之敌，遮蔽繁峙主决战阵地。在砂河、繁峙130里间，作逐次抵抗，诱敌于繁峙的阵地下，然后撤入主决战阵地后方。

陈长捷的第一预备军在南口和日军较量过，是经得起震荡的部队，郭宗汾的第二预备军是有作战经验的生力军。两军共十二个团，并各附属一个山炮营，在繁峙县东，以五台山的北台顶、繁峙城垣、恒山顶构成三个支撑点，于其间占领主决战的抵抗阵地，并预筑纵深坚固工事，吸引敌人强攻，消耗敌人战斗力，使之陷于顿挫胶着，从而发动五台山、恒山集结隐存的南北机动兵团，加以打击，与敌进行决战。陈军在南，保持重点于五台山北麓；郭军在北，保持重点于繁峙城。

另准备集结野炮团、重炮营于繁峙城西，并招致第十九军、第三十四军所属工兵营，加强主决战阵地的主要设备，且拟到决战时期，以第三十四军军长在繁峙城任主决战阵地带的总指挥；集结第三十四军第101师、独立第200旅、独立第196旅各部，加入主决战线的关键点，进击反攻。

四、机动兵团

从平型关、茹越口南移，隐蔽在五台山中的孙楚、高桂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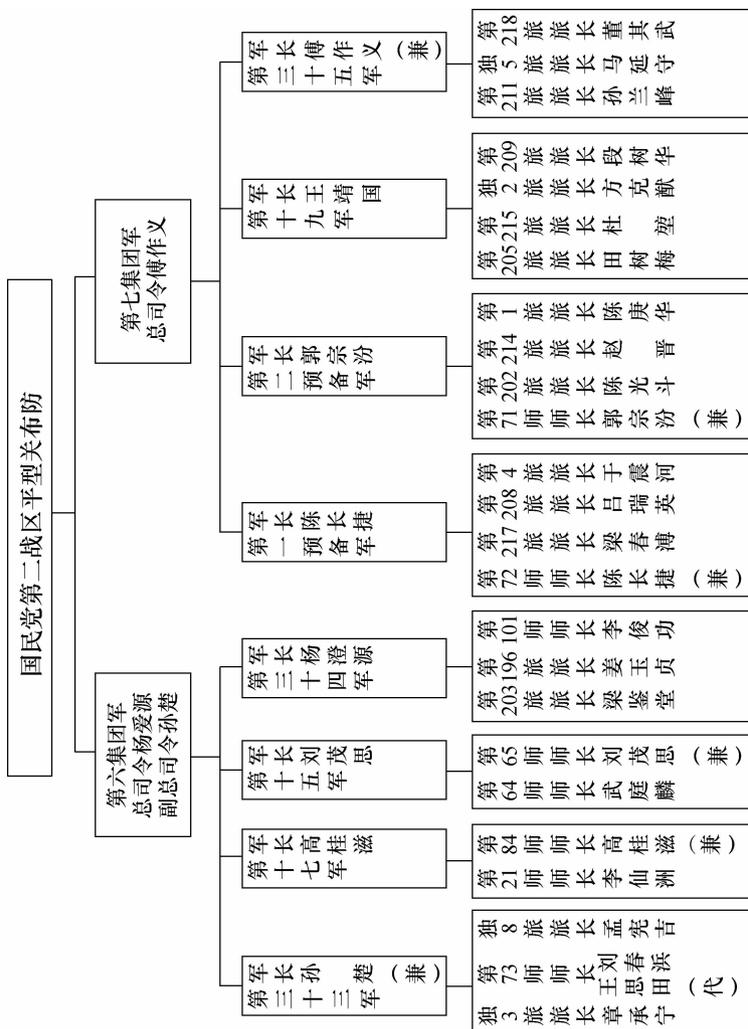
两军，为南机动兵团，警戒五台山的东台、北台各口，以高桂滋的第十七军为主力，等待部署在砂河的诱敌部队逐步诱敌深入到繁峙城东地区主决战阵地前，展开决战。在其受到我集团炮步兵压制时，分别从茶坊、峨口北出，先牵制敌军于五台山北麓，于北机动兵团从恒山发动南击时，同时呼应夹击。另以第三十三军孟旅和王思田第73师支援即将到达五台山东侧的八路军林彪的第115师，共同抄击平型关、团城口，以强力截断敌后方。

刘茂恩第十五军先隐蔽于恒山中，警戒浑源、大营南北双方，和团城口第十七军、北楼口第三十四军东西联系，等待第三十五军到来，合为强有力的北机动兵团。

傅作义第三十五军进入阳方口，于宁武集结后，侦察明白敌人没有在大同集结强大兵团，即再向代县、繁峙东进，适机潜出于繁峙东北的北岳恒山地区和第十五军联合。以傅作义指挥北机动兵团的两个师、三个独立旅、一个山炮团乘繁峙正面鏖战之时，进出恒山南侧，向敌右侧背发动包围痛击。

阎锡山对上述策划，自赞“布好口袋阵，让敌进得来，出不去”。为了选定能坚强抵抗的主决战阵线，特召集负责守备主抵抗线的陈长捷、郭宗汾两个新任军长到雁门关口“行营”，面示方略，并一同到繁峙、砂河间作详细的侦察，要求选定极扼要的“口袋底”阵线，构成强固并且韧性、绝对不可贯穿的纵深阵地网，借以胶着有强大攻击力的敌军，使其大量的消耗兵力。即时将分派高级参谋前往砂河、平型关、团城口向刘茂恩、高桂滋、孙楚各军长预作指示；又将屡违节制的李服膺军长从砂河招到岭口“行营”拘押起来，以严肃军纪，表示抗战决心。

国民党第二战区平型关布防序列表



◎ 林彪部署“十里埋伏”

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乘车到达平型关，下车后登上平型关巅，用望远镜望见了关前那条峡谷甬道后，上了吉普车后

从平型关口驶出，沿着坑洼不平的蔚代公路向灵丘方向前行。

车子驶出关口不远，就钻进一条由西南向东北伸展的狭窄沟道。这条沟道林彪刚才已在望远镜里看到过，此时他更加仔细地观察起来：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沟长十多里，深数丈到十数丈不等，很难攀缘而上，而且沟底的甬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途中，仅见到一个叫老爷庙的地方有个缺口，能通到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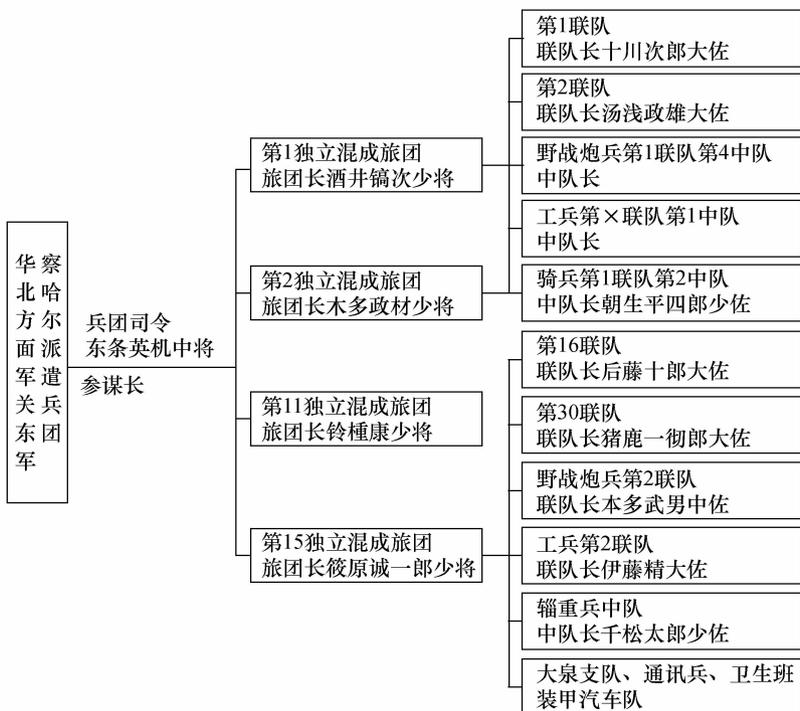
▲平型关老爷庙

吉普车再次停了下来。林彪在警卫员杨兴桂的搀扶下艰难地攀上老爷庙和庙后的老爷岭。这时，杨兴桂听到师长说：“如果阻住正面路口，截断敌人的增援，将部队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山地里，在缺口处的高地上设置重兵，公路上的敌人就是瓮中之鳖了。”他们到达灵丘城时，得知日军已前进到距城不到十里远的地方，不能多作停留，便原路返回，在东河南镇一带察看地形后回到大营。

林彪带领参谋人员又到实地考察了这一带地形。平型关东南的关沟至东河南镇、沙岗梁、韩家湾一带山高谷深。其中关

沟到小寨村这一段，地形更为险峻，叫做乔沟，北边为老爷庙山，南边是连溪山、白崖台村。在连溪山南坡有一块巨石平台，站在这里，十里长沟尽收眼底，是师指挥所最佳之地。经过几次实地考察，更坚定了他要在平型关与日军大战一场的决心。这十多天来他一直在苦思良策，在考察中，一条“十里埋伏”之计油然而生。

日军察哈尔兵团序列表



他取出纸笔，将公文包铺在膝上，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文：

朱、彭并告毛、聂：

一、黄绍宏等对我军要求划大同以西数县为我游击区域，

坚持反对态度，已证明国民党企图以我军牵制日寇南下，同时陷我军于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四铁路中，受日寇四面围剿之境地，以防止我军支配国民党其他统治区域。此为国民党对日寇一箭双雕之妙计。

二、我军须坚持军委决定之战略部署。以一方面军在同蒲路以东活动，以二方面军在大同以西活动，四方面军暂不出动，尔后看国共关系及其他情况而动作，如过河后亦应使用于同蒲路以西。

三、我军处在同蒲以西，即处于主动地位，背靠苏区、绥远、内蒙，巩固左右侧及背后进攻极为有利，且可开同蒲路东。一方面军活动从战略上讲，将同蒲东、正太路北系处敌进攻之被动地位，同蒲路系处进攻敌人的主动地位，我军现在须力求军委部署之实现。如暂时不可能动，尔后亦当自主地实现之。

四、关于一方面军目前行动方针，我意不只陈旅应在现在区域协同友军作战，师直及徐旅亦应同样任务而靠近，陈旅暂时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任务而进驻阜平，因为：

1. 目前敌正前进中、运动中、作战中，为我进行运动战之良好机会，我友军目前尚有抗击敌人之相当力量，为能得到友军作战之良好机会，现地或为山地，乃求山地战之良好机会，倘过此时机，敌已击破友军通过山地，并进占诸主要城市时，即较难求运动战山地战及友军配合之作战。

2. 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过少，则有失众望。

3. 兵力过少，则不能将以绝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之一部。

4. 目前须以打胜仗，捉俘虏，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打了胜仗更容易动员群众与扩大红军。

5. 目前如集中一师以上兵力于狭窄区域求战，当然是不

妥的，用不开的，但以一师以下兵力则是需要的，用得开的。目前第一仗应以集中约一师的兵力为好，待尔后客观情况上已失去一师兵力作运动战之可能时，再分散做群众工作和游击。

林彪

林彪起草完电文，命机要员先给聂荣臻发电，让其督率徐海东的344旅火速开赴平型关，再将他刚刚起草的电文发出。

先斩后奏是林彪的一贯作风。

机要参谋接过电文，提醒道：“师长，总部电令我们分兵去阜平发动群众，这事还……”

林彪起身重新观察那条隐蔽在山沟中的公路。他见机要参谋还没有走，回头道：“要打仗，分不出兵，让罗主任把政治部机关的人带去就行。”

“没部队撑腰咋行？”机要参谋再次提醒。

“嗯，那就让骑兵营护送”，林彪慢条斯理地说，“反正这一仗用不上骑兵。”

晨雾刚刚散去，日军飞机便出现在原平上空，俯冲轰炸时发出的尖厉啸声打断了聂荣臻的讲话。聂荣臻接到林彪的电报后，在原平城郊一所农家小院，召集八路军115师第344旅和师直属团以上干部开会作动员。他在敌机轰炸声中作完动员，看了看浓烟滚滚的原平城，果断地下达了出发命令。

独立团乘汽车先行，主力紧跟其后，开赴平型关。日机的轰炸结束了，只剩一架飞机还在空中盘旋，杨成武下令出发，汽车一辆接一辆朝北驶去。那架日本侦察飞机在车队上空作了几次恫吓性的俯冲，引起一位麻脸排长的怒骂：

“有蛋就下，没蛋就滚远些，逞他娘的啥威风！要不是上级不让随便放枪，老子一枪把你撸下。”

“麻排长，你甭吹牛！”副连长取笑道，“就你这杆‘汉阳造’能打下飞机？”

“你不信，有胆你下令开枪！”麻排长故意拉栓填子弹举枪朝空中瞄准。

“你这麻子，当心走火！”副连长急了，“我们的子弹可都是用血换回来的，一颗也不能糟蹋。你当排长的还敢带头犯纪律！”

麻排长退出子弹，掂了掂，笑道：“看把你急的。你放心，这颗子弹打出去没赚头还行？”

几位战士一齐起哄：“一颗子弹赚架大飞机，这买卖最有赚头了！”

“飞机溜了，都怪副连长砸了这笔买卖！”麻排长作出一副十分惋惜的模样，引起一车战士哈哈大笑。

车队在一路欢笑中向目的地进发。

聂荣臻督率的第344旅于9月23日上午抵达上寨村。林彪一见忙问部队都带上来了吗。他关心的是部队能否赶到，当见聂荣臻点头说都上来了时，林彪松了口气。聂荣臻问前边的情况怎么样。

林彪铺开地图将敌情和酝酿多日的“十里埋伏”计划讲了一遍，问道：

“老聂，这是个大仗，打不打？”

“既然天时地利人和，机不可失，为何不打？”

“战机稍纵即逝，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向军委和总部请示了，”林彪微蹙浓眉，担忧地说，“你还记得毛主席在洛川茶水钱行吗？专门叮嘱你我要珍惜这点革命本钱呀！”

“我们没有和日军交战的经验是事实，作战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打仗没有不冒险的，只要有六七成胜算就可以斗胆一战。”



▲平型关战斗前，聂荣臻在前线侦察。

“这一仗我看有八成把握。”林彪习惯性地划燃一根火柴，轻轻吹灭，他喜欢闻火柴熄灭瞬间的那股烟味。在江西苏区物资十分紧张时有人给他提过意见，他当面表示虚心接受，可从来没有认真改正过，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有火柴，总要顺手牵羊揣进兜里。这种下意识的行为成为人们背后议论的话柄。

“既然有八成把握就要下决心，坚决打！”聂荣臻望着举着火柴棍出神的林彪说，“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么才能打好的问题。”

“好吧，下午召集全师连以上干部，你给动员动员。”林彪又划燃了一根火柴，一向寒光逼人的双目仿佛突然失神了，他微微噘嘴吹灭火焰，一股蓝色轻轻飘起。他有一年半没有闻到战场的硝烟了。

23日中午，云脚低垂，闷热的天气预示着一场急风暴雨即将来临。八路军第115师的战士们磨刀擦枪，高声争论。100多名连以上干部陆续齐集到上寨村的这家小院，把这个小院挤得密不透风，虽然热得汗流不止，却不敢解开领扣。林彪对这种天气似乎很适应，仍然衣冠整齐地端坐于台上，在这个汗味浓郁的小院里，他是唯一没有流汗的人，那张白皙削瘦的脸永远阴沉着，令人敬畏不已。

聂荣臻带头解开领扣，指着墙角一口大缸说：“谁渴了可以去舀水喝。”

有几个人刚要起身，林彪便站了起来，开始介绍敌情。

他扫视了一下会场，吵吵嚷嚷的会场顿时静悄悄的。他不紧不慢地就他本人所知，从平津沦陷、南口战役到眼前即将大战一场的平型关作了详细的叙述。

当时他并不知道从蔚代公路猛插进来的日军番号，直到平型关大战结束，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才了解到他的对手是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精通用兵之道和熟悉地情的板垣避开重兵设防地势异常险要的阎军关前重地，派遣栗饭原秀大佐率第21联队的两个步兵大队，于9月21日自浑源南下，翻越海拔2047米状如剑锋的大尖山，绕过阎军阵地抵达平型关左侧背后。这支仅千人的奇兵突然出现，使关前阎军惊恐万状，数万人马呼啦一下仓惶后撤，将险峻的关前阵地全部放弃了。

栗饭原秀趁夜向高桂滋军防守的团城口、鹁子涧、东西跑池一带阵地袭击。高部不知虚实仓皇西撤，退往大营以北。日军栗饭原秀率部遂占领了团城口一带两公里的长城要塞，将阎军平型关防线撕开了一个缺口。

与此同时，朝平型关正面推进的日军在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的率领下抵达灵丘城。这样一来，三浦和栗饭两路日

军之间出现了一个长达 30 公里的真空地带，中日双方都没有一兵一卒。

林彪决定在这里大做文章，他敏锐地抓住了其中十里长的沟底公路。这就是他前几天前定下的“十里埋伏”之计。他讲完了敌情，接着作了兵力部署。他的嗓门提高了：

“从小寨村到老爷庙有一段长十里的狭沟，沟深少则 10 米，多则 30 米，其北侧是陡壁无法攀登，南侧是缓坡易于伏兵向沟底出击，沟底宽 10 米至 20 米，这是灵丘之敌向平型关推进的必经之路，师部决定在此集中兵力伏击敌人。嗯，各团干部要听清楚。”

干部们兴奋地挺直了身子。

林彪停顿片刻，见台下干部挺起腰板注意聆听他的报告。

“685 团埋伏在老爷庙一带，这是袋底。杨得志，都说你是一员虎将，可不要让敌人把口袋捅漏了喽！”

“保证完成任务！”杨得志“嚯”地站起来。

“686 团埋伏在白崖台一带，战斗打响主要靠你们勇猛杀敌。嗯，李天佑能打仗。你们要将敌人在沟底斩成一段一段，分割歼灭。敌火力猛，只要大胆接敌，敢于白刃战肉搏战与他们搅在一起，敌人纵然有坦克大炮也不起作用，飞机来了也不管用。”

“是！”李天佑站起来挺了挺胸，并乘机活动了一下坐麻了的腿脚。

“687 团埋伏在小寨村一带，注意隐蔽，待敌全部钻进口袋后再掐住袋口。如果敌人没有发觉我们，打响的顺序是 685 团先开火，再 687 团，最后是 686 团。688 团留作师的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杨成武。”

“到!”杨成武迅速立起。

“你们独立团要大胆深入敌后，隐蔽插至腰站一带，准备狙击灵丘和涑源增援之敌。我们伏击能否获胜关键在于独立团堵不堵得住敌人的援兵。你们几个坐下，下面由聂政委作战前动员。”

聂荣臻待林彪坐下，合上本子，双手按桌立起。热烈的掌声过后，极富鼓动性的四川口音擂鼓似的使那些临战前的猎鹰几乎按捺不住了。一方面军的高级政治干部尤其擅长战前鼓动，他们大多是毛泽东亲手栽培的，深得毛泽东的军事鼓动之道，在做这项工作时都多少带有诗人般的激情。

“同志们！关于敌情刚才师长讲了，大家的任务都知道了。回去好好动员，好好准备，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聂荣臻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同志们，这一仗不是普通的仗，是我们红军改编后的第一仗。打好了，打胜利了，可以提高我们八路军的威信，提高共产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日本鬼子现在猖狂得很，国民党军队被他们打跑了，以为中国没有人敢和他们碰一下。我们要好好地打，而且要坚决消灭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都是孬种，中国人民决不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坚决消灭日本鬼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干部们激动地喊起了口号。

“要打好这一仗，一定要发扬我们红军的优良传统！要发扬我们敢打敢拼的作风，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有！”干部们齐声回答。

9月24日下午，第343旅旅长陈光亲自潜入团城口日军阵前侦察，并架设了一条电话线。担任警卫的正是那个背大刀

老兵。二人趴在一个弹坑里观察敌情。

“旅长，敌人不多嘛。我看他们打炮是虚张声势，吓唬老阎的。”

“你小子估计得不错，如果老阎的人马杀一支过来，小日本就够呛喽！”陈光放下望远镜叹道，“可惜老阎的人马没胆。”

“那咱们的人马杀上去不就得啦？”

“我们缺乏重武器，连子弹都少得可怜，打攻坚战非吃大亏不可。林师长已有妙计，找到了让日本佬儿吃大亏的法子，你的青龙刀就等着喝洋血吧！”

“这里鬼子不多尽放空炮，是不是在等援兵？”

“我估计鬼子的援兵明天必到，他们唱了一天的空城计。”

陈光估计电话线该接通了，拿起话筒便听到了林彪的声音：“老陈，情况怎么样？”

“我估计灵丘城的鬼子明天必到。”

“嗯，你的估计很好嘛。独立团派出的侦察组刚来电，灵丘城的敌人有出动的迹象。”

“师长，我建议今晚进入伏击阵地。”

“好哇，你我想到一块了，”林彪看了看天色，“老陈，你立即撤回，留下观察哨至午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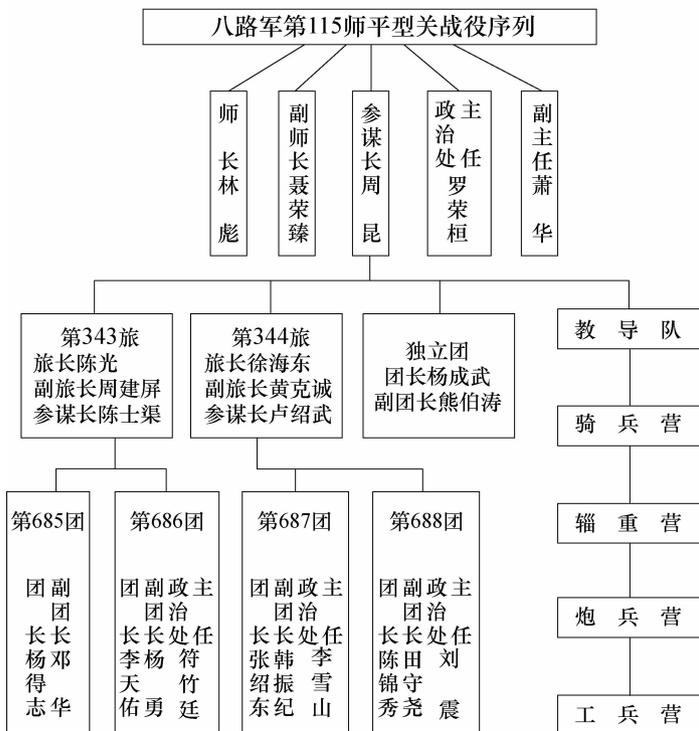
林彪放下电话，推开窗子，一股凉风迎面扑来。平型关一带的长城在茫茫暮色中淡化为一抹带状烟云。几分钟前阎锡山派专员送来一份《25日平型关出击计划》，决定明日拂晓五路出击，其中阎军八个团分三路，要求八路军分两路配合行动。林彪对专员说，请你们按计划行动。待专员一走，林彪便骂道，阎锡山、杨爱源、孙楚真是一群草包！以区区八个团兵力还要分成三路，各路间隔一二十里，这点兵力出击，开什么玩笑！

聂荣臻推门进来，见林彪凭窗沉思。林彪这个人过于谨慎，考虑问题十分精细，总希望面面俱到。这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点。

“老林，阎锡山的计划我看过了，不值一提。我们还是按预定计划行动！”聂荣臻用强硬的口气说，“阎锡山只会葬送军队，我们何必跟他一起完蛋！我们的行动用不着直接向他请示报告，他有什么想法，可以在太原向周副主席讲，或通过八路军总部转达。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洛川会议上定下的方针。”

“可这不是游击战，而是运动战，”林彪缓缓转身，鼻子哼了一下，“阎锡山算老几？我担心的是……”

八路军第115师平型关战役序列表



聂荣臻想起了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的争论。可是箭已上弦，而且都用力拉弓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无非是不想独自承担责任。聂荣臻摇了摇头，在心里暗笑。

“这就是你林彪的性格，一贯滑头。”

事实上林彪的担心是多余的，不死守教条，灵活机动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特点。平型关大战后的次日，毛泽东致电前线将领：“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不久，又将洛川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发展为：以山地游击战为主，亦不放弃有条件的运动战。

平型关下伏击战

晋北的9月已渐渐转冷。24日夜里下起了雨。而且下得越来越大，还夹带着雪花。八路军第115师上万官兵冒着纷飞的雨雪向白崖台一带伏击阵地挺进。除少数师级干部外，广大指战员没有御寒棉衣，又没有雨具，但渴望歼敌的心情，鼓舞了克服严寒的勇气和消灭敌人的信心。

林彪裹着一件雨衣与聂荣臻并马前进。山区的夜晚本就冷，又遇上了雨雪天气，二人冷得直打哆嗦。林彪想到日军自南口战役至今，一路南下，长驱直入，一定没有料到晋东北的山地气候变化这样快，昨天还热得恨不能脱层皮，一夜之间仿佛又掉进了冰窟窿，驻守团城口一带长城的日军忽遇这种天气恐怕比我们好受不了多少。他们的指挥官此时应该守在电台旁向上司催要寒衣、弹药。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也解决了。一仗下来寒衣、弹药都有了。还是老办法，向敌人要。想到这里，林彪将蜷缩在马背上的身子挺立起来，来了精神，仿佛全师指战员都已穿上了御寒衣服，也不觉得冷了。

部队翻越一段崎岖的山道，转入一条深沟。这时大雨倾盆而下，狂风呼啸，突然山洪暴发了，湍急的洪流咆哮着冲过公路，猛兽般拦住了去路。走在最前面的685团最幸运，686团过去了一半，另一半和师部挤在一起出现了短暂的混乱，李天佑和杨勇费了不少工夫使部队安静下来。



▲林彪、聂荣臻率八路军第115师向平型关进发

战士们将枪和子弹袋挂在脖子上，手拉手一步一步从急流中蹚了过去，还有的战士拽着师首长的坐骑尾巴通过激流。

水流越来越急，转眼间已涨到了1米多深。林彪见水势凶猛，只有第343旅的两个团安然通过，第344旅只过了一个团，另一个团被山洪阻隔在对面，无可奈何。几个性急的战士下水想强渡，被急流卷走了。聂荣臻大吃一惊，对林彪说：“老林，我看第344旅不必强渡，过来的作为预备队，没有过来的立即向南转移隐蔽待命，否则徒增牺牲。”

林彪十分遗憾地点了点头。军委和总部多次要求分散兵力去发动群众，他坚持要在平型关集中全师兵力寻机作战，结果天不作美，还是不得分兵两路。平型关伏击战只用上了三个团，否则战果就会大得多。

9月25日拂晓，第343旅抵达白崖台一带伏击阵地。此时风停雨住，天已大亮，部队按预定计划埋伏在公路南侧的山

地。师指挥所设在一个较高的叫连溪山的山头南坡一块巨石平台上，四周是一片小树林。敌人根本想不到这里有位年轻将军指挥“天兵天将”将给予其致命的一击。林彪在这块巨石上举起望远镜向沟底俯视，十里长的狭沟尽收眼底，前面伏击阵地的官兵们隐蔽得很好，经过一夜风雨，个个变成了泥猴，与阵地正好溶成一体，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真难辨认。

一位参谋带来了照相机，兴致一来便给指挥所拍了一张照片：林彪以跪姿举着望远镜进行观察，聂荣臻在他身后目视前方。旁边参谋手持电话听筒在收听各地消息，好提供给师首长进行决断；另一参谋在地图上查看各团阵地位置。后来这张照片成为平型关大战最珍贵的史料之一。



▲八路军第115师首长在战场前沿指挥战斗

林彪仔细观察了三个团的伏击阵地，感到非常满意，这个口袋够兜住一个旅团！若果真全歼了日军一个旅团，这对全国

乃至全世界将会产生多大的震动！他想到这里，一股激情突然涌上心头，身体都微微颤抖起来。

◎ 骄横日军钻“口袋”

时间在一秒钟一秒钟地缓缓滑过，谷底那条公路如一条僵蛇静卧着，昨夜逞够了威风的秋风，此刻和缓得多，枯黄的草木随微风轻轻摇晃。临战前的沉寂将闹钟的走动声夸张了好几倍，这更增添了指挥员的一份焦急心理。

685团的一营长按捺不住了，跑到团指挥所，吓了杨得志一跳。

“怎么搞的？出了什么事？”杨得志急问。

“团长，鬼子怎么还不来？”一营长捂着咕咕叫的肚子。

“打伏击嘛，就是要沉得住气，没耐心咋行？”杨得志松了一口气，问道，“你认为鬼子不会来吗？”

“拿不准。”一营长摇摇头。

“没什么拿不准的，你赶快回到自己的指挥位置上去，师长强调过不准乱动，暴露了目标，可不是闹着玩的。”

副团长陈正湘挥挥手：“快走快走！注意隐蔽。”

杨得志想起一营阵地上的机枪排，嘱咐道：“要注意你那些机关枪噢！”

686团的指挥所设在一片玉米地里，李天佑用电话问了各营情况，一切都万无一失，只待鬼子往袋子里钻。左右两侧兄弟团斩头剁尾，他拦腰一顿猛揍，那叫痛快。他见战士们穿着被雨淋湿的单衣，趴在湿漉漉的黄土上，一个个唇白脸乌，瑟瑟颤抖，不禁喃喃自语：“小鬼子知趣的话最好多送棉衣。”



▲平型关战斗中第115师某部的机枪阵地

杨勇嘿嘿一笑：“干脆钻进一支运输队，穿的吃的还有武器弹药，大大的有！”

“嘘！你听啥声音？汽车？”李天佑举起望远镜朝东一望，可不是吗？锃光发亮的汽车一辆接一辆直往沟底“口袋”里钻，足有100多辆，装满物资和荷枪实弹的士兵。汽车后面跟着近200辆骡马大车，最后是50多个骑兵。

汽车很快开到了跟前，第一辆汽车上插着一面太阳旗，几十个鬼子兵在车上叽哩呱啦谈笑自若。顿时，沉静的山谷充满了汽车的引擎声、马蹄声和鬼子嬉笑怒骂、胡吆乱喝的声音。

日军第5师团素称精锐之师，王牌师，侵华两个月来纵横千里，所向披靡，官兵无不目空一切，骄横无比。他们对中国军民的轻视由来已久，许多官兵在他们的日记有过令人发指的记录。第5师团刚刚抵达平津地区时，许多老百姓在路旁问“你们是张作霖的部队吗？”从此，他们把中国老百姓叫做“猪猡”。第一次作战时大多数士兵没有打过仗，都显得紧张

慌乱，可是一位位居少将的旅团长居然挥着马鞭吼道：“混蛋，瞄准了再开枪。”这位旅团长蹲下来如同靶场的教官一样，督促士兵按射击教程怎样瞄准怎样击发，从此他们把与中国军队作战叫做“教练”。南口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狼奔豕突，一溃千里，第5师团没怎么费劲就追击了上千里，夺城占地，他们把追击叫做“赶鸭子”。

现在，第5师团第21旅团第21联队乘坐第六兵站汽车队的百余辆汽车，由灵丘西进，准备再次挥舞三八大盖，将平型关地区的“鸭群”尽数驱逐。

骄横的日军既不派尖兵探路，左右又无搜索兵力，在一片嬉笑声中一头扎进了八路军设下的“口袋”阵。

紧跟在第21联队之后的辎重队，200多辆骡马大车满载寒衣、行李和弹药浩浩荡荡地撞入狭沟。因为前有汽车队开道，更加疏于警戒，在后压阵的一个小队的骑兵，饶有兴趣地唱着在日军中流传的“满洲姑娘”黄色小调。

汽车队的新庄中佐和师团情报参谋桥本中佐，谈笑风生，摆弄着手中的照相机，准备到平型关后寻一处烽火台，为他们征服人类最后一个文明古国留下珍贵的纪念。

“咦，这狭谷好险峻呀，假若支那军敢于穿插到粟饭大佐的后方，在此埋伏……”

新庄中佐打断桥本的话，哈哈大笑道：“支那军只会望风而逃，哪敢运动到皇军的胸腹地带？你知道士兵们管这次行动叫什么吗？赶鸭子！哈哈哈……”

“队长，这条狭谷足有十来里长，算是走到头啦，让你的汽车停下来等下后面的辎重队。”

“很好，您愿下车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吗？”新庄中佐跳下汽车命令汽车队停止前进。

桥本中佐下车后朝南侧山坡扫视片刻，也许出于本能，命令士兵朝一片玉米地射击，那里正是 686 团指挥地。

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一片玉米叶正好落在李天佑的帽檐上。李天佑一惊，难道鬼子发现了？他左右一瞄，战士们都很沉着老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没有谁暴露目标。哦，鬼子果然狡猾，在火力搜索。

李天佑抓过耳机询问瞭望哨，鬼子全部进沟了没有？

“团长，鬼子全部进来了，通往灵丘的公路上再也看不到人马和车辆啦！”

“怎么还不下令开火？”李天佑放下耳机，“这时开火，时机最有利，鬼子的汽车全部集中了，一辆接一辆串成糖葫芦了。李参谋，你快去师指挥所报告，鬼子全进来了。”

林彪发现第一辆汽车时和其他指挥员一样激动，鬼子终于上钩了！几位参谋悄悄挤过来，准备随时听候指令。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林彪很快就冷静下来，仔细观察日军的兵力和武器，估计敌人的抵抗能力。汽车一辆接一辆缓缓钻进他布下的罗网，那一刻他镇静得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渔夫，沉着地数着一尾一尾落网的鱼儿。

100 多辆。

这个数目正合他的意，多了怕吞不下，少了不过瘾。可是更令他吃惊一幕出现了，汽车后面跟着一大串骡马大车，连绵四五里，足有 200 辆。他有些遗憾昨天把第 344 旅一个团落下了。

汽车很快就要穿过狭谷了，可是后面的大车队却只进来一半，正在他放下望远镜准备开火之时，聂荣臻用肘部碰了他一下。林彪举起望远镜一看，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发觉的微笑，日军前面的汽车停了下来，看起来是在等待后续部队跟上。真是

天助我也！林彪放下望远镜，用手招来号兵和发信号的参谋。

此时，电台突然嘀嘀嘀嘀响了起来，林彪将举在空中的手放下，急步向电台走去。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打起仗来如同一个老猎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在红军大学的讲坛上常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为例教育学生。按理阎锡山的晋军早该向日军发起攻击了，为何没有动静？他立即命令一个参谋：“你立即跑步到友军阵地，催促他们按昨晚计划行动。告诉他们我们包围了日军一个旅团，让他们一面拖住岭上之敌，一面分兵支援我们。”

“是！”

参谋拔腿奔下山坡，刚好通讯兵译好电文，原来是杨成武报告独立团已经在腰站附近与日军两个联队交火了。林彪看完电文下令致电独立团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伏击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堵不堵得住敌人的增援部队。他又交代了多派瞭望哨监视东跑池方向的日军，阎军是靠不住的。



▲平型关战役中击毁的日军汽车

386团李参谋气喘吁吁地跑来：“师长，敌人全部进沟了，团长让我来报告。”

“立即开火！”林彪果断地下达命令。

三发信号弹腾空而起，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机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日军在毫无防范中遭到突然打击，顿时惊恐万状，最前面的汽车来不及发动逃跑就中弹起火，后面的车辆互相撞击，乱成一片。士兵们纷纷跳下汽车，钻进汽车底下躲避密如骤雨的子弹。

◎ 掐头断尾 分割中间

已经无法说清楚是哪支队伍先开的枪，随着红绿两色信号弹升上天空，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便响彻了整个山谷。方才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行进的日军，突然遭到了居高临下猛烈袭击，阵形大乱，山沟里车撞车，人挤人，马嘶人窜，火光闪闪，烟雾弥漫。站在指挥所的林彪和聂荣臻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一经商量，决定把敌人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全线出击的命令。

林彪放下望远镜：“命令杨得志、李天佑跑步过来！”

685团的阵地近，杨得志首先赶到。林彪说：“敌人还没有清醒过来，赶快冲锋抢占公路对面的制高点！”

“是！”杨得志一把掀下军帽，跑步离去。

685团的阵地在最西面，师部给他们的任务是，等第686、687两个团将敌人放进伏击圈，由他们迎头痛击。而且他们还要准备两面作战，防止平型关方面敌人回援。

有人对杨得志说：“团长，我们这不是打蛇头吗？”

杨得志点点头：“对，打蛇要打头，这是句俗语。但是，

看这次师首长的布置，除了我们要打蛇头，兄弟团队斩蛇腰、蛇尾的任务同样重要。打蛇，就要将蛇头砸烂。”

这时，这个年轻的指挥员担心能不能打上这场盼望已久的伏击战。终于，日军的先头部队进入了杨得志的视野，敌人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见，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跳在加剧，赶紧把电话耳机用力按在耳朵上，随时听候上级的命令。在他的身边，几个营指挥员紧张地望着他。战士们都虎视眈眈地趴伏在阵地上，机枪射手们早已压满了子弹，步兵手中紧握的枪，雪亮的刺刀寒光闪闪。

这时，电话耳机里传来一股急促的电流声，随即传来了命令：“师长命令你们冲锋！”

杨得志眼睛一亮，向离他最近的机枪射手高喊：“打！”

话音未落，机枪子弹便像阵阵疾风向山下扫去，颗颗迫击炮弹在沟底炸响。转眼之间，前面的几辆汽车中弹起火，趴在沟底一动不动，把公路堵了个严严实实。

紧接着，隐蔽在山头后面的战士们呐喊着向山下冲锋。5连连长曾贤生高喊：“我们要用刺刀消灭敌人，就是牺牲，也要堵住敌人！”5连在曾贤生的带领下率先接近公路，他们投出的第一批手榴弹就炸坏了好几辆汽车，有些来不及下车的敌人在急促的爆炸声中血肉横飞。借着手榴弹爆炸产生的浓烟作掩护，5连迅速冲上公路，和敌人展开肉搏战。身穿草黄色军衣的敌人和穿灰色军装的八路军战士在公路上捉对拼杀，刺刀与刺刀相碰的声音，刺刀戳进肉里的“噗噗”声，偶尔响起的零星枪声，死者沉重的倒地声，受伤者发出的惨叫声，此起彼伏，搅成一团。

刺鼻的血腥味儿在山谷间弥漫。此时也许是它有史以来最为喧嚣的时刻，这条带有明显远古遗迹的峪谷在正义者的怒吼

中震撼。



▲八路军战士向日军冲锋

残酷的白刃战是八路军平型关大战的一个主要景观。第5师团不愧为具有武士道精神的强敌，往日红军在内战时期令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的白刃格斗，此时用来对付日本人，占不上多少便宜。因此，战斗打得异常激烈。

5连连长曾贤生身中数刀后壮烈牺牲。遍地都是敌我双方战士的尸体。鲜血和泥浆混合在一起缓缓流淌。

685团在付出了重大代价后，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堵住了敌人。

如果说685团处于打“蛇头”的位置，那么，687团自然是打“蛇尾”了。由于山洪阻隔，688团没有能拉上来，687

团又被布置在战场东头打助攻和阻援，因此作为旅长的徐海东心里不免感到遗憾。

徐海东绰号“徐老虎”，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935年，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策马陕甘，为红军主力北上充当了先锋，然后又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对接，在陕北高原为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开辟了一个理想的落脚点。这位窑工出身的将军一向以争排头、打硬仗著称。内战时期，徐海东多次让西北军、东北军的国民党将领尝过失败的滋味，一提起“徐老虎”，他们既感到胆战心惊，又佩服不已。因此他的脑袋很值钱——国民党飞机多次从陕北高原上空撒下悬赏传单：“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者来投我军，当赏十万大洋！”

来平型关时，徐海东带着一身的伤病，他曾九次负伤，七尺身躯有17处伤痕，左脚为二等残废。虽然他行动不如从前，身体虚弱，爬山时需要人搀扶，但他仍让参谋长徐曼远坐镇指挥，自己带几位参谋紧跟687团在前面指挥战斗。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行军途中，带作战科长张池明、作战参谋张竭诚下到营里了解情况，对各营干部说：“无论如何要抢时间，多带上一名战士，早上一分钟，就增加一份胜利的把握。”

部队进入阵地后，徐海东又带几个人来到师指挥部。林彪对他说，豆腐要当铁打，不能大意，不要轻敌，要留好预备队，要通过这次战斗摸摸敌人的特点。然后他把各营的阵地又看了一遍。他要求团里干部都下到营里协助指挥。他听到枪声就坐不住了，哪里打得激烈，就要到哪里去，谁也拦不住。

虽然师里给687团的作战任务是助攻和阻援，实际上他们在这次战斗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不能暴露目标，敌人

最先经过他们的阵地，如果暴露了目标，伏击计划就要泡汤；二是必须扎紧“口袋”袋口，决不能让敌人后撤一步，才能够“关门打狗”。

687 团团长江绍东和副团长田守尧将团指挥所设在小寨村的龙王庙里，离公路很近。第二战区派来的一个联络参谋不安地说：“团长，这儿是不是靠前的些，撤出的道路没问题吧？”

张绍东没有理他，田守尧说：“等我们把敌人杀得一个不剩时，从哪儿撤都一样。”战斗开始后，混乱中果然有一股日军冲上龙王庙高地，他们才急忙往后转移，很快龙王庙高地又被战士夺了回来。

战斗顷刻间打响。3 营长带通讯班最先冲到沟边，把机关枪架在人身上往沟里扫射，担任后卫的一个小队的日军顿时倒下大片。接着 11 连赶到，战士们抱着枪从山坡上往沟底滚，9 连和 12 连也上来了，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

站在山头上的张绍东、田守尧看得清清楚楚。二战区那个联络参谋惋惜地说：“对面下来的这个营算完了！”“说错了！30 分钟后，我这个营准打到这边来。”田守尧充满信心地说。

果然，半个小时后，3 营打到离老爷庙不远的山下。3 营长两手卡着腰，在沟底指挥重机枪向敌人扫射。这时，峪沟和谷底里的残敌不断从各个方向朝团指挥所打枪，子弹打进张绍东和田守尧身边的泥土里。他们像根本没有看见，依旧沉着地站在那里指挥战斗。而那个联络参谋已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687 团第 2 营是清一色的陕北子弟，刘志丹的部下。战斗打响后，有一股日军从另一个方向冲击老爷庙高地，师部命令团里抽调一个连到师指挥所领受任务，团里把这个任务交给了 2 营 6 连。6 连跑步赶到师指挥所，看到他的副团长已经负伤

被抬了下来。聂荣臻副师长交待6连迅速进入阵地，从侧面攻击向老爷庙高地进攻的敌人。6连接受任务后快速散开，向山下运动。

向老爷庙进攻的那股敌人有50多个，看到6连冲来便放弃向老爷庙的进攻，转身和6连对峙起来。打了一阵，6连副连长从阵地上抬头瞭望一下，然后站起来高喊：“冲啊！”话音未落，被日军一枪击中牺牲。战斗结束时，90多人的6连只剩下30人。第二天打扫战场时，19岁的战士杨士梅，在他战斗过的阵地上，倒下了50多个日军尸体。在我军阵亡的将士中，有一个他很要好的陕北老乡，他含泪在一条雨水冲出的小沟里，草草掩埋了那位老乡。

687团3营9连的攻击地段紧挨着686团。走投无路的日军多次拼死攻击9连阵地，妄图从这里冲出一条活路来，但均告失败。不久，副连长郭春林发现一股日军偷偷爬上了他们阵地右前方的一个小山头，在那里架设了重机枪，疯狂地朝9连阵地扫射。必须把这挺重机枪干掉。他命令2排长秦二楞带2排迅速完成这个任务。这时2排只剩下13个人，秦二楞二话不说，带着这13人扑了上去。为了缩小目标，他们都是抱着枪从山上滚下去，来到敌人跟前，一阵手榴弹将这挺重机枪给炸了。随后全连都涌下山与敌人短兵相接。一颗子弹飞来，郭春林左臂负伤，他连忙用毛巾扎上。这时一个让他难忘的场面出现在他面前：

一个敌人看到郭春林负伤，就挺着明晃晃的刺刀扑了上来。他正举驳壳枪射击，只听见“噗嗤”一声，鲜血溅在他面前的地上，那敌人应声倒下。他看见秦二楞两眼通红，浑身是血，呼哧呼哧地喘气，几乎认不出是谁了。此时秦二楞已多处负伤，郭春林劝他下去，话还没有说完，又有几个敌人嗷嗷

地叫着扑了过来。秦二愣前胸后背四把刺刀闪着寒光。秦二愣沉着地转身来回抵挡……无奈他已多处负伤，行动迟缓，被刺中一刀又一刀，他痛苦地皱了一下眉头，倒地一瞬间，在用最后的力气又给了敌人致命的一击后，才摇晃着同敌人倒在了一起。

郭春林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全连最勇敢的一位战士，他最好的战友秦二愣会牺牲！郭春林喊叫着他的名字，俯身去抚摸他的胸口，希望那儿是温暖的，但是已经慢慢变冷了，冰冷冰冷……

◎ 老爷庙高地争夺战

老爷庙在连曲山对面，背靠黄立山。每年夏秋两季，雨水充足，山明水秀，老爷庙映在中间，更显秀丽无比和灵气。老爷庙又叫关帝老爷庙，黄立山因此又叫老爷庙山。

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奉命在这里进行举世闻名的平型关作战，伏击了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数千人。

战斗打响以后，李天佑正紧张地观察战斗的进展，一个参谋大声说：“团长！团长！师长让你到他那里去一趟！”

李天佑太专注了，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师长要我去？好。”

师指挥所就在他们身后右侧的山坡上，相距一里多远。李天佑从谷地里一口气跑了过去，他看到林彪正披着雨衣迎风站立。

林彪对气喘吁吁的李天佑说：“沉着些。敌人比较多，比较强，战斗不会马上结束的。”然后他抬手指着山沟里激烈场面又说：“看到了吗？敌人很顽强。”

李天佑顺着林彪的手指望去，看到公路上的敌人正利用汽车顽抗，并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

林彪说：“我们包围了一个旅团，有4000多人，块大不好一口吃掉。你们一定要冲下公路，把敌人切成几段，并以一个营抢占老爷庙。拿下这个制高点，我们就可以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沟里！”

李天佑：“看！有几个鬼子正在往老爷庙爬呢！”

林彪说：“是啊！你们动作要快，慢了是不行的！”

“明白了！”李天佑说。

林彪说：“好，去吧，狠狠打，一定要狠狠地打！”

李天佑顺原路跑回指挥所。副团长杨勇说：“团长，你在指挥所全面指挥，我和几个同志下到各营去，好不好？”

李天佑点点头，杨勇等人离开后，马上命令右侧上山的3营：“向老爷庙，冲上去！”

随着冲锋号声，3营迅速冲下山坡。但山沟里弥漫的烟雾令他们看不清目标。已经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的日军官兵，以汽车、大车和沟坎作掩护，猛烈还击，3营往下冲的过程中已有不少人伤亡。战士们什么也顾不上了，只知道拼命往前冲、往前爬、往前滚……

3营田世恩排长带领全排冲上公路，敌人也从各种临时掩体后面跳出，端着明晃晃的三八大盖枪迎上来。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开始了。这是八路军战士第一次在如此近的距离和衣着、装备和长相令人感到新奇的东洋鬼子拼杀。

在硝烟和火光中，长枪上没有刺刀的战士扔掉长枪，抽出砍刀搏杀，连砍刀都没有的战士干脆徒手与敌人厮拼扭打起来。田世恩端起刺刀朝一个矮个头敌人刺去，那家伙举枪相迎，两把刺刀顶在了一起。田世恩往后一退，抽出枪刀，发现

自己的刺刀硬是被那家伙顶弯了。这时，一颗子弹飞来，正中田世恩排长的右肩，敌人更加来了精神，挥枪刺来。田世恩咬了咬牙，猛地转身，纵身一跳，调转枪托抡起，照准他的脑袋直砸下去，那家伙尖叫一声，倒在地上。田世恩顺手抽出他的长枪，朝他肚子上连扎两刀，送他上了西天。紧接着，田世恩又跟冲过来的一个日军军官拼上了，那家伙拿的是东洋刀，不如田世恩的长枪用得顺手，一下子被刺中。此时，排里的战士高建枝也冲了过来，又刺了那军官两刀。



▲平型关战役中敌我肉搏

肉搏战约半个钟头后，日军顶不住了，活着的都往汽车底下钻。枪声稀了，喊杀声也渐渐弱了。但3营此时也遭受了重大伤亡，其中9连干部差不多都牺牲了，100多人的连队只剩下十余人。

李天佑的电话打到了3营长那里：“你们那里怎么样了？还能打吗？”

回答仍像战前一样干脆：“保证完成任务！”

3营的主要任务是攻占老爷庙，因此他们不敢停留，紧接着往老爷庙冲。但是，一股日军已经占领了老爷庙，他们的火力压不过日军的火力，冲上去的战士一片一片倒下。李天佑从望远镜里看得真真切切，他拿起电话，再一次命令3营长：“猛冲，一定要拿下老爷庙！”

3营长放下电话，亲自带队冲锋。占领老爷庙的日军用机枪往下扫，战士们就趁对方换梭子的瞬间猛往上冲，然后再停下来还击，刚冲到半山腰，山下沟里的日军又从背后涌上来，朝他们开火。3营长负伤。3营处于腹背受敌的险恶境地。

幸亏2营及时冲上公路，将3营后面的敌人消灭，才解除了3营的后顾之忧。田世恩带两个班冒着弹雨往上爬，终于接近老爷庙，他们往上甩手榴弹，整个山头黑烟腾起，乱石横飞。敌人的机枪哑了，战士们趁机端着刺刀冲上去，将残余的敌人全部消灭。田世恩看到，每个敌人身上至少要挨两三刺刀。

与此同时，685团的一支部队从另一个方向冲上了老爷庙。八路军完全占领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25岁的副团长杨勇随3营爬上老爷庙，被一颗流弹击中负伤。

丢失了老爷庙的日军并不甘心。已将指挥所移到公路北一个山坡上的李天佑看到，约有五六百个敌人拥挤着反复向老爷庙冲击，日军飞机也飞临上空，贴着山头盘旋、威胁。但敌人数次攻击均告失败。

日军受到两面火力的夹击，异常恼怒，五六百兵力先后对老爷庙发起十几次攻击。阵地几次易手，中日两军官兵为争夺老爷庙制高点，无不血染军衣，刺刀断了用枪托砸，石头、树

枝都成了武器。双方伤员扭抱在一起拳击牙咬，直到拼死为止。

这头猛兽好难制服！装进了口袋还这样费劲！聂荣臻的胸口擂鼓般怦怦直跳，这无疑是一场全新的战斗，超出了我们过去的经验范围。可是我们的指战员仍然以为，把敌人打狠了就会像过去内战时那样，敌人就会缴枪投降。红军值得骄傲的近战、白刃战面对训练有素的日军，威力难以发挥，对方尤其擅长此技，甚至更胜我一筹。而缺乏远程火器的我军只能以近战夜战为手段。阵前喊话是我军瓦解敌人的有效办法，可惜现在的日军听不懂中国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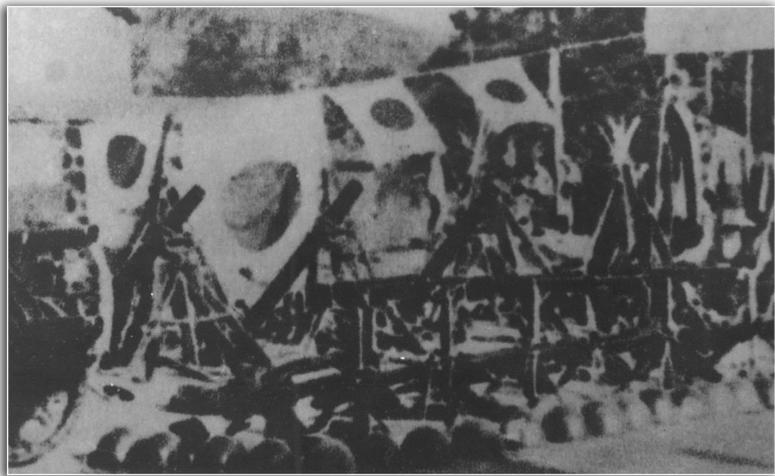
这是聂荣臻经过这次战斗总结出来新的经验，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这位卓越的政治干部潜在的军事才能，不久就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这与他平时善于总结，善于提高是分不开的。

老爷庙高地争夺战中，双方的战斗非常激烈和残酷。日军为了生存，凭着他们武士道精神，进行多次反扑，企图从八路军的包围圈中撕开一个口子突围出去。八路军阵地多次出现险情。

林彪及时将预备队投入战斗，极力堵住被敌人撕开的口子，成功地挫败了敌人突围的企图。在空中盘旋的日本飞机无可奈何地飞走了。一直激战到下午1点左右，686团和687团会合了，全歼了沟底的日军辎重队，日军在阵地抛下无数具尸体，不得不放弃攻击，向辛庄溃败，企图与东西跑池方向的粟饭部队会合。我军一齐朝逃向辛庄一带的日军残部追杀。

林彪撒下的大网越缩越紧，垂死挣扎的日军更加疯狂，宁愿“效忠天皇”而战死，居然无一人投降。枪声沉寂后，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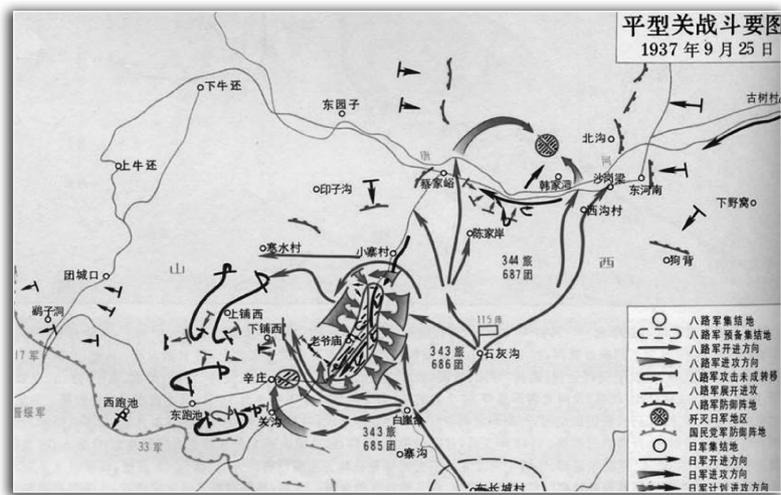
荣臻指挥部队打扫战场，当时阵地上躺着不少伤兵，为了抓活口用作宣传，战士们准备抓几个俘虏，没有料到面对这些负伤的士兵，八路军官兵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军军旗枪支弹药

有一位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军伤兵，准备送往急救站为他治伤。半路上那个伤兵缓过劲来，一口咬掉了营长的耳朵。还有一位通讯员收电话线时，发现汽车底下躺着一个日本伤兵，受了重伤，呻吟不止。通讯员掏出纱布准备为他裹伤，那伤兵却扬手一刀刺进了通讯员的腹部……

这么大的一个伏击战，没有抓到一个俘虏，这在红军战史上尚无先例。可见日军的顽抗到了何等地步，双方搏杀的残酷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日军在这次战斗中损失 1000 多人，在日军侵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日军第 5 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参战以来为“皇军辉煌的战史”屡创佳绩，这次却写上了失败的一笔。



▲平型关战斗要图（来源《中国现代史地图册》）

◎ 腰站阻击战

在战斗打响前，林彪、聂荣臻在驿马岭埋伏了一支奇兵，国民党编制序列上并不存在的“黑兵”——杨成武独立团。

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1937年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阻挠和限制，该师未被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只好暂编为第115师直属独立团。

独立团在驿马岭的任务是大胆深入敌后，切断从涞源至灵丘和从广灵至灵丘的公路运输线，并阻击这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兄弟部队歼灭平型关之敌。在9月23日部队从上寨村出发时，林彪说：“你如不能把日军的援兵挡住，平型关之战就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顶住日军！”

聂荣臻特别提醒道：“将来还要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日军

长期作战。头一仗如把你们的本钱打光了，那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不过，我相信你们会打好的！”

腰站是山西省灵丘县县城以东 45 里的一个边远小山村，东邻河北省涞源县。因为它西距灵丘东至涞源城都是 45 里，故名腰站。腰站东南不远处有座高山，山顶有个马鞍形的隘口，是北平通山西太原的驿道必经之要隘。古代东来西往的官吏、商贾，途经这里时，必投宿在腰站，将马赶上山去放牧，所以这个山岭取名驿马岭。

独立团于 9 月 23 日接受任务后，下午 4 点从上寨村出发，由上北泉、下北泉之间向平型关以东的腰站和以北的冯家沟地区进行穿插。傍晚，部队到达上、下北泉一线，还未宿营，就在村外唐河边沙滩上进行了战斗动员。天快黑了，部队才开始进村宿营。虽然日军还没有到这里，但前几天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一路抢掠，群众遭害不浅，所以一听有兵开来就“跑反”，都跑到山沟里去了。

指战员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几位看家的老人，经过再三解释、宣传，他们才知道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改编的，又看到部队纪律严明，态度和蔼，要上前线去打日本军队，老人们很兴奋，当即找回了村里的老百姓。乡亲们热情地为战士们送柴、烧水，还拿出家里的红枣、核桃一类食品慰劳部队。

9 月 24 日早晨 5 点，独立团由上、下北泉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腰站前进。当时的前卫营是 1 营，营长曾保堂，副营长袁升平，教导员张文松，都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干部，精明强干，作战勇敢。部队改编前，他们都是团的干部，改编后才到营里任职。八路军的各级干部都比红军时降一级任用，所以指挥员素质高，部队作战能力强。当时每个连队都是满员，并配备了电台，敌情传递迅速。

独立团开进时，从情报中得知涑源的日军将通过腰站。果然，24日下午4点，板垣师团第9旅团一个联队由涑源向腰站、灵丘开来，当晚占领了腰站东南侧的驿马岭隘口。杨成武团长分析敌人不会在晚上冒险下山去灵丘，但为了确保师主力在平型关作战的完全胜利，独立团作了如下布置：1营为主攻部队，布置在驿马岭半山腰有利地形，负责正面阻击敌人，坚决将日军挡住，决不让日军下山增援平型关。2营连夜开往灵丘东北的三山镇地区，在冯家沟等地埋伏，切断灵丘至广灵的公路，阻击可能由广灵方面向灵丘、平型关增援的日军。3营是团的预备队，与团直属机关一起布于白洋浦、安甲一线。

9月25日凌晨，大雨如注，八路军战士们穿着单衣，又无雨具，仍坚持在阵地上，严密地注视着山上的敌情。拂晓时，大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战士们更加警惕起来。山上山下虽然埋伏着千军万马，但此时却静得出奇。

7时许，晨光四射，浓雾渐消，从涑源先后出来的约两个联队的日军，沿着涑灵大道，向独立团扼守的驿马岭阵地直涌过来。当日军进入独立团埋伏圈有效火力范围时，杨成武团长立即发出攻击命令。顿时枪炮齐鸣，杀声四起。

几乎同时，平型关峡谷古道方面传来了震天动地的大炮轰鸣声，那是林彪、聂荣臻指挥师主力部队抢占制高点。林彪没有发现日军派主要兵力去争夺那些至关生死的制高点，而是猥集在山沟里挨打，便松了一口气，来到电台旁边。

“独立团有战报来吗？杨成武他们能顶得住吗？”林彪有点放心不下阻援的战斗。

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聂荣臻蹙着眉说：

“没有。敌人有两个联队，兵力是他们的两倍，更不用提

火力太悬殊了。不过老一团能打硬仗，能顶得住。”

“嗯。”林彪点了点头，“杨成武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部队的士气不用担心，打这种仗，关键是一股气，勇气！两强相逢勇者胜！”

“不错！老林你放心去指挥战斗，尽快吃掉山沟的敌人，会给独立团减轻压力。”

独立团阻击阵地虽不是平型关的主要战场，但战斗依然激烈而残酷。一方面日军得知平型关的部队遇到新对手，正在挨打，拼命冲破阻挡去平型关救援，另一方面，独立团就是不让你去增援，就是拼了老本也不能让你越雷池一步。可想见阻击之艰难、残酷。冲锋号吹响以后，1连阵地上率先站起来满身是泥的人，挥动着驳壳枪，率战士们冲锋。杨成武仔细一看，是绰号叫“醴陵拐子”的1连连长张德仁。他是湖南醴陵人，个子不高，很是机灵，其实他不瘸不拐，还有一双快脚，跋山涉水行军打仗总是走在别人前头，因为他活泼好动，爱和大伙儿开个玩笑，别人对付不了他那股“刁”劲，才送给他一个“醴陵拐子”的绰号。现在他帽子不见了，在紧紧盯住他的杨成武眼里，他大步如飞朝敌人冲去，半路上他把驳壳枪往腰里一插，弯腰从敌人尸体旁捡起一支三八大盖，打开枪刺，不一会儿就率领战士冲进敌群，与敌人展开了肉搏。一时间，猛烈的金属碰击声很远都能听到。

几分钟后，下到公路上的敌人被张德仁率领的1连消灭了。张德仁扔掉刺刀已经使弯的三八大盖，又从敌尸上抓过一支，擦了擦溅在脸上的血，沙哑地喊了声“上啊！”又带头朝驿马岭隘口冲去。

杨成武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张德仁。只见张德仁像松鼠似的又跳又蹦，紧随着溃退之敌往上冲，致使敌人无法用火力阻

挡。但是就在他们冲到半山腰时，隘口两翼突然喷出七八条机枪火舌，张德仁的身体晃了一晃，便和前两个敌人一起摔倒。他身后的战士也纷纷中弹，顺着山坡往下滚……

杨成武看到张德仁和1连战士的牺牲，心如刀绞。1连的牺牲太大了，而且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许多年过去了，杨成武上将仍然无法忘掉机灵、调皮的1连连长“醴陵拐子”张德仁。每每想起他来，一股强烈的崇敬、悲伤之情便会涌上杨成武的心头……

2连连长宋玉林机警灵活指挥战斗，派出麻排长带领全排从右侧山脊隐蔽地摸上山隘口。原来隘口处是日军一个联队的指挥中心，满隘口都是敌人的帐篷。麻排长命令全排战士投扔手榴弹，敌人伤亡惨重，但却依仗人众拼死抵抗。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麻排长壮烈牺牲，只有一个班长带少数战士撤回。

3连的2排、3排各派一个班，由指导员率领，沿右侧高山的另一条小道摸向敌人。想不到这条道被敌机枪严密封锁，小分队伤亡很大，冲击未果。

张文松、袁升平率领3连一个排占领了比隘口更高的阵地，并利用阎锡山部队遗弃的工事，用轻机枪向敌人扫射。敌我双方相距不过200米，由于敌人隐蔽在小树丛中，张文松教导员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头部中弹，当时就牺牲了。

1营在驿马岭隘口的战斗打得英勇顽强，敌人也非常凶残，拼死命往山下冲。3连9班长李洪迪数处负伤，仍坚持指挥全班战斗，直打到最后一颗子弹。部队在打扫战场时，他刚苏醒过来，自豪地说：“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让敌人通过腰站。”

作为预备队的3营，战斗激烈时，在营长黄寿发、副营长邱蔚、教导员张相国的率领下，适时投入战斗，使阻击阵地更

加牢固。被阻击的日军急得发狂，但始终没有突破我军的防线。

这场阻击战打得天昏地暗，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通讯员送来了师部告捷电文：“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1000多人。你独立团已胜利完成打援任务。”

独立团广大指战员听到捷报内容后，个个欢声雷动，斗志冲天。杨成武团长立即派团的主力迂回到敌人的侧翼，从敌人的背后打上去，固守正面的部队也发起猛烈的反冲锋。这时四面山头一齐吹起冲锋号，战士们呐喊着冲向敌群。山上的日军大概也已获悉同伙被歼灭的消息，在我军前后夹攻下，无心恋战，丢下400多具尸体和大量物资装备，夺路逃回涑源城。

据当时独立团搞后勤的钟蛟蟠介绍，在腰站阻击战中，我们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支援。他们抬着担架，带着食品，争着到



▲平型关一战，我军大获全胜。

前沿抢运伤员，慰劳战士。他们有徐家台的、吕庄的、安甲村的……有的是动员来的，但大部分是听到枪声后自动赶来的。我们劝他们不要上前线，有危险。他们却说：“不怕，有八路军在前边打日本鬼子，我们怕个甚！”这次战斗中七八十名伤亡战士，都是当地老乡抬下来的，有的运到五台，有的送到了大后方。

◎ 军长蒙头睡懒觉 贻误战机放敌寇

平型关战斗激烈进行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和敌总指挥孙楚听到枪炮声，以为是按计划出击的晋军与日军的交锋打响了。上午9点，林彪派来的参谋紧急求见，责问晋军为何按兵不动。杨、孙二人才知道晋军前卫第二预备军仍滞留在迷回村一线，并没有按计划行动。杨爱源勃然大怒，派作战参谋快马急驰迷回村。

第二预备军军长郭宗汾还在被窝里睡懒觉，作战参谋闯进卧室质问：“郭军长，你的部队为什么还未行动？杨、孙二人正在发火呢！”

郭宗汾一脸的不高兴，慢腾腾地钻出被窝，对参谋说：“天气不好，昨天晚上风雨交加，弟兄们都冻惨了。”

“这就是贵部按兵不动的理由？”参谋挥鞭指向窗外，“听这枪声，八路军跟日寇打得惊天动地。天气不好共产党能打仗，日本人也能打仗，唯独我们国军不能打仗？真是岂有此理！”

“年轻人冷静点，”郭宗汾趿拉着拖鞋，漫不经心地说，“你回去禀报杨、孙二将军，第二预备队马上出发。”

养尊处优的晋军动作慢得像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拂晓出击

的计划，至下午三四点仍不见动静。此时，八路军已全歼被围之敌，乘胜猛击东跑池的栗饭守军。东跑池守军势孤力单，经不起八路军杨得志部的冲击，弃阵向团城口退却。685团穷追猛打，狡猾的日军为了摆脱八路军，故意抛弃行李、头盔，作出狼狈不堪的样子，一路望风而逃。黄昏时分，日军逃至一个村庄隐蔽。685团尖刀连未经搜索便冲进村庄，遭到这股日军机枪射击，伤亡很大。

杨得志急忙下令收缩在追击中拉长的战线。日军乘机摆脱了八路军的追击，向团城口逃窜，半路上与郭宗汾的第二预备军遭遇。郭军不知虚实，急催后续部队陈长捷的第六十一军火速增援。日军为夺生路，凭借优势火力迅速冲击，第二预备军尚未摆开阵势就吓得调头南撤，待陈长捷部赶到，日军已不见踪影。事实上晋军在平型关面临的日军只有栗饭大佐的两个大队，1000余人。晋军五个军不敢与之交战，这在战争史上算是一个奇迹！

阎锡山在雁门关行营接到林彪、聂荣臻的捷报，大感意外，他的军队自开战以来节节败退，致使战局日益恶化，眼下山西存亡千钧系于一发，全国舆论大哗，都说山西阎锡山的军队畏敌如虎。阎锡山正处于不打一仗无法向国人交待，打又没有把握的矛盾心理之中。早在他制订平型关会战计划之时，彭德怀就已经看出他决心不大。阎锡山犹豫彷徨之际忽闻八路军出师大捷，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什么滋味。他痴头愣脑地盯着墙上的军用地图，沉默了半个钟头，第115师发来的捷报从手指间滑落。这些天来，他被两支锋芒逼人的蓝色箭头折腾得寝食难安，早已花白的鬓发和那抹潇洒的八字胡颜色明显淡化了。他一直在盼望第一份捷报，顿挫日军的锐气，以告慰天下，说明晋军并非鼠辈。现在第一份捷报终于盼到了，偏

偏是共产党抢了头功。林彪，黄埔四期的小字辈，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该他神气了。阎锡山想起近来见过的八路军将领个个卓越超群，不说才华横溢的周恩来，那是十年前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就连他瞧不上眼的彭德怀也是韬略满腹，谈吐不俗。朱德、左权、彭雪枫等人的形象在阎锡山的脑袋中一一浮现。再想想自己手下的那些晋军将领，没有一个给他争脸，使这个老牌军阀不禁感慨万分：

良将尽在毛泽东帐下啊！

当天夜里，杨爱源从平型关打来电话，状告郭宗汾，说第二预备军不按计划出击，贻误战机，他指挥不动，要求阎长官亲自去督战。阎锡山气得骂了半天娘，扣上电话便命侍卫官备马。

阎锡山连夜带着军事执法官张培梅和高级参议续范亭急驰平型关，一路上破口大骂，似有把郭宗汾碎尸万段仍难解恨之感。

续范亭是同盟会老会员，在阎锡山的幕僚中是最资深的一位，他的爱国热情备受国人赞赏。当时，阎锡山刚刚枪毙了军长李服膺，现在该轮到郭宗汾挨枪子儿了。续范亭主张严惩郭宗汾，只是执法官张培梅一直未表态。有“黑脸判官”之称的张培梅对老军阀的脾气摸得比谁都透。

杨爱源的司令部设在平型关通往五台山公路旁的一个小山沟里。阎锡山一到，命令师以上将领立即起床开会。大约凌晨2点，官兵们从梦中惊闻阎长官驾到，不知是福是祸，顿时沸沸扬扬，把个寂静的山谷吵得鸡鸣狗吠，似乎错了时辰。阎锡山在山西大搞个人迷信，尤其在军营，孙中山、蒋介石的像可以不挂，他阎锡山的像不能不挂。

现在，他端坐在自己的像下，满面怒容，逼视着陆续到来

的高级军官们。那是一张土炕，左右坐着张培梅和续范亭。晋军将领像朝拜庙里的三世活佛般神情肃然，不敢吭声。

“近来战况如何呀？”阎锡山拖着长腔，将面前的将领打量了好几遍，他的目光落到谁的身上谁就像身上长刺那样不自然起来。

杨爱源朝郭宗汾瞟了一眼，正准备开口，郭宗汾却抢先发言：“报告长官，第二预备军白天与强敌遭遇，敌人飞机大炮火力猛得很……”

“你部损失多少人马呀？”阎锡山微闭双目，沉声问道。

“托长官的福，未损一兵一卒。”

“你不是说敌人火力很猛吗？”

“部队是长官一手拉起来的，宗汾不才自知我弱敌强，乃主动避其锋芒，未敢贪功而损兵折将。眼下战端初起，中央军主力被牵制于淞沪，华北日军精锐却先朝我晋军开刀，我们要留些余地，保存些实力，不能把力量用尽了。只要晋军不伤元气，即使丢些地盘，将来仍有光复之日。如果与日军硬拼把老本蚀光了，晋军不存，晋地必失，那时三晋百姓就永难重见天日了……”

郭宗汾花言巧语，滔滔不绝，足足说了一个多钟头。阎锡山一脸的冰霜被这番处处为他本人着想的高谈阔论说得消融殆尽。“黑脸判官”张培梅端坐炕头微笑不语。

“好个郭宗汾，算是把长官的脾气摸透了，轮上你小子升官晋爵喽！”张培梅朝郭宗汾瞥了一眼，心里不禁泛起一股醋意。

其他将领略述各部近日战况后，阎锡山草草宣布散会。老军阀打了个哈欠，折腾了一夜，想睡觉了。

杨爱源待众将散去，将郭宗汾违抗军令，逃避战争，贻误

战机等事又详细述说了一遍。阎锡山睡眼惺忪，好像并未听进去。续范亭再也忍不住了，大声道：

“郭宗汾的言行，处处都表示对战争的动摇，长官应该严惩他！”

阎锡山吓了一跳，睁圆双目吃惊地望着续范亭，半晌才说：

“哦，我忘了，刚才应该碰他个钉子。”

八路军完全控制这条山沟后，师指挥所从连溪山头搬到老爷庙，对战斗作了简要的总结，接着按原计划，命令部队向东跑池一带的日军进攻。按照阎锡山的作战计划，国民党平型关正面守军应和右翼八路军同时出击，但在八路军歼击峡谷公路上敌人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出击。东跑池的敌人不仅没有被消灭，相反该敌竟集中力量支援公路上新到的21旅团，给八路军歼灭公路上的敌人，增加了困难。

林彪分析了上述情况后，认为晋绥军一直按兵不动，八路军若继续前进并仰攻敌人，势必付出极大代价，况且团城口之敌倘若向老爷庙迂回，八路军就会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决定各部队立即停止前进，除留下687团掩护外，主力撤出战场，分途向太白山以南地区转移。同时，派陈正湘副团长带领警卫员、通讯员，去找晋军平型关指挥部联络，向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通报平型关战斗情况，并通知八路军主力已撤出战斗。

结 束 语

平型关战斗仅用了一个白天时间，就歼灭日军 1000 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和 200 辆大车，缴获野山炮 1 门、轻重机枪 20 余挺，步枪千余支，炮弹 3000 发，战马 53 匹，日币 30 多万及军用地图、电台，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是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的第一次大捷。

平型关战斗胜利结束了。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胜利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后来的片面抗战路线影响下，国民党军队普遍存在“恐日”情绪，士兵毫无战斗力，简直到了草木皆兵、望风而逃，一触即溃的地步，甚至还没有见到日军就往后逃跑。而日军气焰却非常嚣张，一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无不目空一切，骄横无比。他们把中国老百姓污蔑为“猪猡”，把追击中国军队称作“赶鸭子”。日军狂妄地宣称“三个月灭亡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第 115 师，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利用极好的山地条件，成功地举行了伏击战并取得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此战首要意义正如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经验》中总结的那样：在全国同胞热烈期望下，我们于 9 月 25 日在平型关与日军接触了。不负全国民众与友军的期望，不负八路军十年来的荣誉，我们的这

次第一次战役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仗的确给了日寇以重创，提高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特别是更加提高了八路军的威信。老百姓的话更说明了问题：“咱们中国的事、山西的事，只有交给八路军来办才有希望。中央军、晋绥军天天退却怎么会把事办好？这种豆腐渣军队应该铲除！养兵只能养八路军的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得到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毛泽东于1937年9月26日给八路军总部发电祝贺：“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等总部首长给予高度评价：“第115师平型关大捷，林彪、聂荣臻是有功之臣。”

八路军指战员在战斗中付出了沉重代价，表现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这些烈士用鲜血写下抗战以来八路军打的第一仗的辉煌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激励人们沿着他们的足迹，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中国人民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如今，平型关战斗所在地的山西省繁峙县和灵丘县把平型关和乔沟主战场，作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在老爷庙对面连曲山下修建了“平型关战役纪念馆”，在平型关村有“平型关战役纪念馆”。每年清明时节和夏秋旅游季节，青少年都来到这里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山西省省委、省政府把“平型关战役纪念馆”和平型关村、残缺平型关隘口列为重点革命文物加以保护。

在著名的八路军军歌中，有两句歌词：“首战平型关，天下威名传。”这就是对八路军第115师最好的褒扬和永久的纪念。